

甘肃史志

GANSU SHIZHI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主办

GANSU DIFANGZHI

2017·3

甘肃史志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任：张军利

副主任：郝宗维 李振宇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牛述林 毛存显 石为怀 米琳 孙占鳌

李宽余 杨生宝 张伦 张正龙 张占社

张全生 何成才 罗卫东 郑天水 贺红梅

高中 彭晓峰 谭得胜

主编：李振宇

副主编：张占社

编辑：孔令奇 李佳潞

甘肃史志

2010年3月创刊 季刊 总第31期

2017·3

· 理论视野 ·

论古代甘肃方志理论要点

韩章训 ·4·

· 续志编研 ·

甘肃省志续志编纂的几点思考

贺红梅 ·16·

突出时代特色是二轮志书编纂的关键

石为怀 ·21·

· 历史回眸 ·

河西归汉相关问题考辨

孙占鳌 ·24·

陇南古道叙论

罗卫东 ·38·

· 家族乡规 ·

从石刻文献看陇南历史上的乡规乡约

赵逵夫 ·49·

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研究

陈尚敏 ·53·

GANSU SHIZHI

· 人物春秋 ·

《巩昌府新志》撰著者杨恩的史才与史识

王长华 ·62·

· 旧志再现 ·

明嘉靖《秦州志》辑录记

潘守正 ·69·

· 史地考证 ·

轩辕故里考

李清凌 石莉萍 ·72·

· 文化承传 ·

临潭的古代书院

张俊立 ·78·

· 史志快讯 ·

甘肃省志九部专志通过复审

·20·

陇南市地方志办公室督查全市史志工作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61·

论古代甘肃方志理论要点

韩章训

内容摘要:甘肃修志源远流长,自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明清,修志成果累累,方志理论研究也取得巨大成就,但因种种原因,方志学界对此一直有所忽视。本文就古代甘肃方志理论要点予以较系统和完整的梳理,以资方志界所用。

关键词:古代甘肃 方志理论 要点

甘肃地区(含今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修志源远流长。从魏晋到宋元,修志不辍,成果累累。据郝玉屏主编《甘肃方志通览》著录,汉魏六朝间,甘肃地区有地记20种,即《凉州异物志》《秦记》《张掖郡玄石图》《晋太康秦地记》《陇西人物志》《敦煌耆旧传》《秦州地记》《西河记》《西凉记》《凉州记》《敦煌实录》《河西旧事》《沙州记》《秦州记》《仇池记》《陇西记》《陇右记》《张掖记》《甘州记》。隋唐间,甘肃地区有志书12种,即《敦煌实录》《河西人物志》《沙州都督府图经》《河西陇右地形图》《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吐蕃黄河录》《河湟十一州地图》《成州图》《庆州旧图经》《安定图经》《沙州地志》。^①据顾宏义《宋朝方志考》著录,宋代甘肃有《(兰州)图经》《庆州志》《秦州图经》《秦州志》《(岷州)图经》《西和州志》《(文州)图经》《文州古今志》《文州续志》《(成州)图经》《同谷志》《续同谷志》12种。^②据顾宏义《金元方志考》著录,元代甘肃有《甘肃图志》《皋兰志》《金城志》《(临洮府)郡志》《德顺州志》《(泾州)郡志》《(环州)郡志》《宁州图册》《(镇原州)郡志》《(西和州)郡志》《文州志》《和政旧志》《和政志》《甘州志》《山丹州志》《肃州志》16种。元代宁夏有《开成志》1种。^③这些志书均早亡佚,也未留下序跋之类的历史文献。自明始,尤其是在清初甘肃独立建省后,甘肃修志事业和方志理论研究均与全

国同步发展。

一、明代甘肃方志理论要点

甘肃建立省级政区始于元代。元至元十八年设甘肃行中书省,辖今甘肃大部地区,旋省。至明代,改元代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属陕西行省管辖。彼时甘肃地区在全国修志普及热潮推动下,在方志编纂和方志理论研究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据笔者初步调查,现存明代甘肃地区方志论文有60余篇,大多散见于明清志书之中。在明代甘肃方志学者中,李梦阳(今甘肃庆城县人)、胡纘宗(今甘肃秦安县人)所撰方志论文较多。其理论见解也较深刻,对学界影响也较大。

(一)观念论

1.方志起源说

李梦阳认为,志例起源于《禹贡》《周礼》和《春秋》。他说:“夫志者,史之流也。分例祖诸《禹贡》,属事本之《周礼》,褒贬窃《春秋》之笔”。^④朱璉认为,方志起源于上古列国史。他说:“古者列国有史,纪言纪事,后世踵而行之,畿省郡邑莫不有志,是故志史之遗也。”^⑤

2.经史志谱关系说

杨应聘认为,志书可为作史提供基础材料。他说:“古者,国必有史。志者,史之征也。”^⑥杨守礼认为,史志谱兼具是国家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他说：“我明亿万年无疆之休，家有谱，郡有志，国有史，人文兼备，法制森然。”^⑩李梦阳认为，志史纪事详略有别，其义皆祖于经。他说：“夫志者，一郡一邑之书也。史者天下者也。小故详，大则概。然其义悉于经祖焉，所谓殊途同归者也。”^⑪

3. 一统志与省府县志关系

有的认为，在详略把握上，一统志与省府志编修有所不同。如《弘治宁夏新志》卷首《凡例》曰：“志一统者宜略而不详，志一省者宜详而不悉。今《宁夏志》志一方也，故特加详焉，见者幸勿谓其冗碎。”管律对一统志与省府县志关系问题有更为精要概括。他说：“夫志四方者尚简，简贵弗遗。志一方者尚详，详贵弗冗。”^⑫在这里，管氏对全国总志、省府州县志编修分别提出“简贵弗遗”、“详贵弗冗”的美学要求，很有学术意义。

(二) 编纂论

1. 宗旨说

管律认为，修志宗旨在于备载古今和鉴今昭来。他说：“志也者，志夫古以鉴乎今也，志夫今以昭乎来也。”^⑬邹浩认为，修志宗旨在于“鉴往”、“端后”。他说：“夫邑各有志旧矣，所以鉴往辙，端后轨，于治最切。”^⑭有的学者还认为，地方志书为地方而作。如胡纘宗说：“志为郡县也。”^⑮《嘉靖徽郡志》卷首《志例》亦曰：“志为郡修，载止郡事。”

2. 内容分类说

陈瀛认为，志书纪事必须合理分类，否则就会给人以琐屑和混乱之感。他总结《秦安志》编纂经验说：“凡建置、地理、职官、礼制、学校、人物、田赋、艺文皆有志，提纲纂要，援经引史，约而该，详而核，一洗凡陋故习，不复分门立类、析款标目之琐屑也。一开卷间，心目为之豁然。”^⑯刘承学也有类看法。他总结《河州志》编纂经验说：该志“稽古证今，分条析类，宛乎班马之家法。”^⑰

3. 门类排列说

刘承学认为，志书门类必须排列有序。他总结

《秦安志》门类排列经验说：“盖以万物始生本乎天，合体均育存乎地，故始之以地理。地理不同，先王辨物以居方，故受之以建置。建置则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用，故受之以食货。财用起而义例形，非公莫辨也，故受之以官政。政必有义，礼以义起，故受之以典礼。治民事神，非学无以明理，故受之以学校。校者，较也。较其贤而登崇之也，故受之以选举。选举者，才必有所用，用必有所成，故受之以人物。人物之生，惟其所禀者不同，其所成者亦异，故受之以人品。品以别其人之等，文以彰其人之实，故受之以文籍。身归九原，其论始定，故受之以遗迹终焉。”^⑱

4. 生不立传说

明代甘肃地区修志多奉行生不立传规则。如《嘉靖徽郡志》卷首《志例》规定：“宦者必于去后，贤者必于世往，然后详述，所以俟其定昭公道也。”

5. 行文笔法说

耿尚义认为，志书行文当用直书笔法。他称赞《秦安志》曰：“观是志，则知可泉先生诚直笔也，诚信史也。”^⑲有的认为，志书叙事当酌加论断。如《嘉靖徽郡志》卷首《志例》曰：“揭书事下间有肤见论断，尚俟后之君子正焉。”

6. 重修说

朱璉把志书重修任务概括为“增缺、删繁、补失、削凿”4项。他总结《河州志》重修经验曰：“夙夜殚思，多方采访，增其缺，删其繁，补其失，削其凿，词严而意正，文简而事赅。”^⑳刘文琦把志书重修任务概括为“证、补、削、删、增、论次、润色”8项。他总结巩昌郡志重修经验曰：“即旧志讹者证之，阙者补之，舛者削之，剩者删之，遗者增之，紊者论次之，简者润色之。”^㉑比较而言，刘氏概括较为全面。

(三) 文本论

1. 观念说

自古以降，一般都视志为一种书籍，而王珣一反常见，认为志是“世之大典”。他说：“我朝有《大明一统志》，至于一省、一郡、一邑亦各有志。是知志者，

世之大典,不可阙,亦不可略。”⁹王氏此言对于更新志书观念和提高志书社会地位有重要意义。刘泽远还认为,县志是一个县不可或缺的要害。他说:“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史不备不可以为国,志不修犹可以为县乎?”¹⁰从一方的文化软实力角度看,刘氏此言有一定道理。龙池子认为,志书是中国的一种特色文化。他说:“中国之所以异于外夷者,以其有文章也。志又文章之显著切要者也。居中国而无志,是无文章也。无文章则亦何贵于居中国哉?是故大而王畿,次而一省,又次而一郡一邑,莫不有志。凡以修文教以别中外也。”¹¹龙氏此说最具学术见地,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2. 称名说

有的志书编者从本书实际出发,往往要在本志取名中冠以一些前人未曾用过的新字眼。这样做未必不可,但必须作适当阐释,以具体说明为什么要冠以新字眼,否则读者就不能明其意。万历间面世《朔方新志序》,其编者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故其主修杨应聘就在本志序言中写道:“宁夏古朔方地,故其志以‘朔方’名志。”这句话用以说明为什么要冠以“朔方”二字。又写道:“新之者何?粤稽国初开镇建节,列障张官、文物典章灿然往牒。迨罹壬辰兵燹,遂举二百余年之所经理者,荡然有同草昧。迄兹再纪,而藩统官寺之增损、舆地营砦之废兴、甲兵钱谷之盈朒、习俗民隐之变迁,考往按今,岂其时异势殊。”这些话用以说明为什么要冠以“新”字。杨氏如此说明是否完全到位,可另作别论,但这样做本身是完全有必要的,是有学术意义的。

3. 性质说

王珣认为,一方之志即一方之史。他说:“志书一方之史也,所以备纪载,便历览,使人得以观感于前而兴起于后。”¹²胡汝砺认为,志属史事。他说:“志记也,史事也。有经纬之体,有详泛之用,有谱系之真,有案牒之实。”¹³胡纘宗认为,郡县志即郡县史。他说:“今之郡县古之国也,郡县之志郡县之史也。”¹⁴

4. 作用说

刘应熊认为,志书既可述古征今亦可昭往信来。他说:志“可以述古,可以征今,可以昭往,可以信来”。¹⁵李梦阳认为,志书有“观学”、“观政”、“观世”诸作用。他说:“夫志必综古今,该名实。订核验证,发之必才。此可以观学。学以昭事,事以布文,褒贬必真,臧否以之,义例灿焉。此可以观政。黜迓信远,继惩绳劝,有类乎史。此可以观世。”¹⁶秦大夔认为,编修邑志可补一统志和省郡志之阙。他说:“邑志何为?夫一统省郡所志率宏纲巨要,而纤细曲折之实见诸幽遐及与时推移者,则固简册所未书,而耳目不及周。是故,邑志不可无作也。”¹⁷

二、清代甘肃方志理论要点

这里所言“清代甘肃”大致包括今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康熙三年,陕西右布政使司分驻巩昌,七年改驻兴州,故称甘肃布政使司。八年,甘肃正式建立行省,其辖区包括今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清代既是甘肃修志的鼎盛时期,也是甘肃方志理论蓬勃发展时期。在清代甘肃还出现了著名史志学家邢澍(今甘肃武都县人)和张澍(今甘肃武威市人)。其中张澍方志论文较多,对方志理论研究较深。据张澍著《苏养堂文集》载,先后撰有《三辅决录序》《十三州志序》《凉州异物志序》《续黔书序》《蜀典序》《重修兴文县志序》《代文观涛明府重修南昌县志序》《代霍松轩明府鄱阳志序》《重修屏山县志序》《代赵及菴重修大足县志序》《重修大足县志序》《重修泸溪县志序》《余陈扈亭明府书》等。

(一) 观念论

1. 方志起源说

曾诚认为,方志起源于上古职官制度。他说:“邑之有志,始于唐之元和,原本于《周官》小史之掌。”¹⁸罗元琦认为,方志起源于《禹贡》。他说:“夫志权舆于《禹贡》,而具备于《周礼》之《职方》。”¹⁹周铎认为,志体起源于史体。他说:“夫邑之有志也,所以识沿革、纪风俗、鉴得失、彰幽潜、证文献、备采择也。”

体不俾于史而实昉乎史。总之不离乎事与言近是。征实载则纪事必详，祛虚文则选言贵当。作史云尔，志何独不然欤？”^⑩

2. 史志谱关系说

程德润继承前人思想，认为志为一方之全史。他说：“一邑之志即一邑之全史也。”^⑪有的认为，史记载善恶也有所不同。如《乾隆甘肃通志》卷首《凡例》曰：“史书之体善恶兼载，志书体例记善而不记恶。”清代甘肃学者多把史志谱视为性质相近的一族。如文安曰：“粤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家之有乘也。”^⑫

3. 一统志与省府州县志关系说

刘继认为，一统志与省府州县志编纂主旨一样，皆为昭示国朝之盛。他说：“国有一统志，省有通志，郡有府志。自奉直省编志之旨，凡通都会邑莫不采辑成书，以黼黻休明之盛。”^⑬屠文焯认为，邑志可为省郡志和一统志编修提供基础资料。他说：“志，一邑志书也，而郡志、省志取材于是，即一统志亦资采择焉。”^⑭

(二) 编纂论

1. 宗旨说

怀兄沛继承传统思想，认为修志宗旨在于存史。他说：“志何为而作乎？纪其实也。纪实而必于志者。”^⑮明德认为，修志宗旨在于彰往昭来。他说：“志乘所以纪往迹诏来兹，俾立政者有所镜而施，故于因革废兴之际加详焉。”^⑯张澍认为，政府施政需要志书提供资鉴，修志当为政府施政服务。他总结历史经验曰：“夫为政有脉朶焉，其精神贯乎弼教明刑，而外无弛张变更之迹，则志其为治之鱼筌乎。然为政有模范焉，其措施在于摩顽砺钝，而动合阿产卓鲁之风，则志其为治之龟鉴乎。唐李吉甫有云：今之为地理书者，往往说襍祥而征鬼神，爱乡邦而叙人物，至于山川险阨、攻守要害，反略而不讲。元和宰相之言，其尤切中后世县志之病也。”^⑰至晚清，有的学者还明确把求备用保疆作为本志编纂宗旨。如何

秋涛《朔方备乘》卷首《凡例》云：“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折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方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有的当代学者说得对：此书编纂“主旨明确，提供经营北边的经验教训、用兵形势、中外交往等‘备用’知识，激励当时最高统治者集团整顿边疆，抵御外侮。”^⑱

2. 责任说

有清一代，学界多把修志视为地方官的责任。如嘉庆间身任浙江长兴县知事的邢澍就把续修长兴县志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旧书类皆承袭，而莫能是正。又乾隆戊辰以后，迄今五十余年，久未修采，无以扬前烈，光盛典，是固莅兹土者之责也。”^⑲在清代也有一些地方官总是把修志责任推诿给后人。乾隆间，宁夏知府张金城就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率先批判了某些地方官推诿修志责任的行为。他说：“夫后人惜前人之不为，而复望后人，曰‘有待在官之事辍。’转因仍，以至废堕而不可复理，大率以此。金城既守此土，既任此责，是以不揣鄙陋，偕我同志，勒成此书，亦聊以供莅事者之考稽，备太史轺轩之采择。后之览者诚鉴其不敢諉谢之由，而宽其不学自擅之咎，则厚幸矣！”^⑳张氏这种敢于批评错误的理论勇气和勇于承担修志责任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和弘扬。

3. 人才说

华国认为，修志者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他说：“志犹史也，非兼三长，不失之简陋，则流于繁缛。”^㉑邢澍也有类似看法。他说：“志之为书，体例于史，非藉三长之士，惟精惟博者，相与上下其议论，将不足以信今而传后。”^㉒张廷枚还论及“才、学、识”在修志中的具体作用。他说：“盖志也者，固亦史之流也。无其识则不足以分得失，无其才则不足以提挈纲领，无其学则不足以起例而发凡，信今而传后。三者有阙，则高言何由止于众人之心乎？”^㉓张氏如此

认识才、学、识在修志中的具体作用,还是颇为在理的。

4.辨体说

在清初,有的甘肃学者就开始论及方志辨体问题。有的认为,因郡州县志体例有所不同,故在记事详略把握上也应有所不同。如《康熙巩昌府志》卷首《凡例》曰:“郡属州县各有志,然义一而格殊,县故详,州有分隶者稍括之。郡自附郭之外,惟总其要。如钱谷、徭赋之类提其纲,宦绩、人物之类拔其尤,不能详也。”《乾隆甘肃通志》卷首《凡例》也有这样规定:“省志与府州县志体裁各别。州县志书理宜详备,省志务从简核,总其大纲,裁其琐细。”有的认为,在体例把握上,志例既不能如国史,也不能如家乘。如《康熙安定县志》卷首《凡例》曰:“志例不得如国史,国史得书者寡。不得如家乘,家乘得书者多。”

5.规则说

传信传疑。“传信传疑”为以信传信、疑以传疑的简缩语,为古代史志编纂的一个通则,意同今语实事求是或存真求实。有的认为,修志必须传信,否则其书就不能流传。如《乾隆成县新志》卷首《凡例》曰:“志以传信,不信奚传。”

生不立传。清代甘肃修志皆继承传统志例,除记贞节者之外,皆奉行生不立传规则。如《康熙安定县志》卷首《凡例》规定:“人品优劣,盖棺后定。惟旌扬已定,不论存歿皆书。”《道光镇蕃县志》卷首《凡例》亦有类似规定。其文曰:“志体不为生前立传,惟苦节可贞业经题旌者,毋论存歿,照册详录。”

6.书法说

行文笔法。有的认为,志书行文当用据事直书笔法。如《康熙安定县志》卷首《凡例》曰:“据事实书,不论今昔,取其有关关系者。”这里所言“据事实书”与“据事直书”同义。有的认为,志书行文必须酌加论断,否则就不能做到是非分明。如《乾隆正宁县志》卷首《凡例》曰:“志者,纪载之文。然必兼以论断,俾是非得失如指诸掌,方见有关政治。若第组织

事实,将焉用志?为今按闾阎风土情形,于目后断其是非,于纲后论其得失,以为补偏救弊之助。若本文业已详尽者则不复赘。”这里做如此具体分析,主张酌加论断,颇具学术见地。

详略互见。清代甘肃修志者多使用互见详略之法。如《康熙岷州志》卷首《凡例》曰:“志中有以一类而分见者,如祠庙寺院隶于建置,而招中诸寺则列于番族。文庙及启圣诸祠则列于学校。有以一名而互见者,如坛壝文庙与夫群祀诸祠及民间赛会之所,于建置学校则记规模,于秩祀则记仪礼。又如学租于学校则记捐置畝数,于田赋则记输纳粮数。至若职官中有善政者再见于宦迹,选举中有德行者再见于人物。是皆与旧志迥殊,然非逞其臆见也。”这些植根修志实践的经验总结,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7.创修重修说

清代甘肃修志者承前人余绪,继续探讨志书如何创修、重修的问题。欧阳永?认为,志书创修颇难。他说:“思夫作志于志方作之日,创例为难。作志于志既作之后,备体则易。然前之难者非易,而后之易者愈难。何也?非居平究心致治革兴之故,不过守旧编,否则袭其往迹,即或标奇立异、推陈出新,非舛驳则疏漏,无取焉。故曰难也。”^⑧王机还把志书重修的基本任务概括为“正、一、显、补”四方面。他总结《泾州志》重修经验曰:“误者正之,歧者一之,晦者显之,缺者补之”^⑨

8.“五蔽”说

自古以来,学者对于修志弊端多有指陈,但所言多为具体志书的具体弊端。光绪间,甘肃学者姚协赞则率先对清代修志弊端进行整体概括,认为清代修志在总体上存有“五蔽”。他说:“余尝谓近世修志者有五蔽。见闻未广,边逼窘促,一蔽也。网罗虽富,短于裁制,二蔽也。铺张景物,滥登题咏,三蔽也。貌为古简,删落事实,四蔽也。摭古迹则侵越邻境,叙人物则掠材他山,附会牵扳,事同攘夺,五蔽也。余不谙史学,此书与古史义法离合微眇之分,诚

不知何如。若其辞晰事赅，堪资考镜，决然一洗五敝之锢习，则览者尽知矣。”姚氏把清代修志弊端概括为“五敝”，是比较全面和准确的。姚氏此说不仅对于彼时修志有针砭时弊意义，而且对于后人研究清代修志弊端也有借鉴意义。

（三）文本论

1. 称名说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有鉴于此，故修志伊始，必须拟定一个符合志书实际的名称。《乾隆狄道州志》编者也是基于这种思想，故其卷首《凡例》便论及本志称名问题。其文曰：“称名所以定志狄道，前此为附郭首邑，今升为州矣。州自今始，虽重辑是书，犹之乎创也，故不以续标名。”意谓狄道州名始于今，此志编修属于创修，故定名为《狄道州志》。这段话既说明了志名与政区名的对应关系，也说明志书创修与续修的基本区别。

2. 性质说

顾竟成把前人“信史”说化用到方志领域，认为志书应是一种“信志”。他说：“史示人以不可疑，则志当示人以必可信。故宜书而不书，或不宜书而书，或得书而不书，或不得书而不得不书，胸中无主，以意逆度而损益之。在史不可谓之信史者，在志亦不可谓之信志。”^⑩黄璟以“志”字的传统训释为依据，认为方志就是记事之书。他说：“考《正字通》，凡史传记事之文曰志。邑之有志，记事也。”^⑪秦武域认为，志属史类。他说：“志犹史也。国有史，则一代之典章文物彪炳宇宙。县有志则一邑之风土人文流传千古。”^⑫曹晟显认为，地方志就是地方史。他说：“一邑之志，一邑之史也。”^⑬

3. 作用说

王机认为，志书载事全面，有资政作用。他说：志书“上纪天文，下察地舆，其间方名族类、坛祠往迹、物土之异宜、风俗之好尚，与夫兵刑、钱谷、水利、农田、吏治之得失、民生之利病，莫不胥于是载，洵从政之津梁、匡治之宝鉴也。”^⑭谢集成认为，志书有存

史和教化作用。他说：“凡一邑之所有悉举而笔之于书，俾后之览斯志者，按事以考其人，循名以责其实，而知忠孝节廉循声雅化，代不乏人，油然而起。其景仰前徽之念，争自立德、立功、立言，以黻黼盛世，诚志乘之光。”^⑮邱大英认为，志书有彰明史迹和垂鉴后世的作用。他说：“邑志记载之书也。考信于今，传子奕禩，使后之览者兴起而观法之。”^⑯

4. 内容说

分类。有的认为，志书内容必须按照以类相从原则进行分类记载，以做到纲举目张。如《道光镇番县志》卷首《凡例》曰：“志必有纲目。是编先之以纲，而目各以类从。因纲求目，检阅较便。”有的还认为，志书纲目设置必须从实际出发，切不可随意增损。如《道光靖远县志》卷首《凡例》曰：“志以纪事，条目之繁简视乎其事之有无。简者不能使繁，繁者不能使简。旧志以一纲统数目，欲使卷帙相称，遂不免臆为增损而疵累以生。如边隘即形胜之属，营堡即城池之属。一事而两门分见，列祥异于舆地，系职官于武备。其说皆不可通。”此说于古今修志皆有借鉴意义。

排序。清代甘肃志书门类多按天文、地理、人事顺序进行排列。如《乾隆伏羌县志》卷首目录叙曰：“天覆畴乎上，地持载乎下，故先天文，次地理。分地之一区为邑，故建置次之。有邑则有治教此邑者，故官师次之。治莫先于厚生，次田赋。教莫要于礼乐，次典礼。治道备，教化成，人物蔚起，选举行矣。……”

5. 体裁说

图。清代甘肃修志者一般都很重视图的运用。如《乾隆合水县志》卷首《凡例》曰：“凡志中舆地、城郭例各有图，以便省览。”有的还努力改进志图配制方法，如《乾隆狄道州志》卷首《凡例》曰：“地志古名图经，其文皆为释图而作。今辑志乘者，列图卷首，不与本类相附，殊失互证之意。兹志之图各随类见，以便流览，不循冠首之旧。”又曰：“左图右史犹人之

有眉目,不可不了然分列。第旧时绘者,皆依先后天卦图,南上北下,殊非画地所宜。今遵皇舆图式,京师据上游,而以南方居下承流。凡峰峦皆向上,城郭、宫室不致左右倒卧,斯为大顺之规也。”显而易见,这里所云两点改进皆有与时俱进的意义。

表。清代甘肃修志者一般都很重视表的运用。如《乾隆皋兰县志》卷首《凡例》曰:“自司马迁为年表月表,纵横之数百年事,瞭若指掌。邑志虽小,而沿革之因时、职官之任事、贡举之有人,皆足规斯土之规模焉。为表凡三。”有的还认为,志中图、考、表、传能互相发明,相得益彰。如《道光镇蕃县志》卷首《凡例》称:“盖图有形象而无经纬,表有经纬而无词说,考传则更加详矣。参而观之本末了然。”

6. 辅文说

小序。清代甘肃修志者对志书门首设置小序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有的赞同设置小序。如《道光会宁县志》卷首《凡例》曰:“前志十二门今所葺祇七门,每门各有小序。其无志者,亦有小序系之,申明未续之故。”有的反对设置小序。如《乾隆狄道州志》卷首《凡例》曰:志书“各类之首,志乘家率用弁言数语或后幅杂以议论,此班固书提纲索隐述赞之所不废,然千家雷同,徒为赘语,兹不敢蹈袭也。”这里所云“弁言数语”即指小序。有的只主张于门首设小序,反对门中节目再设小序。如《光绪通渭县新志》卷首《凡例》曰:“旧志每节皆立议论。文多事少,与志体不合。今只列诸篇首,其余不载。”此说很有道理。

注释。清代甘肃所修志书多有作注。如《乾隆狄道州志》卷首《凡例》规定:“引用书籍,必缀书名,以示称述有本。惟有疑义,应发明者,别作按语以明之。”彼时也个别志书虽有注释,但其注释内容不完整,不规范。如《乾隆合水县志》卷首《凡例》曰:“志中分行注释,采取诸书者,皆不著名氏,避冗也。”此言不能自圆其说,不可取。

二、民国甘肃方志理论要点

自民国十七年始,青海、宁夏各自独立建省,后者独立开展修志工作。虽然民国时期,时局一直动荡不安,但甘肃同全国各省一样,仍然修志不辍。随着国体的变更、社会的发展和西学的影响,民国甘肃方志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变革创新新时代,已经出现诸多方志新理念,且赢得诸多方志研究新成果。彼时甘肃还出现了著名方志学家张维。有当代学者称张维曰:“张氏的著作多有创见。是民国时代的方志、史地学研究中颇有贡献的学者。”^⑩

一、观念论

1. 方志起源说

薛笃弼认为,方志起源于古代职官制度。他说:“《周礼》大司徒掌土地之图,小史掌邦国之志。月吉岁终,以其道路、其人民、其物产、其征令政教、颁为比法,载诸册籍。此吾国郡县志由此昉也。”^⑪何昌荣认为,方志起源于上古国别史。他说:“夷考方志之始,盖出自晋《乘》、楚《杻杻》、鲁《春秋》,而其综核刑政、礼乐、风土、山川,则托体书志。”^⑫李炳认为,方志起源于《尚书》之《禹贡》和《诗经》之《国风》。他说:“方志滥觞于源于《尚书》之《禹贡》、《诗经》之《国风》。其后孟子所谓晋之《乘》、楚之《杻杻》、鲁之《春秋》,以及墨子所谓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等,皆可称之为方志。”^⑬

2. 方志发展说

自明代以来,许多甘肃学者都论及方志发展问题,但都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时至民国,随着方志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甘肃学者对于方志发展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有明显进步。其中张维对方志发展的认识最具代表性。他论方志发展曰:“方志之名肇始《周礼》,其后衍为国别之史。《左邱》、《国语》、《史记·世家》犹其遗意。汉制,诸郡计书先上太史,副在丞相。东汉以后,始有州郡之书。始惟明扬耆旧,渐而方物有志,风俗有录。至《华阳国志》、《襄阳耆旧传》,更涉载风土、政事。挚仲洽为《畿服经》一百七十卷。凡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

泉、乡亭、城廓、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视孟坚地理志，条理益加详焉。书虽不传，而方志之书作者日众。隋唐以来，诸州郡皆有图经，颇畸重地理。宋元诸志编录浸广，说者谓滥觞乐史《太平寰宇记》，而不知仲洽先此有作也。明制，郡县皆立志，爰及有清，承流弗改。计今中国千八百余，县无志者盖寥如矣。自清乾隆时，会稽章学诚建言，以史法为志法。又言经纪一方文献，必须建立三书。由是，类例益肃，而方志之学益重于世。”^⑧张氏这段话包含三层意思。“方志之名肇始《周礼》……渐而方物有志，风俗有录。”这几句是说方志名称的演变历史。“至《华阳国志》……县无志者盖寥如矣。”这几句是说地方志书的发展历史。“自清乾隆时……而方志之学益重于世。”这几句是说方志理论的发展历史。在民国，张氏能如此概括方志发展历史是比较全面和深刻的。

3. 方志学说

民国甘肃学者对于方志学问题也有所议论。刘平忻认为，方志学属历史学范畴。他说：“方志之学史学也。”^⑨李炳认为，方志学不被世人所重视。他说：“方志之学向不为学者之所重视。虽以卓识之纪昀，其所总裁之《四库全书》亦将方志收入于地理门类。重方遗志，殊为大雅之所不取。”^⑩李氏所言是符合彼时历史实际的。

4. 史志谱关系说

张维认为，史志内容互相补充。他说：“史籍之书莫繁于吾国。综古今所著录，其数盖赢十余万卷，大率言朝廷改革事为多，而兼吾社会民生者，厥惟方志。”^⑪张明道认为，史志虽体例有别，但其社会意义完全一致。他说：“志犹史也。史则综合古今治乱之由，志则备太史辘轳之采。体例虽殊，借鉴则一。”^⑫徐家瑞认为，史志谱为性质相近的一族。他说：“县之有志，犹家之有谱，国之有史也。”^⑬尚政全认为，史志谱记载范围虽有不同，但各有各的作用，皆不可或缺。他说：“尝观国之有史，县之有志，家之有谱，人

之有传，其范围虽有不同，切究其理则一也。何则？夫国若无史，则古冬治乱之由、文事武备之制、与夫国运之盛衰、政体之因革、民族之隆替、疆域之广狭、利弊之兴除、外交之得失，以及圣贤豪杰之事功、工艺商业之优劣，势必无考。县若无志，则历朝之隶属、区划之大小、人才之多寡、社会之良否、风俗之美恶、户口之增减、物产之盈绌，以及山林川泽之利益、名胜古迹之重要，势必无稽。至若家无谱牒，则宗派乱人无传记，则善恶混，固与史志有同样之关系。”^⑭

二、编纂论

1. 观念说

徐步瀛借鉴古代“胸有成竹”、“庖丁解牛”两成语所蕴含的哲理，认为文本之“志”必然是其作者心中之“志”外化的结果。他论文本之“志”与其作者心中之“志”关系曰：“画竹必胸有成竹，解牛必目无全牛，修志必心存壮志，而后竹也、牛也、志也，乃可画之、解之、修之，以奏成功。”^⑮徐氏如此阐释方志编纂观念颇具学术见地，与现代文章学原理相吻合。

2. 宗旨说

张书绅认为，修志必须以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为指导。他说：“修志的人若不纳民生问题来做历史的中心，便是无价的死史。若不纳民族竞争来做历史的纲领，便是泥古的旧史。若不纳民权消长来做历史的因革，便是专制的私史。若不纳物质进化来做历史的资料，便是无物的空史。”^⑯民国间，有的乡土志编纂者还把弘扬爱乡爱国思想作本志编纂宗旨。如1957年，朱允吉追述《民国甘肃省乡土志稿》编写目的曰：“由于原有省县各志均系大部书，披阅颇感不易，于是综合各项设施，缩写为乡土志，阅者可一目了然，并为帮助中小学校教师便于参考取材，培养青幼年认识桑邦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了解故乡一般设施情况，养成热爱乡邦，发挥其在建设上积极性，更好地建设新甘肃而出发的。”^⑰

3. 人才说

在民国时期，甘肃学者继承传统思想，多认为修

志同作史一样,必须具有“才、识、学”三长,否则就不能胜任。如陈鸿宝说:“郡邑志非史史比,然且兼表传,则犹之乎史也,非三长不胜任。”^⑥其中李鈞率先提出关于修志人才的“四长”说。他说:“方志本为史乘之一。其记述之最要关键,据刘子元、章实斋之见解,谓为无论何人何志,非具左列之四长,自不能胜其所职。”^⑦李氏所言“四长”即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李氏此说对于更新和发展修志人才理论有重要意义。

4. 规则说

详今略古。张书绅认为,修志必须贯彻详今略古规则。他说:“我们修志,若一谓是古非今,详古略今,高古卑今,信古驳今,则古者为古,今者为今。研究历史的人皆是徒啻古人耽忧的人,与今世国家的政治民生似乎莫大关系,则史学一科有不有皆可。故近来中国的史学家有重今详今,期与现代国家政治民生等有关系,且有补益,教史学一科成为有用的科学。这种道理已为有识者所同认。”^⑧张维也有类似见解。他说:“日新者时也,而学术常应之。新志有作,必将有昔无而今有,昔略而今详。”^⑨

生不立传。民国甘肃修志者继承传统,多奉行生不立传规则。如《民国徽县新志》卷首《凡例》规定:“人物仍从盖棺定论之例,若人尚生存,虽行谊卓绝,勋业烂然,概不著录,以俟后贤。”《民国重修镇原县志》卷首《编纂大意》也有类似表述。其文曰:“叙耆旧不录生存,此定例也。……盖一县之人物必盖棺而论定。”

5. 重修说

《民国重修镇原县志》卷首《编纂大意》曰:“县志原拟续修,惟旧志大纲与今内政部所定修志体例两相比较诸多不合,不若重修,以弥其阙。因遵照部颁体例,依次排纂,而仍根据旧志,凡旧志之是者从之,误者正之,缺者补之,纷者理之,不适用者删之。”这段话含两层意思。前半部分说明不取“续修”而取“重修”的基本理由。后半部分是说明“重修”的基本

任务,即“是者从之,误者正之,缺者补之,纷者理之,不适用者删之”。

6. “四蔽六习”说

民国张维在广泛阅读旧志基础上,曾把古今修志主要弊端概括为“四蔽六习”。他断言曰:古今修志“皆有四蔽六习。何谓四蔽?蔽乎古者疏乎今也,蔽乎文者略乎质也,蔽乎人者轻乎事也,蔽乎钞撮者丧乎系统也。何谓六习?习夫天官之说者侈著星野事应矣,习夫堪舆之说者侈著龙脉结穴矣,习夫神仙之说者侈著神话传闻矣,习夫辞章之说者侈著诗赋文辞矣,习夫方輿胜览者侈著八景十景矣,习夫通鉴纲目之说者侈著褒贬删削矣。此四蔽六习,弥漫于方志之域,是故所谓详而能真者,盖十不得其一二。”^⑩张氏此说颇具学术见地,很值得古今修志者引以为戒。

三、文本论

1. 称名说

张维认为,方志取名当用“今名”,否则就会有不合“时制”之嫌。他评《乾隆中卫县志》曰:“凡方志标题必用今名,所以昭时制也。”此志“凡例、总目皆云应理志草,以元代州名题清朝县志,则好古而失例矣。”^⑪

2. 性质说

何昌荣认为,从效用看,方志兼具史、地两属性。他说:“揆之近世科学,殆合史地而一之。史与地殊科而同用,相乘而互翼,原无严格之界划,故吾国四郡属地于史,而西洋地理学家又多以地释史,合史与地,然后能经纬旁通,而为一切国家建设之所根据。此方志之为用也。”^⑫

3. 作用说

黄汝宪认为,县志如家谱,皆有存史作用。他说:“一县之有志,犹一家之有谱。谱失,斯一家昭穆、考妣、伯叔、父子、兄弟皆泯灭而无考。志成,则一县山川、道里、土地、人民、政事一展览焉即知。”^⑬牛培炯认为,志书有备忘或帮助记忆作用。他说:

“今以天下之大，今古之遥，事理之繁，名物之异，皆欲识诸吾人之一心，而数典不忘，夫亦安得而能之哉？然惟心不能识则必识之于书，彼不能识则必识之于此。由是一人所识举千万人皆得识之，一时所识举千万世皆能识之。是即志之所由作也。”^⑧

4. 内容说

新增。民国甘肃修志也同全国一样，开始增加民族、民生、民政、经济、社会等新门类。这一发展新趋势，也曾得到彼时学界的充分肯定。如颜永楨称《重修镇原县志》曰：此志“最足令人主义者，以民族、民生、民政立目，可为修志者另辟一新纪元。”又称此志注意记载人民曰：“斯志注重人民无所不包。有邑坛便知民族之信仰若何，有家庭便知民族之组织若何，有社交便知民族之礼节若何，有衣食住便知民生之生活若何，有娱乐便知民生之愉快若何，有疾病便知民生之死亡若何。凡此种种是与人类之生活息息相关，和盘托出，大有益于社会文化升降之考核。”^⑨

分类。民国甘肃所修志书多数按事项进行分类。如《民国崇信县志》卷1《凡例》曰：“志分舆地、建置、经政、学校、武备各门。”彼时也有少数志书仿效旧例，仍按文体进行分类。如《民国重修镇原县志》卷首《凡例》说：“新志仿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例，以图、表、志、传为四纲，以纲统目，以类相从。”

排序。张维认为，志书门类排列当首置“建置疆域”，以首先确定时空位置。他批评《光绪文县志》排目不当曰：“各志多首地图，而次星野、祥异，是未知县之建置、疆域而先知其祥异也。此志亦然，实非志法也。”^⑩张氏还有一个观点，那就是在志书门类排列中，必须先“沿革”，后“疆域”。他批评《嘉庆徽县志》排目不当曰：“疆域、沿革均应为地理之一目。此志析为二志，沿革居疆域后，未知沿革而先读疆域之形胜、山水、古迹、镇所，已若倒置。”^⑪现代哲学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必须以特定时空为前提。因此张氏此说颇具学术见地，对于后世志书门类排列有指津意义。

5. 分志取名说

民国学界在分志取名上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取名为志，另一种是取名为考、略等。李炳赞同前者，反对后者。他申述理由曰：“盖书既以志名，分目不应如章氏之自矜奇异，又析为若考、若略、若传。况考、略之名含义广泛，无一定之系统可系。谓为文献可考，山川自亦可考。政事可略，人物自亦可略。至于传之体例，虽属由来已久，然如左氏之记事、司马之记人，原可通用，靡有定体，自不如取于志，义之为适当。”^⑫李氏如此申述颇为在理。

6. 图照说

民国甘肃修志者继承传统思想，颇重视图照在志书中的运用。如《民国重修灵台县志》卷首《凡例》曰：“左图右史为古所重。修方志者尤以舆图为本，取其展卷了然，如明掌上螺纹，庶免凭空想象，终归惆怅。旧志于此多失，兹故详插图绘，登之于首，且以名卷，为补阙耳。”《民国重修镇原县志》卷首《编纂大意》对于图照配置问题更有详细说明。其文曰：“绘图、照片二者缺一不可。近《北平志》为庙宇志长编，以照片与平面图并列。新志卷首以文庙、学校各照片入志，可祛漫漶不正确之弊。惟所照仅能示建筑之片面。全部位置尤关重要，非另绘平面图不可，非惟公共建筑为然也。即外镇城市与村庄堡寨之类，亦应以图片存其实状。”

7. 小序说

民国甘肃修志者继承传统志例，多于各门之首设置小序。如《民国创修渭源县志》卷首《凡例》曰：“每分一卷必有一义，非泛设也。故于卷之首每各以数语揭其要而隐括其条理。”《民国新纂康县县志》卷首《凡例》亦有类似规定，其文曰：“是书每卷首仿照续志，各冠题引，掣领提纲，以示不紊前人成例，庶展卷不至茫然。”这里所言“题引”意同小序。民国时期，在甘肃所修志书中，也有一些志书不设门首小序。如《民国东乐县志》卷首《例言》规定：“每门开卷径书史事，不列小序，一遵五凉、甘州、各志先例，从

简朴也。”

由上所述可知,古代甘肃在方志理论研究上所取得成就是巨大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前方志学界对此问题一直有所忽视。故近年有学者慨叹曰:“时至今日,尚未见到系统、完整的关于甘肃方志理论的著述,即就是专文论述也十分罕见。”^⑨为促进对古代甘肃方志理论发展问题的研究,笔者利用当下诸多有利条件,试就古代甘肃方志理论发展问题作如上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注 释

① 郝玉屏主编《甘肃方志通览》第29~30页、第42~43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详见顾宏义著《宋朝方志考》第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③ 详见顾宏义著《金元方志考》第37~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④ 李梦阳《作志通论》,李梦阳著《空同集》卷59。

⑤ 朱璉《重修何志序》,《嘉靖河州志》卷首。

⑥ 杨应聘《朔方新志序》,《万历朔方新志》卷首。

⑦ 杨守礼《重修宁夏新志序》,《嘉靖重修宁夏新志》卷首。

⑧ 李梦阳《作志通论》,李梦阳著《空同集》卷59。

⑨ 管律《重修宁夏新志后序》,《嘉靖重修宁夏新志》卷末。

⑩ 管律《重修宁夏新志后序》,《嘉靖重修宁夏新志》卷末。

⑪ 邹浩《刻宁远志引》,《万历刻宁远志》卷首。

⑫ 胡纘宗《安庆郡乘引》,胡纘宗著《乌鼠山人小集》卷10。

⑬ 陈瀛《秦安志跋》,《嘉靖秦安志》卷末。

⑭ 刘承学《河州志序》,《嘉靖河州志》卷首。

⑮ 刘承学《河州志序》,《嘉靖河州志》卷首。

⑯ 耿尚义《秦安志跋》,《嘉靖秦安志》卷末。

⑰ 朱璉《重修河志序》,《嘉靖河州志》卷首。

⑱ 刘文琦《重修巩郡志引》,《康熙巩昌府志》卷首。

⑲ 王珣王珣《弘治宁夏新志序》,《嘉靖重修宁夏新志》卷首。

⑳ 刘泽远万历礼县《申请修志详文》,《乾隆礼县志》卷首。

㉑ 龙池子《河州志后序》,《嘉靖河州志》卷末。

㉒ 王珣《弘治宁夏新志序》,《嘉靖重修宁夏新志》卷首。

㉓ 胡汝砺《弘治宁夏新志后序》,《嘉靖重修宁夏新志》卷末。

㉔ 胡纘宗《嘉靖秦州志序》,《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首旧序。

㉕ 刘应熊《徽郡志叙》,《嘉靖徽郡志》卷首。

㉖ 李梦阳《正德德安府志序》,《光绪德安府志》卷首《旧序》。

㉗ 秦大夔《重修通渭县志序》,《万历重修通渭县志》卷首。

㉘ 曾诚《敦煌县志序》,《道光敦煌县志》卷首。

㉙ 罗元琦《宁远县志续略序》,《乾隆宁远县志》卷首。

㉚ 周铤《伏羌县志叙》,《乾隆伏羌县志》卷首。

㉛ 程德润《皋兰县续志序》,《道光皋兰县续志》卷首。

㉜ 文安《巩昌府志序》,《康熙巩昌府志》卷首。

㉝ 刘继《鹤山县志序》,《乾隆鹤山县志》卷首。

㉞ 屠文焯《乾隆两当县志跋》,《道光两当县志》卷首原跋。

㉟ 怀兄沛《纂修成县志叙》,《乾隆成县新志》卷首。

㊱ 明德《狄道州志序》,《乾隆狄道州志》卷首。

㊲ 张澍《代文观涛明府重修南昌县志序》,张澍著《养素堂文集》卷5。

㊳ 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三)第1417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 ③⑨ 邢澍《长兴县志序》，《嘉庆长兴县志》卷首。
- ④⑩ 张金城《宁夏府志序》，《乾隆宁夏府志》卷首。
- ④① 华国《狄道州志序》，《乾隆狄道州志》卷首。
- ④② 邢澍《长兴县志序》，《嘉庆长兴县志》卷首。
- ④③ 张廷枚《静宁州志序》，《乾隆静宁州志》卷首。
- ④④ 欧阳永?《静宁州志序》，《乾隆静宁州志》卷首。
- ④⑤ 王机《泾州志序》，《乾隆泾州志》卷首。
- ④⑥ 顾竟成《康熙通渭县志序》，《光绪通渭县新志》卷首《旧序》。
- ④⑦ 黄璟《山丹县续志序》，《道光山丹县志》卷首。
- ④⑧ 秦武域《乾隆两当县志序》，《光绪两当县志》卷首《原序》。
- ④⑨ 曹晟显《安定县志跋》，《康熙安定县志》卷首。
- ⑤⑩ 王机《泾州志序》，《乾隆泾州志》卷首。
- ⑤① 谢集成《镇番县志序》，《道光镇番县志》卷首。
- ⑤② 邱大英《西和县志序》，《乾隆西和县志》卷首。
- ⑤③ 《中国方志大辞典》“张维”条，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⑤④ 薛笃弼《重修崇信县志序》，《民国崇信县志》卷首。
- ⑤⑤ 何昌荣《临泽县志序》，《民国临泽县志》卷首。
- ⑤⑥ 李鈬《重修镇原县志跋》，《民国重修镇原县志》卷19《附新志书跋语》。
- ⑤⑦ 张维《陇右方志录序》，张维著《陇右方志录》卷首。
- ⑤⑧ 刘平圻《重印靖远县志序》，民国重印版《道光靖远县志》卷首。
- ⑤⑨ 李鈬《重修镇原县志跋》，《民国重修镇原县志》卷19《附新志书跋语》。
- ⑥⑩ 张维《陇右方志录序》，张维著《陇右方志录》卷首。
- ⑥① 张明道《重修崇信县志序》，《民国崇信县志》卷首。
- ⑥② 徐家瑞《新纂高台县志自序》，《民国新纂高台县志》卷首。
- ⑥③ 尚政全《华亭县志序》，《民国华亭县志》卷首。
- ⑥④ 徐步瀛《华亭县志序》，《民国华亭县志》卷首。
- ⑥⑤ 张书绅《华亭县志序》，《民国华亭县志》卷首。
- ⑥⑥ 朱允吉《甘肃省乡土志稿自序》，《民国甘肃省乡土志稿》卷首。
- ⑥⑦ 陈鸿宝《创修渭源县志序》，《民国创修渭源县志》卷首。
- ⑥⑧ 李鈬《重修镇原县志跋》，《民国重修镇原县志》卷19《附新志书跋语》。
- ⑥⑨ 张书绅《华亭县志序》，《民国华亭县志》卷首。
- ⑦⑩ 张维著《陇右方志录》“乾隆中卫县志”条。
- ⑦① 张维著《陇右方志录·序》。
- ⑦② 张维《陇右方志录序》，张维著《陇右方志录》卷首。
- ⑦③ 何昌荣《临泽县志序》，《民国临泽县志》卷首。
- ⑦④ 黄汝宪《新纂康县县志序》，《民国新纂康县县志》卷首。
- ⑦⑤ 牛培炯《大通县志弁言》，《民国大通县志》卷首。
- ⑦⑥ 颜永楨《重修镇原县志跋》，《民国重修镇原县志》卷19《附新志书跋语》。
- ⑦⑦ 张维著《陇右方志录》“嘉庆徽县志”条。
- ⑦⑧ 张维著《陇右方志录》“文县志”条。
- ⑦⑨ 李鈬《重修镇原县志跋》，《民国重修镇原县志》卷19《附新志书跋语》。
- ⑧⑩ 郝玉屏主编《甘肃方志通览》第154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浙江省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

甘肃省志续志编纂的几点思考

贺红梅

内容摘要:甘肃省二轮省志编纂工作处于关键阶段,续修志书在继承前志的基础上如何创新成为广大修志工作者共同探讨的话题。本文总结了甘肃省首轮省志编修的经验与不足,从省志篇目设计、记述内容等方面对实现省志续志编纂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省志编纂 经验与不足 继承与创新

当全省二轮省志正在加紧编纂之际,续修志书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成为广大修志工作者共同关心的话题。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来,方志界同仁已做了多方面的探讨,有些问题已经取得共识,但如何使我省的二轮省志在继承上既要继承传统的修志经验,又要继承首届修志的工作经验;既要继承传统史德和严谨朴实的学风,又要更好的发扬当代修志工作者“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创新上既要切合实际,又要推陈出新;既要有记述内容的创新,又要有工作机制的创新,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一、甘肃省志基本情况

甘肃现存旧志书中省志共3部,分别是(乾隆)《甘肃通志》、(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和(民国)《甘肃通志稿》。乾隆时期李迪等主编的《甘肃通志》,又称《敕修甘肃通志》,全书50卷,约88万字,是甘肃历史上的第一部省志。该志的体例、取材、编纂格式是以《陕西通志》为范本,但考证、补漏、增加的内容约占一半以上。把甘肃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矿产资源、工农业生产、水利建设、军事、政治等均载入志书,共分36目,以目述事。此志为《四库全书》本,是甘肃历史上第一部省志。该志体例上为零散的条目体,基本上没有著述性,资料也过于简略。民国方志学家张维评论此志说:“惟以始创,采辑多录取府、

州、县志,依据疏误。沿革山川往往直录旧志,不加考证……盖官修之书,经历六七年,执笔者已数易其人,故矛盾讹误时所不免。”甘肃的第二部全省通志为宣统元年由安维峻总纂的《甘肃全省新通志》。共100卷,81册,计325万字,属重修志书。除卷首的《纶音天章》外,共分8志,外加“志余”一编。“志”及“志余”下分目叙事。由于此志工程庞大浩繁,用时又短,仅两年时间,所用资料缺乏去伪存真之工,也欠分析考证,错讹不少。另《纶音天章》占去15万字,人物志多达150万字,占全志47%,而对实业包括农、工、商、矿仅用了3000余字,内容文字悬殊过大。民国25年有张维总纂的《甘肃通志稿》,全志共130卷,450万字,分17纲,93目。全志上起远古,下迄民国17年(1928)甘、宁、青分省为止。该志结构严谨,资料翔实,文字简赅,是在前志的基础上对前志的错误、舛漏做校正补阙。

甘肃省新编社会主义新方志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省、市、县三级修志格局。1983年甘肃省第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根据吴治国等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通过《关于重视编修甘肃地方史志的决定》。之后相继成立了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和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1985年5月,省政府批准《〈甘肃省志〉编纂方案》(试行草案);1989年10月省志编委会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关于

《甘肃省志》的总体设计》，确定《甘肃省志》卷目为73卷，以后，又针对编纂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采取撤、并、转、补的方式，将省志卷目调整为72卷73册，止2014年4月全部终审完成。二轮省志规划72卷，启动于2004年，截至目前，已出版14卷，终审8卷，复审7卷，正在抓紧编纂的43卷。

二、首轮省志编修的经验与不足

过去的30年，是甘肃修志工作取得成果最多的30年，也是不断探索创新的30年。从总体上看，首轮省志在数量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在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上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部旧志。在组织机构上，实行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志办负责是一条重要经验，也是首届修志的成功之路。这种体制一是有利于提高和统一各级党政领导对修志工作的认识，加强领导，为修志工作提供组织保证。二是有利于把修志工作纳入到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去，真正实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三是有利于形成主要领导重点抓、分管领导组织实施、部门协调配合的有效工作机制，及时研究解决修志工作中遇到的重大关键性问题，保障修志规划、任务落到实处。在队伍建设上，各部门以建立专业的史志鉴机构，或以办公室、研究室、档案馆（室）为依托，安排素质较高的修志工作者，聘请一批熟悉地情的老同志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直接参与修志工作。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专、兼职结合，相互合作，拾遗补缺，才能够编纂出高水平的新志书。在运作规范上，形成制度化运作程序和运行机制，志书质量得到了保证。要使修成的志书成为社会发展的真实记载和生动写照，服务当代，泽被后世，就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修志工作制度和审定出版制度。自修志工作开展以来，甘肃省先后制定了《地方志书审定出版的暂行规定》《地方志行文规范》和《地方志档案资料管理意见》《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等规章制度，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志稿评议会

制度和三审定稿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高质量志书的编写、审查和审批出版，避免了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疏漏，对把握志书观点的正确性，体例结构的合理性、史实的准确性和内容的完整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编纂宗旨上，确立了“修以致用”的修志宗旨，使新方志的功能和应用范围，从主要为统治阶层服务扩展到为全社会服务。在内容体裁上，首轮省志全面系统地记载社会各个领域的历史与现状，既灵活吸纳了序、例、图、照、述、记、志、传、表、考、录、引等多种体裁形式，又通过周密的组合，在体裁运用上实现了科学排列与合理交织，使志书的体例形态比旧志更加完美，确立了作为国情书、地情书的学科定位。在总体结构上，首轮省志分门别类地客观再现事物发展的动态过程，这是历史上任何旧志都无法达到的境界。在资料取舍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存真求实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辨真伪、考正误，站在历史、地域和全志高度，根据实际灵活运用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使其资料更加丰富翔实，史料更加准确可信，实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在表现体式上，方志界普遍进行了条目式、纲目式（类目式）、编章节目式等多种体式的研究探讨和有益尝试。在已出版的首轮省志中，第三种体式是普遍采用的形式，总体上序列清楚，层次明晰，领属严密，结构规范，符合系统分类原理，便于检索查阅，有效消除了资料堆砌弊端，加强了志书的整体性、有机性和逻辑严谨性。在编写章法上，继承并深化了传统志书“以类系事”的原则，普遍采用了“横排门类，纵分层次，依时记事”的编写方法以及“横不缺主项，纵不断主线”的基本要求，使志稿的编写更加有章可循。在文体文风上，普遍采用现代白话语体文记述，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简化字方案、标点符号使用规定和语言文字的使用规范，行文力求准确、简明、朴实、流畅，讲究修辞，增加可读性，坚持述而不论，用史实说话，不夸张、不溢美、不隐恶、不追求华丽词藻，使志书成为科学的、严

谨的、朴实的资料汇集。在篇目框架上,依据科学的系统分类原理和社会现实分工,注重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专业行业特色,主体分志设置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有大编体、中编体和小编体类型,基本上都能体现各自的体例要求,对志书内容资料起到了很好的统领作用。

首轮省志编修值得肯定的方面还有很多,这是广大修志工作者30年心血的结晶,但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反映在指导思想、资料内容、篇目框架、文体文风上,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从管理机制上讲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的单位党政领导思想认识不明确,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不够,“一纳入,八到位”的方针没有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二是有的部门的修志工作处于边缘化状态,修志机构不健全,修志队伍不够稳定。三是工作进度比较缓慢,总体发展不平衡,修志的总体格局、内在联系和横向联系相脱节,使修志工作缺乏整体性。四是修志队伍年龄结构偏大,业务骨干欠缺,知识结构不合理,人员整体素质与新时期修志工作的要求,与出版精品志书的目标相比尚有一定距离。五是宣传工作缺乏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公众对修志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取得的巨大成绩缺乏了解,有相当一部分方志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

从修志业务上讲,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在志书资料的选择上,存真求实与秉笔直书尚存差距。对政治运动的记述回避绕道,或避重就轻。如对“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因种种原因,不少志书在“宜粗不宜细”的托词下,没有将其在本行业发展过程记述清楚,更没有记述其所造成的破坏。在篇目结构上,主要是因总体设计造成的志书内容上的不完整而使篇目结构残缺不全,例如:首轮《甘肃省志》没有方志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地理志和建置志,使整部省志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在文字表述上,由于资料的来源大部分是档案资料 and 各类总结、安

排、文件等,在入志时没有按志书语言的要求进行必要的精细加工雕琢,每部志书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报告式、总结式的程式化套话、空话、大话,降低了志书的著述性。在资料的筛选和去伪存真的考证上,由于工作中的疏漏,造成入志资料在同一志书中自相矛盾或与其他志书不一致的硬伤,这种情况志书正文的文字上和照片的文字说明中都有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志书的质量。如首轮《甘肃省志·交通志》将文县临江白龙江羊儿坝大桥说成洮河羊儿坝大桥,将文县石坊白水江伸臂木梁桥说成是文县城南门外白水江上的阴平桥。首轮《甘肃省志·粮食志》与《甘肃省志·供销志》用了李鹏的同一张照片,文字说明中李鹏的职务和拍照时间地点各不相同,一处说是总理,另一处说是副总理。在志稿完成后的出版问题上,有的急功近利,不负责任,以致酿成页码前后颠倒、位置错乱、排印差错、漏印、多页、少页、缺页等严重问题,造成不好的影响等等。

三、续修省志的继承与创新

1. 省志篇目设计上的继承与创新。

续修省志的篇目设计,其实就是解决如何分类设志的问题。续志的篇目设计,目前方志界众说纷纭,但总的来说可归纳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续志篇目结构不宜作大改动,以利于与前志衔接,方便检索。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在继承前志的基础上有较大创新。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如何做好续志的篇目设计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要科学分类。不管续志的篇目如何变化,科学分类的原则不能改变,科学分类、横分竖写是志书的主要特征,也是志书与其他著作的主要区别所在。不同的著作有不同的编纂形式,不能将志书编写成其他类型的著作。省志涉及多个门类,必须本着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分类原则分类设志,不然就会乱套。科学分类应做到三要:一要分类得当,以体现科学性;二要编排有序,科学地反映各门类之间的

内在联系,形成有机整体;三要突出时代特点,突出地方特色。

(2)要处理好社会分工与科学分类的关系。首先必须明确不能单纯按社会分工设志,不然编出来的是部门志,不是专业志。设计续志篇目时要以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为依据,破除部门和行业的界限,按照事物分类设志。此外,续志的分类还要研究新情况,分析新问题,准确反映时代的发展变化情况。

(3)要处理好前后志的关系。首届省志的分类、篇目设计在批判性地继承旧志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摆脱了旧志的窠臼。续志是首届修志工作的延续,因此,续志的篇目设计首先要传承前志篇目的全面性、科学性和系统性,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同时,续志的内容不是前志内容的简单延续,续志的篇目设计应在继承前志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使续志篇目具有时代感。但是创新要符合志体和章法,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4)要妥善考虑改革开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续志要加强改革开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记述,这一点方志界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在分类设计篇目时意见不太一致。有的人认为可将改革开放的内容集中在一起,单独作为一个门类写,理由是为了充分反映改革开放的情况。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理由有四条:①改革开放是一项总政策,不是一个门类,而志书讲求“类为一志”,将改革开放作为一个门类去记写,有悖于志体。②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改革开放,涉及面很广,如果将改革开放的情况集中在一起写,必须将这部分内容单独抽出来,这样势必影响了各部专业志内容的完整性,甚至可能会出现交叉重复的现象。③充分反映改革开放关键不是形式,而是如何写好、写深、写透,用资料去说话。④各行各业改革开放的情况比较复杂,谁也无法综合性地去记述。我们采用的是“众手成志”的编纂方法,众人分工写作,难以合为一体,势必为以后统稿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至于精神文明建设情况的入志问

题,我倒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因涉及到各个部门和各个行业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分散记述,难以看出整体情况,而且会出现类似的重复与交叉。因此,可以单独设为一个门类记述,便于保持这方面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2. 省志记述内容上的继承与创新。

续志内容要充分反映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充分反映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续志的主要内容。记述改革开放要注意:要全方位反映改革的情况。改革总的来说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两大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机构改革,建立公务员制度,政企分开等等,这些方面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范围很广,比如企业制度改革、流通体制改革、计划管理体制、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等。此外,还进行了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科技、文化、教育体制改革等。在对外开放方面,打开了国门,招商引资,成立了不少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吸引外商来投资办企业。同时要充分认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写出深度。内容的取舍上要详动舍静。这里所说的动是指动态的事物,也就是各行各业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情况;静,是指相对静止,短期内没有什么变化的事物。续志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动态事物,对一些静态事物,如建置沿革等长时期不变的东西不必再写或详写,可在续志的总述中扼要提说一下。续志对一些静态事物可不必再记。但是,要注意写好环境保护这一部分,如环境监测、污染治理、退耕还林以及为保护生态环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3.续志既要继承传统史德和严谨朴实的学风,更要发扬当代修志工作者“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

修志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一贯倡导严谨朴实的学风。清初，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注重实地调查。他为了考证史料，游历北方诸省二十余年，用骡子载运图书文献随行。故其著作“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他这种“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章学诚是集传统方志理论之大成者，他提出“志属信史”，要遵循“史家法度”，主张修志要“乘二便”、“尽三长”、“除八忌”、“归四遥”、“立三书”，他的这些理论之今仍有借鉴作用。我们要学习前人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更要继承他们的优良“史德”和严谨学风，并在续修工作中加以发扬光大。

甘肃省新编地方志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截至目前，累计出版和终审的三级志书249部，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可供开发和利用的信息资源库，也为新方志续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广大修志工作者，在工作辛苦、条件艰苦、生活清苦的条件下铁心修志，大家谨遵“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先贤遗训，发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涌现出一大批“有胆有识、开拓进取、淡泊名利、埋头修志”的先进模范人物，有的为修志事业献出了青春与生命。我省志书编纂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离不开甘肃6000多修志人30多年来的艰苦努力与无私奉献，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这种精神，为全面完成二轮省志编纂任务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处长）

甘肃省志九部专志通过复审

2017年1月至9月，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共完成《甘肃省志·审判志》《甘肃省志·人口与计划生育志》《甘肃省志·档案志》《甘肃省志·检验检疫志》《甘肃省志·出版志》《甘肃省志·人民代表大会志》《甘肃省志·统计志》《甘肃省志·测绘志》《甘肃省志·质量技术监督志》九部志书的复审。复审通过的九部志书，在编纂中均能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志稿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准确，篇目设置合理，体例要素完备，符合新编志书的要求和质量规定。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余德艳供稿）

突出时代特色是二轮志书编纂的关键

石为怀

内容摘要: 编纂二轮志书是首轮修志的延续,二轮志书是断代志,主要记述上世纪80年代到2010年前后的20多年这一时期一地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这一时期的鲜明特征就是改革开放,涉及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真实、客观、准确的记述改革开放,彰显时代特色是志书的本质属性和客观要求,也是二轮志书编纂成功与否的关键。本文从如何体现时代特色、怎样彰显时代特色及彰显时代特色要解决好的几个问题3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以期对修志工作者有所启迪。

关键词: 二轮志书 编纂 时代特色

近年来我有幸评议审读了部分市(州)县(市、区)志,总体上讲,二轮志书质量普遍比较好,在篇目框架的合理性、分类的科学性、记述的详实性、资料的完整性等方面与首轮志书相比都有明显的进步,尤其是装帧更精美、图照更丰富,充分运用了现代科技成果,时代气息更为浓郁。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篇目框架不完善、分类标准不统一、排列次序不合理、标题名称不规范、图表编排不美观、附录收录较杂乱等,特别是在彰显时代特色方面做的不够好,应引起高度重视。

二轮志书与首轮修志明显的不同之处是二轮志书是断代志,他反映的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到2010年的20多年。这一时期是我国全面改革开放的时期,是由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产品供应不足向商品极大丰富供应过剩转型,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型的时期,更是改革开放由局部到整体、由微观到宏观、由浅表到深层的时期,改革涉及各行各业、方方面面,涉及每个家庭每个社会成员。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改革开放。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要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一地的自然、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二轮志书客观真实的记述改革开放不仅是方志的本质属性要求,也是彰显时代特色、尊重历史的客观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讲,二轮志书编纂的好坏、成功与否,关键看是否突出了改革开放这一时代特征。

一、二轮志书如何体现时代特色

二轮志书体现时代特色不是单一的局部的,而应是整体的全面的。不仅体现在主观立意上的有意为之,而且体现在记述要准确真实的客观要求上;不仅体现在篇目设置上,而且体现在记述内容的重点把握上等等。

1. 在指导思想体现时代特色。这就是一定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编纂的是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遵循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修志原则,是“官书官修”,不是个人作品,因此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也是与旧方志的明显区别。

2. 在志书的记述内容上体现时代特色。二轮志

书记述的时段,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时期,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变化日新月异的时期。因此二轮志书要突出“新”字,着重记述新社会、新制度、新的科学技术和各种新生事物。要突出“新”字,也要注重“变”字,记述社会变革,事物变化,反映发展的阶段性。从我审读评议的几部志稿看,一些志书显得平淡,重要原因便是缺乏新意,没有记载变革和变化,没有反映出历史的进程。

3. 在编纂重点上体现时代特色。志书是一方之全史,全面反映一地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但这并不意味着各部类的平衡记述,而是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有所侧重,就是要突出记述重点。如商业体制改革、工业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二轮志书记述的重点。同时在记述过程中,也不是面面俱到,要突出某一事业的发展变化、起伏转折。如在记述改革开放时,不仅要记述中央改革政策的贯彻落实,更要记述政策落实本地化的具体措施、实施过程和执行结果。我看到有一部县志在记述商业体制改革时,记述了本县商业职工下岗的数量,政府对下岗职工的安置标准、下岗职工的人数和安置资金额度等,很真实,资料性非常丰富,重现了当时商业体制改革的情况。

4. 在框架结构上体现时代特色。制定篇目必须遵循分类科学、门类齐全的原则,要力求表现出门类的相互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此前提下,在设置篇目时,要有意彰显时代特色。比如专门设立改革开放的篇、章、节,专门设立经济开发区、创业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的篇、章、节。当然这既要考虑科学分类,又要反映当今社会的实际。

5. 在语言文字方面体现时代特色。新方志要求用现代规范的语体文记述,反对文白夹杂,对历史纪年、数字用法等,执行现代行文的统一要求。新时期也出现了大量被社会大众广泛认同和接受的新名词、新语言等等,这些也是二轮志书应予记述和反映

的。

6. 在志书的编辑工艺和出版方面体现时代特色。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电脑打字排版、数码照排已被广泛应用,装帧设计、印制工艺日趋精良。而且,从文字出版又发展到音像出版,更发展到电脑上网,随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地方志书的出版也越来越符合现代化的要求。这也是一种浓郁的时代气息。

二、二轮志书怎样彰显时代特色。

二轮续志记述时段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因此在记述上要抓住改革开放这条主线。一是记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映时代的主旋律,志书必须反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国情。二是记述改革开放,反映全社会发生的变化。新一轮修志要深化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这是反映鲜明时代特点的前提,也是本轮所修志书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脉络。三是记述精神文明建设,反映对物质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新方志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记述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新一轮志书突出反映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新时期鲜明时代特点的重要标志。

1. 在篇目设置上彰显时代特色。基本上有3种做法:

集中设置改革开放专篇。采取集中记述的办法,目的是鲜明地突出这个时代的主题。但过于集中将改革的内容与各专志割裂开来,缺乏完整性,同时也容易造成交叉重复。

集中和分散相结合设置。即集中设置改革开放的专门篇章,记述涉及全局的重大改革内容,又在相关篇章里记述与部门、行业紧密相关的专项改革内容。集中是相对集中,即对那些涉及全局的重要的改革开放内容进行集中记述,如设立改革开放、体制改革、开发区建设等专篇。分散就是将专篇中容纳不了的各行各业改革开放的内容,分散到其他各篇章中进行记述。这种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设置改革

开放篇目的办法,好处是十分明显的。集中,可以突出地从宏观上反映一地改革开放的主要过程、主要政策措施、主要成果成绩,有利于突出新时期的主旋律。分散,可以反映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是与各行各业密切相关的,有利于从微观上反映一地改革开放的广泛性、深刻性和群体性。

分散设置。分散设置篇目是将改革开放融入各行各业各项事业中进行记述,贯穿于全书的始终。除在概述中对改革开放作宏观记述,在大事记中记改革开放的大事之外,在各篇下立章或设节对开放进行记述。这种办法的优点是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与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揭示了改革开放是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动力,同时也使人看到改革开放伴随着各项事业发展而不断深化、不断完善,而且也有利于调动各行各业各部门修志人员积极收集资料和认真编写志稿。这种办法的不足之处是在篇目的第一层次上位置不显著。

从实践来看,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设置方法比较稳妥,简便可行。

2. 在记述内容上彰显时代特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发展的加快,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出现了许多首轮志书编纂时还没有出现和尚未发展充分的内容,二轮志书要对这些予以详记。如中介服务、家政服务等新兴的服务业,如信息业、旅游业、证券期货业、房地产业,如高速公路、小城镇建设、文化市场、社会办学等,这些既是新的经济业态、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新时期的发展亮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这些内容的记述要全、要深、要透、要重。

3. 在记述重点上彰显时代特色。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二是经济建设,三是社会文明进步。围绕这三个重点,在篇目设置、资料收集、志书编纂等方面下功夫,分别采用篇目升格法、浓墨重彩法、资料深度挖掘法等方式方法来彰显时代特色。

三、彰显时代特色要解决好几个不足。

彰显时代特色是二轮志书编纂成功与否的关键。但也不能为彰显特色而勉为其难、刻意为之。过犹不及,反而影响志书的质量。通过审读评议我省部分市(州)县(市、区)志书,发现有几个明显不足,应注意解决好:

1. 重结果轻过程的不足。记述改革时没有起始转折,缺少对改革的主要方面、主要措施和主要过程等方面的记述。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不能全面、客观地理解,达不到相应的高度。改革涉及全方位,是利益的调整,是矛盾的碰撞,是一场全面的、深层次的、动态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变革。因此,新一轮修志要写出改革的原因、过程和主要方面,改革在志书下限表现的最终结果。

2. 重成绩轻失误的不足。当前普遍存在的是只记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不记问题和失误。记述改革开放出现的失误问题时,要保持坚定的政治方向,要端正对改革的认识态度,即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改革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而出现的问题和失误是局部的现象,可以从问题中得到启迪。在记述失误的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记述采取什么措施和办法弥补这些失误和问题。新一轮修志不能片面地只写成绩,不写问题。否则就失去了志书“存史资治、益启未来”的功能。

3. 切点不准交叉重复的不足。在同一部志中,同样是记述一个具体的事物,不同的单元可选择不同的记述角度。概述可以侧重于“概”,站在全书的制高点,将这个事物放在整体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反映,着重写出事物的历史地位;有关章节要选准切入点,对事物展开详细的记述;大事记则本着“一句话新闻”的原则,点到为止。

(作者: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市县志指导处处长)

河西归汉相关问题考辨

孙占鳌

内容摘要:元狩二年春,汉武帝派霍去病第一次征战河西的胜利,为河西归汉奠定了基础;元狩二年夏,汉武帝派霍去病第二次征战河西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匈奴在河西的有生力量,是河西归汉的先决条件。浑邪王、休屠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意欲降汉,但休屠王中途反悔,匈奴部众“多”欲逃散。关键时刻霍去病果断地制止叛乱,将河西地区完全收复。两汉时期,匈奴斗争一直是西北民族关系的焦点;河西归汉后,汉匈斗争并没有停止,汉王朝的河西经略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汉匈斗争来展开的。汉王朝通过一系列河西开发的措施,坚决反击匈奴,有效地保障了河西安全、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河西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河西归汉 霍去病 汉匈斗争

河西地区归入汉王朝的版图,是西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历史事件,从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到现代学者白寿彝的《中国通史》,谷苞的《西北通史》,刘光华的《甘肃通史》均有记载,结论大体一致。这就是,元狩二年(前 121 年),汉武帝派霍去病两次征战河西,彻底击败匈奴,迫使河西残余匈奴投降,使河西地区正式纳入了汉王朝的统辖范围,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此后,汉王朝通过“列四郡、据两关”,移民实边等举措,对河西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然近来有学者提出“汉朝和平接管河西,不由攻夺强占”。^①具体观点有三:“第一,匈奴浑邪王率众归汉,是抗拒单于苛暴枉诛而采取的求生之举;是单于逼出来的,不是汉朝迫降的;第二,匈奴浑邪王率领河西人民连同河西之地一并归汉,汉朝则和平接管河西之地,并非霍去病攻杀夺占而得。第三,河西四万多降民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黄河以南地区,河西则成空地。此后,汉朝遣军驻守、移民垦殖,充实河西空虚,始建酒泉郡,继而陆续建立武威、张掖、敦煌郡。这一系列开发河西的举措,都是平稳进行,未见匈奴阻挠。”^②还说“河西之纳入汉朝版图,本是得之于匈奴浑邪王的献纳;汉

朝和平接管河西,并非通过战征夺取。这是抹不掉的历史真实。而抹杀匈奴浑邪王率民携地降汉,渲染汉朝武力夺取河西;将匈奴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掉包为汉匈民族矛盾;将张骞出使西域、和平开通‘西域道’(即后来所谓‘丝绸之路’)渲染成‘战争打通’,显然都是错误的。尤其当今之世向往和谐,倡导友好,尤当据实言事。而信口撩拨民族嫌隙、渲染战神威风,亟须加以纠正,不使淆乱视听。”^③显然,这一观点否定了历史学界关于汉王朝通过两次河西大战收复河西的基本结论,并且认为传统观点是“信口撩拨民族嫌隙、渲染战神威风”^④。

历史不能因“当今之世向往和谐,倡导友好”而改写,更不能肆意歪曲。本文拟就河西归汉过程中的几个历史问题做一简要考辨,以还原历史之真相。

一、河西之战的胜利是河西归汉的先决条件

河西又称河西走廊,指黄河以西,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长约一千多公里,宽百公里的天然狭长地带,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在汉武帝之前,虽然中原王朝与河西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政治上并未直接管辖。汉初的河西地区居民以月氏、乌孙等部族为主。匈奴西进,乌孙、月氏西迁后,河西地区成为匈奴右部,由浑邪王和休屠王管理。

(一)河西归汉前的汉匈斗争

西汉王朝建立后,与匈奴处于时战时和的状态。总体来说,初期处于守势,而汉武帝之后,则逐渐转守为攻。

高帝六年(前201年)九月,匈奴单于冒顿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并与匈奴一起进攻太原。高帝七年(前200年)初,刘邦亲率30万大军迎击韩王信及匈奴兵,复得晋阳(今山西太原)后,率兵北击,在白登山(今名马铺山,位于山西大同城东五公里处)被匈奴40万大军围住,七昼夜不能突围。后采用陈平之计,贿赂单于阏氏,刘邦及其部属才得以突围。“白登山之围”使刘邦认识到,在军事实力对比上,汉王朝兵力明显处于劣势,于是决定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双方缔结友好,以缓和汉匈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以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①“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反复无信,百约百叛。”^②

至景武之际,“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俟而不得聚会”^③,汉王朝具备了抗击匈奴的实力。武帝即位后,开始反击匈奴。

元光二年(前133年),汉王朝在马邑埋下伏兵,拟诱匈奴单于入塞而予以伏击,但由于消息泄漏而失败。“马邑之谋”正式宣告了汉匈之间和亲关系的结束。此后,匈奴对汉边的侵掠更加频繁和剧烈。“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④

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与李息率兵进攻驻守河南地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⑤,取得大胜。通过河南战役,汉王朝收复了河套地区,也拉开了与匈奴大规模战争的帷幕。

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率领三万精兵出高阙(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杭锦后旗东北),奇袭右贤王王庭,大大削弱了匈奴右贤王势力。元朔六年(前123年)二月,在大将军卫青率领下再次进攻匈奴,歼敌一万九千人,重创匈奴,进一步改变了汉匈实力对比。

在汉匈开战之初,汉王朝的直接战略目的是解除长安所面临的匈奴直接威胁,使汉初“烽火通于甘泉、长安”^⑥的历史不再重演。战略目标就是长安的正北方向,定襄、五原、云中等地区首当其冲。在前期战争取得胜利,河南地被收复,初期战略目标已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汉王朝开始规划在河西走廊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和拉拢西方部族夹击匈奴以彻底击败匈奴的战略构想。这样,汉王朝的战略目标就转向了河西地区。

(二)第一次河西大战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派霍去病一征河西。《史记》和《汉书》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

冠军侯去病既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天子曰:“骠骑将军率戎士踰乌盩,讨邀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輜重人众慑懼者弗取,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馀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⑦
《匈奴列传》载: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馀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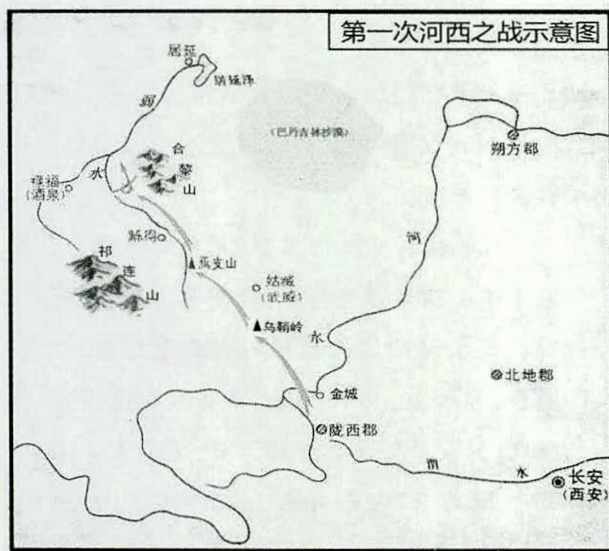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汉武帝益封霍去病诏书中,重点提到了第一次河西之战的过程:

上曰:“骠骑将军率戎士踰乌盩,讨邀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輜重人众摄警者弗取,几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

余里，合短兵，麇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⑧

上述三条记载虽然详略不同，但通过其中若干事件解读，不难看出霍去病第一次河西之战取得重大胜利的历史事实。关于霍去病此次河西之战的具体进程和路线，王宗维、陈秀实、黄兆宏等学者都有过分析，^⑨笔者认为此次进军路线，应是由陇西出发，渡黄河，越乌鞘岭，再渡石羊河，而至焉支山。

“逾乌盩，讨邀濮，涉狐奴，历五王国”，^⑩是霍去病第一次进兵河西的行军路线。“踰乌盩”：“踰”，通



第一次河西之战示意图

“逾”，翻越的意思。“乌盩”，《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盩，音戾，山名也”，《汉书》颜师古注：“乌盩，山名也”，《说文解字》：“山曲曰盩”。是指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的乌鞘岭。乌鞘岭为河西走廊的门户和咽喉，是霍去病西进河西走廊的必经之路。

“讨邀濮”：“邀濮”是匈奴的一个小部落。汉军越过乌鞘岭之后，即进入邀濮部驻牧地，与匈奴军队遭遇，发起了进攻匈奴的战斗。

“涉狐奴”：“涉”，过水、渡水。“狐奴”水名，应是

乌鞘岭以西、祁连山北麓的石羊河。这说明汉军西进渡过了石羊河。

“历五王国”，指霍去病此次行军经过了五个匈奴部落，应是河西地区匈奴最高统治者休屠、浑邪二王下属的五个小王。从现有文献中只知“邀濮”、“折兰王”和“卢侯王”三个，还有两个部落名称文献中并没有记载。

“过焉支山”：焉支山，又称燕支山即今甘肃山丹县东南的大黄山。

“千有余里”：应指霍去病从陇西出塞开始到焉支山的路程。

“麇皋兰下”争议较大，关键是在皋兰山地望上众说纷纭，有大夏河流域说，兰州皋兰山说等等。实际上，霍去病此次进军河西与匈奴鏖战的皋兰山，既不在作为西羌部落驻牧地的大夏河流域，也不是汉军已经占领的今兰州附近的皋兰山。皋兰是匈奴语译音。匈奴谓天为祁连，而皋兰、乌兰、贺兰，都和与“祁连”发音相近，有高峻之意；被匈奴人称为皋兰、乌兰、贺兰的诸山，通常指河边的大山。魏晋贤认为“凡具有特征的山，都称之为皋兰”。^⑪《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二年春），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斩首八千余级。”^⑫“皋兰山”应是霍去病第一次出征河西的终点，且在焉支山以西，靠近大河、高峻山脉，从地理位置上判断，只能是高台境内的合黎山。

由上述记载可知，霍去病第一次进兵河西从陇山出发，在靖远渡口渡过黄河，越过乌鞘岭，渡过石羊河，穿越匈奴五王国辖区，经过焉支山，在合黎山一带与匈奴展开鏖战。主要战果是：斩折兰王、卢侯王以下 8000 余人，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等，总计共俘斩 1.8 万余人，并缴获休屠王之祭天金人。浑邪、休屠二王率残部西逃。霍去病第一次河西之战，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取得了重大胜利，为汉王朝收复河西奠定了基础。

（三）第二次河西大战

元狩二年(前121)夏,为了彻底打败匈奴右部,收复河西地区,汉武帝又发动了第二次河西大战。这次战役,汉武帝派数万骑兵分三路进攻。一路由李广、张骞率领从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南部)出发,意在牵制左贤王;一路由公孙敖率领从青海翻越祁连山,攻入河西走廊,与霍去病南北夹击匈奴,因迷路未到达;第三路由霍去病率精锐骑兵主攻河西匈奴领地。战后,汉武帝在奖赏霍去病的诏书中说:

骠骑将军涉钩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獫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阙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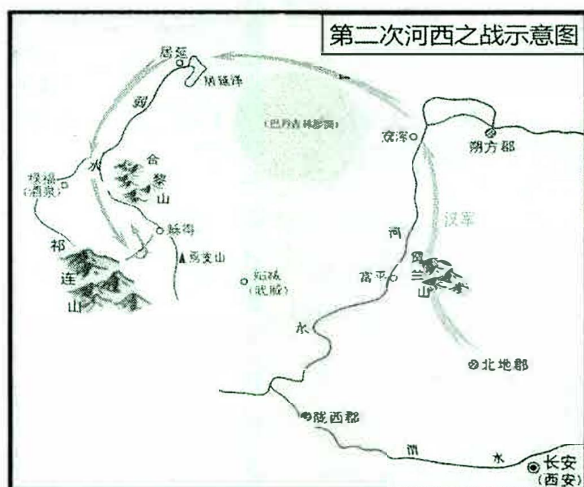
根据上述记载,霍去病第二次河西之战,从北地(今甘肃庆阳)出发。“涉钩耆”:王宗维认为钩耆应该指居延以北的浚稽山沙地^⑪，“涉”，应当是沿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行军。“居延”，颜师古注《汉书·武帝纪》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韦昭以为是张掖县，失之。张掖所置居延县者，以安置所获居延人而置此县。”^⑫笔者认为，颜师古的解释是正确的。霍去病所行经的居延，即今天额济纳旗的居延海，古人也称之为流沙。

“遂臻小月氏”，应是霍去病率领的部分汉军包围匈奴时经过的祁连山小月氏的居住地。“攻祁连山，扬武乎獫得”，说明祁连山与獫得是霍去病这次作战的主战场及取胜的地方。《汉书·霍去病传》颜师古注：“此獫得，匈奴中地名，而张掖县转取其名也。”^⑬考古工作者推测，今张掖市西北约30里处兰新公路侧的黑水国遗址，即獫得城遗址。^⑭

根据上述记载，第二次河西大战的路线是霍去病率军迂回到居延泽，切断匈奴退路后，沿黑河逆流而上，直插祁连山下浑邪王驻地中心，在祁连山下的

獫得一带同匈奴展开了决战。战役的结果是：霍去病大获全胜，歼灭、俘获匈奴近三万五千人，“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阙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⑮。

两次河西之战的胜利，歼灭了匈奴在河西的有生力量。如果我们作一统计则可发现，两次河西大



第二次河西之战示意图

战歼灭捕获匈奴五万三千余人，已过河西匈奴居民十万余人之半，且是匈奴的精锐。第二次河西之战后，残余匈奴逃到了河西地区的东北边缘，已经无力与汉军作战。王宗维指出：“河西之战是汉、匈关系史上具有关键性作用的一次战争。战争的结果，汉朝和匈奴的政治、军事势力对比开始发生变化；加上汉武帝在此基础上把战果的影响继续扩大，这样，汉朝在军事上由原来的劣势逐渐转变为优势，匈奴在军事上的优势开始转向劣势。可以这样说，这次战争是汉、匈势力对比的转折点”^⑯。刘进宝也指出：“谈到汉王朝对甘肃河西的开发，人们往往关注设郡、移民实边、屯田及边防设施的建设，而对霍去病领导的河西之战却注意不够。其实，霍去病领导进行的河西之战，是汉王朝开发河西的先决条件。”^⑰

二、霍去病是降服匈奴、收复河西的主要功臣

(一) 霍去病降服河西匈奴

河西之战的大胜，不但击垮了匈奴在河西地区

的军事力量,还引起了匈奴统治集团的内部分化。单于怪罪浑邪王和休屠王丧师失地,“其秋,单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昆邪,休屠王恐。”^⑩这时的浑邪王和休屠王,一方面有生力量基本被歼灭,河西地区大片土地已丢失,残兵败将失去斗志,无力再战;另一方面,又面临匈奴单于“召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边”^⑪。“要”,应为“邀”,即浑邪王、休屠王派人邀请黄河东岸驻守的汉军将领李息接应。“天子闻之,于是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骠骑将军将兵往迎之”^⑫。说明当时汉武帝担心匈奴浑邪王、休屠王诈降并趁机侵略汉朝边境,因此没有派隔河驻守的李息,而是派了霍去病受降。

事实证明,汉武帝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其对受降过程复杂性的预估非常准确。当霍去病领兵渡过黄河与匈奴对阵相望后,休屠王果然反悔不愿投降,被浑邪王所杀。其实,不仅休屠王反悔不愿投降,浑邪王部下也多欲不降。《史记》记载:“骠骑既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⑬“多欲不降”,表明由于民族差异和长期民族对立的存在,匈奴军多数人不愿投降。“颇遁去”,说明匈奴军队即将溃散逃跑,也宣告浑邪王的投降意图即将破产。在此危机关头,霍去病“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⑭这条记载表明,霍去病采取了三条应急措施将匈奴降服:一是率骑兵冲入浑邪王军营,斩杀了反叛的匈奴兵将八千人,制止了叛乱;二是迅速派兵将浑邪王送去长安,牢牢控制住了浑邪王,使河西匈奴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三是迅速降服了剩余的四万多匈奴军士,并把这些人送到了黄河对岸的汉朝地界,实际上是押送到汉朝地界控制了起来。之后,汉王朝将这些匈奴分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关塞附近地区,称为“五属国”。

由此可见,在匈奴投降过程中,霍去病斩杀“欲

亡者八千人”和“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是保证受降成功的关键举措,据《史记》《汉书》所载,实施者都是霍去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同意“不可将‘斩其欲亡者八千人’算在霍去病名下”^⑮的观点。

霍去病收复河西后,“金城以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⑯河西地区完全归入汉王朝版图。河西归汉,隔绝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实现了汉朝政府“断右奴右臂”的战略目的。同时,也打通了内地通往西域的战略要道,为汉王朝经略西域奠定了基础。

通过元狩二年霍去病领导的两次河西之战和匈奴归降、促成河西归汉历史事实,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两次河西大战的胜利,是河西归汉的先决条件。霍去病一年内两征河西的胜利,大大缩短了汉王朝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时间,其历史贡献不容忽视。

第二、匈奴浑邪王的投降,是走投无路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一是由于两次河西大战消灭了其有生力量,河西匈奴已无力再战;二是面临单于的“诏诛”,浑邪王已无逃回漠北匈奴大本营的退路;三是浑邪王虽欲降汉,但降汉过程中部下“多欲不降”,“颇遁去”,实际上意味着浑邪王主导的降汉失败。显然,河西归汉不是浑邪王主动所为,而是霍去病及其汉军军事斗争的胜利成果。

第三,在河西归汉的过程中,霍去病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受降过程中,有几个关键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浑邪王与休屠王是据守河西的两个匈奴王,有各自的领地、军队,互不统辖。在休屠王准备反叛时被浑邪王所杀,可能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休屠王到浑邪王账内议事时,被浑邪王秘密处死;否则,两部的互相残杀是不可避免的。由此,浑邪王率休屠王部下投降的可能性不大。二是在浑邪王部下“多欲不降”、“颇遁去”的情况下,浑邪王能斩杀8000反叛者吗?他不知道众怒难犯的基本道理吗?

他不怕被“多欲不降”者所杀吗？笔者认为，斩杀8000反叛者的实施者，只能是霍去病及其汉军。三是降服匈奴部众后，霍去病迅速将浑邪王送往长安，与匈奴部众隔离，至少说明浑邪王没有能力领导匈奴部众归汉；同时，如果被降服的匈奴如果真心归汉，霍去病也用不着立刻将他们遣送汉人地界。

第四，河西归汉时河西地区所谓的“民”，基本由绿洲上的匈奴和祁连山区少量的羌人、小月氏组成。羌人、小月氏均躲居祁连山中，与匈奴没有任何往来，更没有隶属关系。而这时河西地区的匈奴基本被霍去病大军歼灭、降服，河西走廊也被汉军占领，匈奴浑邪王自然无“民”可率，无“地”可携。与浑邪王一起降汉的主要是携带麾下的匈奴军士，这些人只是匈奴占据河西后、帮助匈奴稳定秩序的军事力量、是河西地区的统治力量，当然不能完全代表河西民众。由此，“浑邪王率民携地降汉”，汉王朝和平接管河西，只是某些人的美好愿望。

（二）霍去病的英雄形象是历史形成的

霍去病在河西归汉中的历史功绩早有定论。汉武帝曾非常赏识霍去病征战河西卓越功勋，特颁发三篇诏书以褒奖其战功。陈梧桐在《中国军事通史》中指出：“河西之战结束后，汉武帝特嘉奖霍去病，‘以千七百余户益封骠骑将军’，后来，霍去病去世，汉武帝又下令隆重为其送葬，并‘为冢象祁连山’，以表彰他在河西之战的卓著功勋。这一切，充分反映了汉武帝对这次战役成果的重视。”^⑧

司马迁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引录汉武帝褒奖霍去病战功的诏书，高度评价了霍去病在汉匈战争中的历史贡献。需要说明的是，西汉时期没有制诏机构，大部分的诏书主要是由帝王亲自拟写（除了一些年幼的帝王）。汉武帝的诏书内容丰富，数量众多，基本是武帝手创，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中指出“汉帝多自作诏”^⑨，应当是真实的。班固编写《汉书》时引录了大量的诏令奏议，其中很多是《史记》中从未录入过的，是有选录材料和依据的。因

此，《史记》《汉书》中的霍去病封赏诏也应当是真实可信的。《史记》和《汉书》之所以引用汉武帝的诏书写霍去病的历史贡献，一方面是为了表明史料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是借汉武帝的手，显示史料的权威性，充分表达对霍去病的赞誉。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⑩ 这里，司马迁用一句话概括了霍去病对河西的历史功绩，即大破匈奴于祁连山，打通河西走廊，消除了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为纪念他的赫赫战功，汉武帝在霍去病逝世后为他厚葬，并提出“为冢象祁连山”的概念，“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⑪，以此表彰霍去病在河西归汉中的历史性贡献。《史记索隐》引崔浩云：“霍去病破昆邪王于此山，故今为冢象之以旌其功也。”^⑫

霍去病在河西归汉中的丰功伟绩，不仅得到了汉武帝、司马迁、班固的称赞，而且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讴歌的军事天才。他不仅是历代政治家、武将褒奖的典范，还是历代文人墨客讴歌的榜样。汉朝的桑弘羊指出，霍去病、卫青“功勋架然，若于海内”^⑬。曹操勉励自己的儿子，要向霍去病那样成为英勇善战的将军。隋朝诗人薛道衡的《出塞》（其二）：“连旗下鹿塞，叠鼓向龙庭。妖云坠虏阵，晕月绕胡营。左贤皆顿颡，单于已系纓。继马登玄阙，钩鯤临北溟。当知霍骠骑，高第起西京”。^⑭检索《全唐诗》等相关文献，赞誉霍去病的诗歌有五十多首。如李白《塞下曲》（其三）：“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阵解星芒尽，营空海雾消。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⑮此外，杨素“冠军临瀚海，长平翼大风”^⑯，杜甫“居然双捕虏，自是一嫖姚”^⑰，王维《燕支行》“卫霍才堪一骑将，朝廷不数贰师功”^⑱等中国文学史赞颂霍去病的经典名句非常多，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霍去病在河西归汉中的卓越战功，不仅有充分的历史依据，而且霍去病已成为千百年来

中华民族讴歌的英雄。

三、河西归汉后的汉匈斗争

汉匈斗争,是两汉时期西北民族关系的主要矛盾,也是汉王朝西北经略的重点。河西归汉后,北方匈奴并不甘心失去河西这一战略要地,不断地寻机夺回河西。

(一)西汉中期以后的汉匈斗争形势

西汉中期河西归汉以后,直至东汉时期,匈奴斗争仍然是汉王朝西北民族关系的主要矛盾。

1. 西汉中后期的汉匈关系

关于西汉中后期的汉匈关系,学界一般以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降汉为标志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武力征伐”为主要特点,第二阶段则是助呼韩邪单于统一匈奴后的羁縻统治政策。^⑧

其中第一阶段又可分为6个时期:第一,汉匈大规模战争期,从元朔元年(前128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第二,战争中止,外交手段得到重视,双方积聚力量积极备战期,从元狩四年到太初三年(前102年);第三,汉王朝对匈奴施压,汉匈再次进入持续战争状态,从太初三年至天汉四年(前97年);第四,匈奴对汉王朝施压,汉王朝以守势为主,积蓄力量,从太始元年(前96年)至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第五,汉王朝组织乌孙、乌桓各方面力量攻击匈奴时期,从元凤四年(前77年)至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第六,匈奴分裂,汉王朝支持呼韩邪单于,最终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亲自朝汉,从五凤元年(前57年)至甘露三年(前51年)。

甘露三年(前51年)至西汉灭亡,汉匈关系又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汉王朝支持呼韩邪单于抗衡郅支单于,虽然呼韩邪单于已降汉,但由于三方利益独自存在,互相之间仍保留微妙关系。第二阶段则是匈奴依附汉朝、真正作为汉之藩属的阶段。

在“武力征伐”阶段,汉匈之间存在多次大规模战争。在呼韩邪单于降汉后,汉匈之间战争有所减少,但并未停止。这其中既有汉王朝为支持呼韩邪

单于而与其政敌郅支单于的战争,也有呼韩邪单于统治下的匈奴与汉王朝间的边境摩擦。毕竟两个长期斗争民族间的猜忌、提防不可能仅因统治者间关系的改善而在短期内完全消除。居延汉简载:

候者言有虏兵刳其惊口

初元五年四月辛亥下 227·5

该简出自甲渠候官A8遗址,记载了甲渠塞候望戍卒在初元五年四月发现“虏兵”的情况,其中“虏兵”显然指呼韩邪单于之匈奴部队。可见,呼韩邪单于北返后,虽臣服汉,但汉匈之间仍互相防备、心存戒备。正如李大龙所说:“匈奴呼韩邪单于成为西汉的藩属,但在西汉王朝内部仍存在着严重的防范心理。”^⑨

2. 新莽时期的汉匈关系

新莽政权建立后,为突出自己的正统性,积极推行“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的民族政策,汉匈关系由此急剧恶化。心有叛意的匈奴又接纳了车师后王兄狐兰支、汉朝叛臣戊己校尉史陈良等,甚至招降纳叛、攻击西域,^⑩与新莽政权几乎公开决裂。在这种情况下,王莽于始建国二年(10年),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以示侮辱。同时王莽下诏:

命遣立国将军孙建等凡十二将,十道并出,共行皇天之威,罚于知之身。惟知先祖故呼韩邪单于稽侯罽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灭稽侯罽之世。今分匈奴国土人民以为十五,立稽侯罽子孙十五人为单于。遣中郎将蔺苞、戴级驰之塞下,召拜当为单于者。诸匈奴人当坐虏知之法者,皆赦除之。

并遣五威将军苗詵、虎贲将军王况出五原,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出云中,振武将军王嘉、平狄将军王萌出代郡,相威将军李棼、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诛貉将军阳俊、讨秽将军严尤出渔阳,奋武将军王骏、定胡将军王晏出張掖,及褊裨以下百

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先至者屯边郡，须毕具乃同时出。^⑥

从该诏书看，王莽对付匈奴决定采用两个办法：一、进兵诛讨；二、分裂匈奴，《王莽传》称，“立稽侯獬子孙十五人为单于”。

王莽在始建国初年为对付匈奴决定采用进兵诛讨和分立十五单于的做法，客观来说，还是具有操作性的。当时若将这两个措施真正实施，可能会遏制住匈奴抗衡中原王朝的决心。然王莽好大喜功，虽说表面动静很大，实际上却错失战机。新莽攻击匈奴，虽说战争准备已导致“天下骚动”之恶果，但实际上却是“屯而不攻”，坐失良机。《后汉书》卷90《乌桓传》载：“及王莽篡位，欲击匈奴，兴十二部军，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谒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还为抄盗，而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于莽。匈奴因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究其原因，应是王莽不想打无把握之仗，甚或幻想通过延迟开战时间等待匈奴内乱，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致使错失新莽时期进攻匈奴的最佳时机。《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载：“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这就是王莽轻开战端却“久屯不出”的恶果。

天凤三年(16年)，王莽“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⑦欲重新在西域立威。但结果五威将兵败焉耆，西域都护没于龟兹，遭遇惨败，新莽政权最终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

天凤五年(18年)，匈奴乌累单于咸去世，弟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即位，王莽又谋另立单于，与匈奴表面的和谐关系再告破裂。天凤六年(19年)举国动

员，转运天下谷物，准备大举攻伐匈奴。但此时社会已动荡不安，民不聊生，风起云涌，新莽政权大事去矣，所谓的征伐匈奴只是黄粱一梦。

由于王莽民族政策和对匈奴斗争策略的失误，激起了匈奴的不满，导致匈奴连年对北方边塞侵扰，西域诸国也再次沦为匈奴的势力范围。

3. 东汉时期的汉匈斗争

王莽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关系破裂，此后匈奴重新控制了西域，对战乱中的中原地区虎视眈眈。因此从东汉建立之初，汉匈关系就呈现出一种异常紧张的局面。当时中原地区军阀割据、百废待兴，而“匈奴转盛”，^⑧故东汉王朝在对匈关系上采取了“收缩”政策，在军事、外交上方面表现为以“退让”“守势”为主。此间，匈奴不仅“辞语悖慢”“钞暴日增”，^⑨直接入侵汉王朝，还主动扶持彭宠、卢芳等反对刘秀的割据势力，妄图延续中原的分裂局面，以利于其对汉王朝的侵蚀。彭宠、卢芳失败后，匈奴为遏制东汉王朝的中兴，更加紧了对汉朝的直接入侵，在边境上构难不止，河东、上党、扶风、天水、上谷、中山等郡国都遭到匈奴蹂躏，难得安宁。从居延汉简也可发现，汉匈在弱水防线上的小规模冲突此起彼伏。

当然，东汉初期汉王朝对匈战略的守势，主要是因为中原大乱之后国家需要休养生息，并非汉匈力量对比的真实反映。其实，公元前后天气转寒，脆弱的草原游牧经济抗击天灾的能力十分有限，随着汉王朝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恢复，汉匈关系马上就迎来了较大转机。建武二十四年(48年)，在天灾人祸的不断作用下，匈奴南北分裂，“冬十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于是分为南、北匈奴”。^⑩新立的南匈奴单于比为与北匈奴抗衡，主动向汉称臣，“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捍御北虏。帝用五官中郎将耿国议，乃许之”^⑪，南匈奴“遣使诣阙贡献，奉蕃称臣”，不久又“遣子入侍”，^⑫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宣帝以来匈奴臣服为汉藩属的政治局面。

南匈奴内附后，与北匈奴战争频繁，故极力劝说

东汉王朝帮助其消灭“北虏”。而北匈奴为扭转与南匈奴竞争中的不利局面，也试图在与汉王朝保持平等地位基前提下，开展正常外交。建武二十七年(51年)北匈奴遣使诣武威乞和亲，此后建武二十八年(52年)、三十一年(55年)和永平七年(64年)，皆有北匈奴“遣使贡献，乞和亲”^①的记载。可以说，随着匈奴的分裂，东汉王朝在对匈战略上大大扭转了此前的被动局面而开始居于主动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东汉王朝一方面抓住机遇休养生息，另一方面不断接受北匈奴降人，并扶持南匈奴、乌桓、鲜卑等反北匈奴的势力，努力营造“以夷制夷”的有利环境，为彻底解决北匈奴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明帝时期，东汉国力日趋强大，而北匈奴对汉廷“羁縻”政策也愈来愈失去耐心，试图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和掠夺，阻断汉与西域的交通，对河西地区的安全稳定构成了直接威胁，双方关系趋于紧张。永平五年(62年)，北匈奴连续入侵五原和云中，八年(65年)“寇西河诸郡”。至永平末年，与北匈奴控制的西域衣带相连的河西地区成为匈奴入侵的重灾区，当时北匈奴“复数寇钞边郡，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②在此情况下，为维护边塞稳定，汉明帝决定对北匈奴大举反击。永平十六年(73年)，“遣太仆祭彤出高阙，奉车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延，骑都尉来苗出平城，伐北匈奴。”^③其中，由河西酒泉出兵的窦固破匈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卢城，取得了对北匈奴战争的重大胜利。以此为契机，东汉王朝重新经营西域，重建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并遣班超经营鄯善、于阗、疏勒等西域南道诸国，在时隔六十年后，重新确立了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此后不久，明帝驾崩，章帝即位，反对经略四夷的儒臣集团当政，“收缩”政策再次抬头，汉王朝又放弃了对西域的经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汉王朝在对外政策上暂时恢复守势，但在自然环境的持续恶化和乌桓、鲜卑、南匈奴的打击下，北匈奴也

迅速走向衰落，民众不断南迁、款塞而降。《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载：“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④仅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从永平二年(59年)到章和元年(87年)不到三十年间，就有至少四次北匈奴民众大规模降汉的记录。^⑤章和元年，“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⑥北匈奴大乱，灭亡已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南匈奴再次请求东汉王朝支持其“破北成南，并为一国”，^⑦实现南北匈奴的统一。面对北匈奴衰落带来的草原势力重新洗牌的日趋临近，东汉王朝决定主动应对这一局面，和帝永元元年(89年)，“车骑将军窦宪出鸡鹿塞，度辽将军邓鸿出稭阳塞，南单于出满夷谷，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鞬海”^⑧，“北单于奔走，首虏二十余万人”^⑨。永元三年(91年)，大将军窦宪“遣左校尉耿种出居延塞围北单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⑩，北单于“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⑪。永元五年(93年)，东汉王朝又杀掉继立的北单于于除鞬，“破灭其众”。^⑫从此以往，北匈奴作为统一政权基本不见于正史记载，其部分民众在呼衍王带领下避居西域北部，部分民众则南下投降东汉和南匈奴，此外还有部分民众同化于迅速涌入草原填补了北匈奴败亡后的空白的鲜卑部落。

北匈奴的败亡，改变了草原的权力格局，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势力壮大，一度控制草原，虽给东汉王朝的边疆带来了新的问题，但总体来说当时并未造成大的灾难。而南匈奴在北匈奴败亡后，主力并未北迁，仍被东汉王朝监控。当然，在南匈奴内部一直存在着亲汉派和北迁派的权力斗争。从和帝永元六年(94年)开始直到东汉后期，南匈奴曾爆发单于安国、檀、莫鞬日逐王逢侯等多次叛乱，但最终都被镇压。

纵观西汉后期匈奴降汉后的汉匈关系史，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和平交往是主流，但双方从争夺西

域、保障边塞等各自利益出发仍存在不少战争行为，而作为汉王朝联通西域、隔绝羌胡战略重中之重的河西地区更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二)汉代河西开发的成功是汉匈斗争的胜利硕果

为了防御匈奴，确保河西战略要地的安全，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王朝在河西归汉后，对河西地区进行了积极有效的经营。一是列四郡，大规模移民实边。河西归汉后，汉先后在河西设立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河西四郡为防御匈奴提供了安全的组织保障，同时，移中原数十万人开发河西，掀起了河西历史上第一次开发高潮。二是修筑了汉塞、烽燧等军事防御工程和建立了郡太守、部都尉领导下的完善的候望、屯田、军需、交通邮驿军事防御体系。河西归汉后，修筑了纵贯河西走廊的汉塞，建设了完善的交通邮驿等军事系统。三是设置了关卡。除《汉书》中“列四郡、据两关”记载的阳关、玉门关“两关”外，河西汉简还记载有肩水金关和悬索关。也就是说，汉王朝在河西地区设有四个重要关卡。玉门关、阳关，是中原通西域的重要关卡，肩水金关、悬索关则是扼守河西走廊沿黑河通向北部匈奴的战略要地。河西汉简的大量记载说明，上述经略河西的措施，对抗击匈奴，保障河西安全，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有力地推动了河西开发。

当然对于具有重要经济、军事、交通意义的河西，匈奴并不甘心拱手相让，故在汉王朝河西开发的过程中，匈奴采取各种方式对河西进行侵略，汉王朝则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反击，所谓“一系列开发河西的举措，都是平稳进行，未见匈奴阻挠”^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西汉中期之后汉匈三百年左右的交往史中，河西地区始终牵引着汉匈双方的神经，与西域地区一样成为汉匈争夺的前沿阵地。

《汉书·匈奴传》载，元凤三年（前78年），“单于使犁污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⑦由此可见，匈奴单于对酒泉、张掖的失去

耿耿于怀，始终希望趁机夺取。当年，匈奴右贤王、犁污王率四千骑兵，分3队进攻张掖郡的日勒、屋兰、番和三县。张掖太守和属国都尉郭忠率兵大败匈奴，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了犁污王。^⑧本始二年（前72年），五将军征匈奴，其中度辽将军范明友三万余骑，出张掖。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三万余骑，出酒泉。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翁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可见西汉中后期，河西地区仍然是汉匈争夺的重中之重。

王莽时期，汉匈关系紧张，但双方真正的战争并未发生在汉王朝的北方边境，而是在西域，河西则是当时支持西域战争的前哨基地。据《汉书·王莽传》《西域传》所载，天凤三年，王莽派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征西域，主要对手是焉耆，最终结果是新莽军队大败，中原王朝丧失西域。然而，1979年敦煌马圈湾出土汉简中保留的天凤年间西域战事失利后退至马圈湾的新莽将领给王莽上书草稿中，却清楚记载新莽军队的主要对手是匈奴，焉耆仅是匈奴的同盟。

东汉王朝建立后，汉匈关系紧张，河西地区更是遭到匈奴的多次入侵。据居延汉简记载，建武初年匈奴对河西的骚扰此起彼伏，给当时据守河西的窦融带来极大压力。李均明、汪桂海先生曾复原过破城子房屋16遗址出土的一简册，其中内容与匈奴军队的入侵有关。

夏良叩头言掾坐前毋恙起居安平甚善先日欲诣门

EPP16: 39

下迫起萃不及诣门下毋状叩头得掾明时数

EPP16: 40

又壬午言虏燔烧孝隧其日出时乘輶□□张骏等候望

EPP16: 41

见塞外虏十余辈从西方来入第十一隧天田屯止虏四五

EPP16: 44

百骑亭但马百余匹囊他四十五匹皆备贺并塞来南燔

EPP16: 48

第八队攻候郭君与主官谭等格射各十余发虏复从塞
EPP16: 47

□冀虏且围守其晨时孝护桃下隧奏候官言房卅
EPP16: 42

余骑皆衣铠负鲁攻隧又攻坏燔烧第十一隧以北 EPP16: 43
攻坏燔烧第泰隧以南尽冀烟火不绝又即日平旦
EPP16: 45

万岁部以南烟火不绝虏或分布在块闲房皆
EPP16: 46^⑧

这次侵袭,匈奴至少出动了四五百骑对居延都尉府甲渠候官辖区烽燧展开了全面进攻。当地戍卒坚韧不屈,奋力抵抗,抵御了匈奴的入侵。

居延汉简中关于东汉初年汉匈战争的简众多,如:

建武五年十二月辛未朔戊子令史 劾将褒 EPT68: 81

诣居延狱以律令从事 EPT68: 82

迺今月十一日辛巳日且入时胡虏入甲渠木中 EPT68: 83

隧塞天田攻木中隧隧队长陈阳为举埃上二 EPT68: 84

蓬坞上大表一燔一积薪城北隧助吏李丹 EPT68: 85

候望见木中隧有烟不见蓬坞长王褒即使 EPT68: 86

丹骑驿马一匹驰往逆辟未到木中队里所胡虏四步入
EPT68: 87

从河中出上岸逐丹虏二骑从后来共围遮略得丹及所骑
EPT68: 88

驿马持去案褒典主而擅使丹乘用驿马 EPT68: 89

为虏所略得死亡马 EPT68: 90

不以时燔举而举埃上一苕火燔一积薪燔举不 EPT68: 91
如品约 不忧事边 EPT68: 92

状辞曰上造居延累山里年卅八岁姓周氏为 EPT68: 93

甲渠候官斗食令史以主领吏备寇虏为 EPT68: 94

职迺今月十一日辛巳日且入时胡虏入木中 EPT68: 95

塞天田攻木中隧隧队长陈阳为举埃上二蓬坞上 EPT68: 96

大表一燔一积薪城北隧助吏李丹候望见 EPT68: 97

木中隧□□ □□候长王褒即使丹骑驿 EPT68: 98

马一匹驰□□ 里所胡虏四步入从 EPT68: 99

得丹及所骑驿马 EPT68: 100

□丹乘用驿马 EPT68: 101

□举埃上一苕火 EPT68: 102

以上二十二简字迹相同,简号连贯,是一部劾状残编。其内容反映了建武五年居延边塞的一次敌情。胡虏入甲渠塞木中隧天田,木中隧隧长陈阳举烽火,诚北隧望见烽火后,感觉烽火信号有疑问,驻扎在诚北隧的诚北部候长王褒令助吏李丹骑驿马至木中隧了解详细情况,在途中被匈奴军队截击,李丹及驿马被俘虏。由于王褒擅自决定让李丹骑驿马,导致驿马亡失,甲渠候官为此告劾王褒。该例反映了在紧张战争环境下,居延地区用烽火信号传递敌情的情况。

此外,居延额济纳汉简载:

建武四年九月戊子从史闾敢言之行道以月十日到橐他候官遇橐他守尉冯承言今月二日胡虏入酒泉□□

2000ES9SF3: 4A

入肩水塞略得焦凤牛十余头羌女子一人将西渡河虏四骑止都仓西放马六十余骑止金关西月九日=蚤食时……

2000ES9SF3: 4B

前辈到金关西门下椽谊等皆在金关不得相闻闾等在候官即日舖时尘烟火到石南亭昏时火遂…… 2000ES9SF3: 4C

恐为胡虏所围守闾夜与居延以合从王常俱还到广地胡池亭止虏从靡随河水草北行虏□…… 2000ES9SF3: 4D

……□请居延郭候写移□□惊当□……

2000ES9SF3: 4E^⑨

这是一件五面书写的檄,出土于甲渠候官第9隧3号房址,是建武四年(28年)肩水守塞吏员就匈奴一次军事行动的动向及相关应对情况送达居延候官的通报,可能是命令居延守塞吏卒预为防备。这次匈奴的进攻目标主要应是酒泉,匈奴人沿弱水南下犯塞,进入肩水塞顺便掳掠焦凤牛十余头及羌女子一人,并准备由金关附近西渡弱水,为肩水候官吏卒发现。同出土于第9隧3号房址的2000ES9SF3: 3号简提到了一场匈奴攻亭隧的肉搏战,“匈奴入即持兵刃

功亭吏拔剑助卒闭户重关下戊”，反映了东汉初年匈奴人攻击亭隧的惨烈战争场面。战争中，亭吏、亭卒“闭户重关下戊”，以剑与持兵刃的匈奴人作战。

到明帝永平年间，北匈奴更加紧对河西的侵略，“数寇钞边郡，焚烧城邑，杀略甚众”，以致“河西城门昼闭，帝患之”^①。匈奴的入侵，严重威胁了东汉王朝的核心利益，最终诱发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展开。东汉与北匈奴的多次交战中，虽然西域是主战场，但河西地区则是汉军出击的重要基地。永平十五年（72年）十二月，窦固、耿秉出屯凉州，准备出击事宜。十六年（73年）二月，汉匈大战爆发，河西成为最主要的军事基地。窦固与骑都尉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及卢水胡12000骑出酒泉塞；耿秉与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窦固、耿忠一路至天山，击胡衍王，斩首千余级；胡衍王逃走，汉军追至蒲类海（今新疆东巴里坤湖）。同样，和帝永元二年（90年）七月，“大将军窦宪出屯凉州”，^②主持对北匈奴战事。至永元三年（91年），大将军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单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③，北单于“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④。

总之，西汉中期之后的汉匈战争大量存在。由于匈奴势力的逐渐西迁，故河西地区和西域地区，在西汉中期之后更是成为汉匈双方争夺的焦点，而河西地区也自然成为与匈奴战争的前沿阵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汉代的河西地区，正是由于其所具有的“断匈奴右臂”“隔绝羌胡”战略地位而得到汉王朝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开发；对匈奴骚扰、入侵的坚决反击，则是河西开发的成功有效保障。

四、结语

霍去病两次河西大战的胜利，是河西归汉的先决条件。两次河西大战消灭了匈奴在河西的有生力量，彻底摧毁了匈奴的心理防线。浑邪王、休屠王无力再战，又面临匈奴单于“诏诛”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意欲降汉。但在汉军接降的过程中，休屠王中途

反悔，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意味着投降行动的失败。关键时刻，霍去病采取了三条应急措施：一是率骑兵冲入浑邪王军营，斩杀了反叛的匈奴兵将八千人，制止了叛乱；二是迅速派兵将浑邪王送去长安，牢牢控制住了浑邪王，使河西匈奴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三是迅速降服了剩余的四万多匈奴，并送到了黄河对岸的汉人地界。正是由于霍去病的英勇果断，最终降服了匈奴、收复了河西。

霍去病在河西归汉中居功至伟，不仅受到了汉武帝的褒奖，司马迁、班固的颂扬，也成为后世传颂的英雄，更是对霍去病历史功绩客观褒扬。浑邪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虽欲投降汉朝，但并没有成功，更不存在率人携地主动归降的问题。

河西归汉后，河西地区仍然是匈奴双方争夺的焦点，也是汉王朝反击匈奴、隔绝羌胡、经略西域的前沿基地。河西汉简研究表明，河西归汉后的西汉中后期以及东汉时期，匈奴曾多次发动对河西地区侵略，汉朝治下的河西军民则进行了坚决反击。在汉匈斗争中，汉王朝愈来愈重视河西地区的军事、交通、政治、民族、经济、文化枢纽作用，“列四郡、据两关”，大规模移民实边，修筑了汉塞、烽燧等军事防御工程，建立了郡太守、部都尉、候望、屯田、军需、交通邮驿等军事防御体系和交通邮驿系统，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开发的河西高潮，最终实现了有效地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河西地区安全和丝绸之路畅通的战略目的。所谓“一系列开发河西的举措，都是平稳进行，未见匈奴阻挠”的说辞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经略是放在汉匈关系和丝绸之路背景下的，在当时的经济和认知条件下，民族关系不可能完全是和谐融洽的关系，河西经略也不可能完全是和风细雨的和平开发。作为历史研究者应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应正视历史上的各种现象。“信口撩拨民族嫌隙、渲染战神威风”固然不对，但不好的原因是“信口”、是“撩拨”、是“渲染”，而非

尊重史实。历史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及其规律,如果为了某种目的而肆意歪曲史实、矮化英雄,既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有违于历史的科学性。

注 释

①李正宇:《汉朝和平接管河西,不由攻夺强占》,2017年8月,《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73页。

②③李正宇:《汉朝和平接管河西,不由攻夺强占》,2017年8月,《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75页。

④李正宇:《汉朝和平接管河西,不由攻夺强占》,2017年8月,《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77页。

⑤桓宽:《盐铁论·结和第四十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88页。

⑥桓宽:《盐铁论·结和第四十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25页。

⑦《史记》卷30《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5页。

⑧《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65页。

⑨《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6页。

⑩《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04页。

⑪《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29~2930页。

⑫《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08页。

⑬《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79页。

⑭参王宗维《汉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路》(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陈秀实《汉将霍去病出北地行军路线考》(《西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黄兆宏《元狩二年霍去病西征路线考释》(《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⑮《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29页。

⑯魏晋贤:《甘肃省沿革地理论稿》,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9页。

⑰《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6页。

⑱《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80页。

⑲王宗维:《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⑳《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6页。

㉑《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81页。

㉒王宗维:《汉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路》,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㉓《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31页。

㉔王宗维:《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㉕刘进宝:《霍去病与河西之战》,《理论学习》1987年第2期。

㉖《汉书》卷94《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88页。

㉗《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31页。

㉘《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43页。

㉙《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43页。

㉚《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43页。

㉛李正宇:《汉朝和平接管河西,不由攻夺强占》,2017年8月,《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74页。

㉜《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7页。

㉝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五卷)《西汉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7页。

㉞赵翼著、王树民校:《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6页。

㉟《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05页。

㊱《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47页。

①⑦《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47页。

①⑧桓宽：《盐铁论·结和第四十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88页。

①⑨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680页。

①⑩《全唐诗》卷164《李白》，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00页。

①⑪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675页。

①⑫《全唐诗》卷821《皎然》，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266页。

①⑬《全唐诗》卷125《王维》，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57页。

①⑭李大龙：《汉代中国边疆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8-57页。

①⑮李大龙：《汉代中国边疆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40页。

①⑯《汉书》卷94《匈奴传下》载，“西域都护但钦上书言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将人众寇击诸国”，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23页。

①⑰《汉书》卷99《王莽传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121页。

①⑱《汉书》卷99《王莽传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146页。

①⑲《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40页。

①⑳《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40页。

㉑《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6页。

㉒《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42页。

㉓《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7页。

㉔《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0页。

㉕《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49页。《后汉书》卷74《班超传》载：“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同《传》班勇也称：“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

㉖《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页。

㉗《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48-2951页。

㉘《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51页。

㉙《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52页。

㉚《后汉书》卷4《孝和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8页。

㉛《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53页。

㉜《后汉书》卷4《孝和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1页。

㉝《后汉书》卷45《袁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40页。

㉞《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54页。

㉟李正宇：《汉朝和平接管河西，不由攻夺强占》，2017年8月，《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75页。

㊱《汉书》卷94《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83页。

㊲刘光华主编、汪受宽著：《甘肃通史（秦汉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3页。

㊳参李均明：《居延汉简编年—居延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年，第263-264页。汪桂海：《汉简所见匈奴对边塞的寇略》，《简帛》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后收入氏著《秦汉简牍探研》，台北：文津出版社，2009年，第198-199页。

㊴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77~78页。

㊵刘光华：《西北通史（第一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84页。

㊶《后汉书》卷4《孝和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1页。

㊷《后汉书》卷4《孝和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1页。

㊸《后汉书》卷45《袁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40页。

（作者：甘肃省酒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陇南古道叙论

罗卫东

内容摘要:陇南地区地处川陕甘交界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长期对外交往中,勤劳勇敢的陇南人民在西汉水、嘉陵江、白龙江流域开辟了由甘入陕、入川的故道、西倾山道、祁山道、阴平道以及茶马古道等道路,它们都是古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沟通西北与西南之间的重要通道,在促进西北与西南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甘肃陇南 古道 叙论

陇南山大沟深、江河纵横,交通十分不便。千百年来,陇南各族人民为了生产、生活和文化交流的需要,开掘和修建了独特的栈道、驮道和索桥、木桥、伸臂木梁桥等。特别是为了打通与陕西、四川等毗邻地区经济文化交流通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长期对外交往中,勤劳勇敢的陇南人民在西汉水、嘉陵江、白龙江流域开辟了由甘入陕、入川的故道、西倾山道、祁山道、阴平道等道路,成为古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西北与西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蜀道,古代泛指由关中通往蜀地的道路。通常学术研究中提到的“蜀道”,通常是指由关中通往汉中的故道、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以及由汉中通往蜀地的金牛道、嘉陵道、米仓道、荔枝道等。蜀道穿越秦岭和大巴山,山高谷深,道路崎岖,难以通行,诗仙李白曾作《蜀道难》一诗,俱言蜀道之艰难。

近现代出土文物不断证明,陇南地区也存在着通往川蜀的若干条古道,主要有故道、祁山道、西倾山道和阴平道等,都是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为陇地通往蜀地之路,也可笼统称之为陇蜀古道,以区别于秦地通往蜀地的秦蜀古道。

先秦时期,陇南地区以农业耕作为生,创造了发达的上古时期河谷农业文化。从历史文化遗存来看,仰韶文化广布于渭河、西汉水、洮河、大夏河、白

龙江流域和黄河上游沿岸,以制作彩陶闻名于世的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类型的文化,以及其后寺洼文化、齐家文化在以上河谷川地亦广为分布。这一灿烂的古代彩陶文化流播方向,基本上奠定了数千年来陇南交通道路的大体走向。约至商代中晚期始,陇南由于西北氐羌族的南迁、东移而开始了多民族杂居相处、共同生活的历史。据史载,至春秋战国时期,本区北部西汉水上游地区为秦人、西戎共据,岷江、白龙江、白水江流域则为羌人、氐人家园。氐人和羌人同源,本为游牧民族,后来由于其中一部分不断向东南迁移至渭河、白龙江、白水江流域河谷地区,而成为以农业为主的氐人,而在岷江流域地区的则成为农牧兼营、以牧业为主的羌人。

对于氐羌族在历史上的南迁,研究者均已认同,且其南迁路线和年代,学者们的看法亦大体一致:康藏高原东端横断山脉南下的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其深陷的峡谷自古以来即构成南北民族交通的要道。甘青地区创造了彩陶文化的原始民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他们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部落便沿着这些峡谷开始南迁。绵延横亘于陇南南部边境的西倾山、岷山、摩天岭及秦岭西部支脉与嘉陵江及其支流西汉水、白龙江、白水江,还有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大夏河所形成的川坝峡谷区,是古代

西北与中原、西南民族迁徙和进行文化、经济交流的天然通道。在岷江、洮河、西汉水、白龙江流域地区发现的大量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遗存,证明了这一史实。

陇蜀古道的开创渊远流长,形成和发展情况也极为复杂。史前时期的道路交通,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只有沿众多河流峡谷残存的古文化遗存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商周时期,始见有凤毛麟角的记载。自秦汉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和文化的大变革,交通道路得到空前拓展,但由于本区域山大沟深、江河纵横,地形异常复杂,加之又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历史既久,名称繁杂,有陈仓道、青泥道、白水路、西狭道、祁山道、飞龙峡道、西倾道、阴平道、景谷道、羌氏道等等。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一、北南方向古道

(一)故道

路线:宝鸡(陈仓)—大散关—凤州—凤县城(双石铺)—草店村—马陵关—杨家店—两当县城—永宁—青泥岭—虞关—九股树—略阳县城—褒城—勉县—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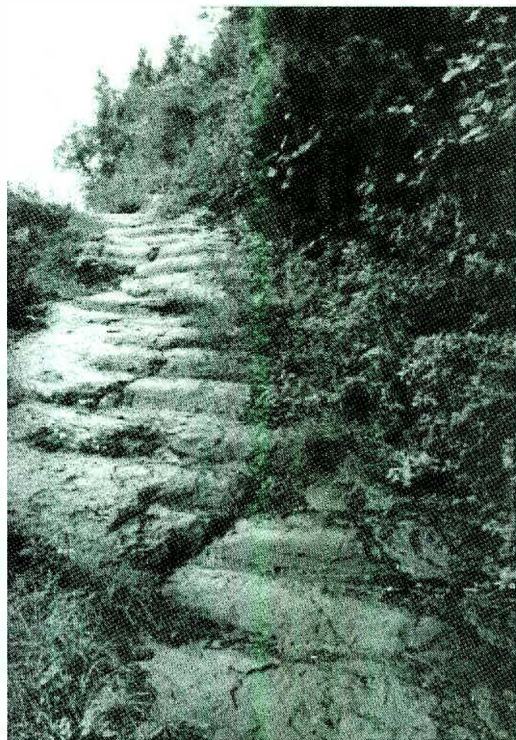
《宝鸡古代道路志》关于隋唐五代两宋时期“故道驿程及驿站设置”记述:“故道至凤州后,折西南行,三十五里至马岭寨。马岭寨又西十五里至两当县(今两当县东三十五里)置驿。由两当西南行,七十里至固镇(今徽县城关镇),又十五里至河池县(今徽县西十五里银杏村);又二十七里至青泥岭;又东南五十三里至兴州长举县(今略阳西北一百二十里长丰村);又东南一百二十里至兴州治所顺政县(今略阳县),又东南经兴城关、大城戍、分水岭,渡沮水至西县(经勉县西)。再折西南经百牢关至金牛县,借金牛道入蜀。又西县东行,经褒城县至兴元府。”

该道还有一些捷道,如从马陵关沿杨家店河南下入嘉陵江,至两当县西坡,渡嘉陵江,经温江寺—留坝县—武关驿—褒城—勉县—汉中,此道武关驿

—褒城段为栈道。后又改为凤县城(双石铺)—留坝县—武关驿—褒城—勉县—汉中。晚唐诗人李商隐等人曾经行此路入汉中,作有《圣女祠》《重过圣女祠》多首,圣女祠在今两当县西坡。

另外,从两当县城北上,经太阳—前川—利桥—三岔可至天水,1932年两当兵变及1935年红二十五军即经行此路。

“故道”因其古老称为故道,为古道、旧道之意,秦时在今两当县东设置故道县。因道路北端为秦汉时的陈仓县(今宝鸡市)而得名陈仓道,又因其北段要翻越秦岭正脊大散岭,古代在岭上设置过一座大散关,又被称为散关道。又因其南段要翻越青泥岭,故又名青泥道。又因其大部分线路是顺嘉陵江上游河谷而行,又名“嘉陵道”。



康县望关残存的古道

该道从陈仓(宝鸡)沿千水(今清姜河)经大散关上行至秦岭,又沿着嘉陵江支流下行到凤县,凤县至略阳县须跨过嘉陵江,由于谷深水险,要绕行位于两当、徽县之间的青泥岭,再折向东南,经略阳县、褒城、勉县到达到南郑(汉中南),全长535公里。楚汉

时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指的就是此道。《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元年）八月，汉王用韩信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史记·淮阴侯列传》：“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辨、故道、雍、郿。击章邯军好畤南，东取咸阳，围废丘（今兴平）。”汉王北定三秦，用韩信计，出故道，战陈仓、好畤，又战废丘（今兴平县），遂东至咸阳，就是沿此道北上的。这条道路路程最长，但比较平坦，且有嘉陵江水运之便，汉末至南北朝分裂时期，汉中、关中、四川之间战争很多，多数沿故道进行。

故道是最古老的蜀道，在铁器大规模用于生产之前，栈道无法开凿，因此，道路比较平坦、无需开凿栈道、且不易毁坏的陈仓道就是唯一沟通关中与蜀地的道路，也就是最早的蜀道。早在开明王朝（公元前666年前后称开明帝，治蜀300余年），建立初期，丛帝鳖灵之子卢帝便率蜀军北上，一度曾越过了渭水，“攻秦至雍”，雍地大约在今天的陕西凤翔一带，汉中为古蜀国占据。公元前451年，秦国突袭汉中，秦左庶长城南郑”，开始在南郑修筑城墙，以重兵把守，其后蜀人收复南郑。此后，古蜀王国与秦国之间展开了长达一百多年时间的冲突。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秦派张仪、司马错进入汉中，彻底灭了蜀国，在这期间，双方大军北伐南攻所经行之蜀道就是故道。

在汉代，褒斜道取代故道成为沟通关中与汉中、蜀地最重要的道路。《史记·货殖列传》载：“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馆毂其口”。褒斜道南起褒谷口（汉中市大钟寺附近），北至斜谷口（眉县斜峪关口），沿褒斜二水行，贯穿褒斜二谷，全程约250公里，大部地段比较狭窄，河流湍急，两岸岩石矗立，道路难于通过，在这些险段须修栈道以便畅通。修建栈阁，其施工方法是：“遇大石塞路，则以锤碎而通之；遇峭壁悬崖，则在崖壁之上凿孔，架横木，上覆木板，钳钉以通之；遇深沟险涧，则架长柁，覆厚板以通之；

遇险陡“羊肠”，壁立千仞，则在路旁打桩立栅，砌石栏以通之。栈阁的修造形制，则大多在崖壁上凿成30公分见方，50公分深的孔洞，洞中插木柱、石柱。分上、中、下三排，上排搭遮雨棚，形如屋顶，以遮半山流下来的泉水或滚落的石块；中排铺板成路；下排支木为架。相互间榫卯结合，远望如空中悬阁。

褒斜道大约开通于战国，但只是一些谷道，将其开凿成能通过大部队和辎重的栈道，则是冶铁术发达、铁工具广泛用于生产、生活之秦汉时期。史载西汉武帝时期，汉中太守张卬开通褒斜道。《史记·河渠书》载：“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褒斜道时通时断，东汉初期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东汉《郾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摩崖刻石记载，东汉永平六年（63年），汉中太守钜鹿郾君奉诏开通斜栈道，至永平九年四月落成，这项巨大的工程历时三年之久。“始作桥格六百二十三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另据学者考订，该栈道上著名的古石门隧道，就是在这段时间首次开通的。大约在此时，原来的谷道已开凿成能通过大部队和辎重的栈道，成为古代巴蜀通秦川之主干道路。

故道基本为陆路，东汉以后，水道才大规模发展起来。东汉永初年间（107~113年），武都太守虞诩“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自沮（今略阳县东）至下辨（今成县红川）数百里，皆烧石剪木，开漕航道，以人僦值雇佣者。于是水运便利，岁有四千余

万。”“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骡马负载，僦五致一。”由此可知，虞诩乃历史上有记载的开辟故道水运的第一人。经千百年修治拓展，故道水道其向东北溯故道水可至故道县，出散关可入关中、渭水流域，向西经河池登陆可达秦州而入甘陇，顺流而下至兴州登陆乃至汉中，径流而下穿越巴中可直趋江至重庆。

故道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朝沿用，屡兴不衰，遂成为甘、陕、川三省交通的咽喉。西汉初年“(曹参)从汉王至汉中，还定三秦，攻下辨、故道。”至三国时，曹操征汉中张鲁。“四月，操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这是从故道南下而入陇南。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丙午，玄宗因避安史之乱而赴蜀(成都)，至河池郡。”从上述两条史实可证：自汉至唐，由关中南入汉中、巴蜀，皆由此道。

唐宪宗元和元年至四年(806~809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自兴州长举县(今略阳县白水江镇北)向西疏浚嘉陵江水道二百里，直达栗亭，焚石烧木，通漕以馈成州兵。”这是继东汉虞诩之后再见于史书的大规模的嘉陵水道修治活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宋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伐蜀，同时命其兴修陈仓道路，是年十二月，“先锋都指挥使、凤州团练使张晖，督兵开大散关路，躬抚士卒，且役且战，人忘其劳，至青泥岭病卒。”

北宋徽宗至和三年(1056年)秋，利州路转运使李虞卿以河池(今徽县)至兴州(今略阳)的青泥岭旧道艰险，议新开白水路，自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里有半。知兴安军刘拱、权知长举县事良友、顺政县令商应祥、河池县令王令图共与其事，历时四月，白水新路告竣，作阁道二千三百零九间，邮亭、营屋、纳院三百八十二间，减青泥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廩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减执事役夫三十余人。白水新路沿白水而行，且多阁道、栈道，易毁难修，故至上世纪70

年代，人们仍多走青泥岭旧道。

南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吴玠大军数十万驻守陇南，“粮饷由四川、汉中运输供给。四川饷运溯嘉陵江千余里，半年方达。”可见此时，嘉陵水路已全线贯通投运。

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四月，“发巩昌、凤翔、京兆等处未占籍户一千户，修治陇蜀山路、桥梁、栈道。”这是元占领陇南后所进行的全面大规模的交通恢复工程。至元五年(1339年)，“成州长官元帅武思信奉朝旨督修嘉陵江上游水路道路，以便漕运军粮。历七旬，修治兴州以上陆地行军运粮路一百八十渡，悬崖阁道三千六百余间，桥梁六十四所，避水患二百余渡。自是漕运流通，行人不苦，粮道不绝。”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春，徐达率师自徽州南出一百八渡，徇略阳，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遣别将自连云栈取兴元。正德七年(1512年)，按察金事李璋巡陇右，时四川起义军攻江油、昭化，烽火连境。前年，起义军曾至徽、成地区，今年又来。李璋急驰至徽州，分兵五营，列阵白水江镇，首尾连络，又多设疑兵于险要之地，起义军至而复退。

清顺治二年(1645年)，张一鹏任徽州知府，时四川未平，徽州运输军粮，造船只，由永宁河之合河口上船，进入嘉陵江，后因罗汉洞山石阻塞，水道不再通于徽州境内。由合河口溯永宁河北上，乃为由川北、陕西通往秦川、进入甘陇的山路步道之一。顺治六年(1649年)，杨三辰任徽州知府，时清军入川，于徽州统贮粮饷，转运于略阳，徽民负担甚重。杨三辰督民疏浚嘉陵水道，修造船只，以通水运，民咸称便。

清同治六年(1867年)，四川候补道彭汝琼向陕甘总督左宗棠察陈办理接济甘军米局情况，左宗棠批复：“略阳白水江合故道嘉陵、两水可通舟楫。陆路经徽、凤抵宝鸡达渭，为程四百里，通秦陇。唐时运道所经，国初用兵巴蜀，军粮从此转输取经。非

不知劳费万状,而筹军食者舍此末由。”八年(1869年),提督傅先宗察陈陇南官军防剿起义军情形,左宗棠批示:“见在秦州的一路兵力厚重,垂应分别防剿,以利戎机。查徽县城外驻两营,距徽城六十里榆树坝须驻两营,距榆树坝五十里高桥须驻三营,距高桥五十里李子园须驻两营,三十里娘娘坝须驻两营。距娘娘坝五十里皂角铺须驻一营。”

光绪十九年(1893年),甘肃总兵易顺胜主持重修徽县至略阳县之路竣工,此项工程计“历时两年,修路五十里,架设桥梁十四处。”其事详见次年镌《徽县大河店修路碑》。

新中国成立后,宝成线铁路亦大致沿该故道线路修筑。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解州知事陈斐然在其《西行日记》记录了从阶州至宝鸡的经行路线:从阶州出发至蔡家湾、佛堂山、甘泉、佛儿崖、望子关、庄斋、平洛、太石山、酸枣坡、小川子、成县、徽县、永宁河、两当县、杨家店、黄土岭、双石铺、凤县、白石铺、白家店、草凉驿、黄牛铺、东河桥、秦岭(即古大散关)、益门镇—宝鸡。

(二) 祁山道

路线:秦州(天水市)—牡丹—罗家堡—盐官—祁山堡—长道—石堡—西和县—石峡关(龙门关)—府城—太石渡—白马关(云台)—大南峪—窑坪—宜口—略阳县城—汉中;或从石峡关—纸坊—成县—红川—栗川—木皮岭(并入故道)—青泥岭—虞关—九股树—略阳县城—褒城—勉县—汉中。

另外,明清时期拓修青泥河,则由成县—青泥河—徐家坪—略阳县城—汉中。从成县沿东河(黑河)北上,经黄渚—麻沿—娘娘坝—齐寿—皂郊,可至天水。从成县南登鸡峰山—谭河—云台—窑坪—郭镇—两河—铜钱—阳坝—安乐河,进入四川。

祁山道起于秦州,至于汉中,亦为水陆兼行道。水路以西汉水为主干,通过西汉水沿岸各渡口与陇南各条陆路相连。比之嘉陵道中上段,该道河

谷宽阔平缓,开发亦早。远古时期,即为两地民众所利用,流域内比较丰富的彩陶文化即其佐证,尤其是三国时魏蜀交战,诸葛亮“六出祁山”伐魏,频频往返于汉中、祁山间,或攻或守,进追自如,遂使本道名扬天下。该道曾在唐朝开元、南宋绍兴、明代万历年间有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应用和修治。

汉高祖元年(前206年),樊哙率兵“攻西县丞于白水(今徽县洛河)之北。”可见,西汉时,刘邦军队已深入到陇南境内。

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武都太守李翕修治“郡西狭中道”,亦即天井道。该道从郡治下辨(成县红川)始,沿洛江出元观峡,南下入嘉陵水道。三国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春,蜀相诸葛亮首次出祁山伐魏,获姜维,“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此次即从祁山道入于故道而至汉中。太和五年(231年)三月,诸葛亮“复出伐魏,以木牛运粮,出鹵城(今礼县盐官镇)攻天水。”

西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杨茂搜向晋朝贡,拜为骠骑将军、左贤王。五月,晋梁州刺史张光与巴西流人首领杨虎分别向仇池求救。八月,杨茂搜遣杨难敌入汉中。十月,杨难敌助杨虎攻张光,据有汉中地。

唐玄宗开元元年至十二年(713~724年),诏命汉阳郡太守修筑龙门谷(今西和县坛土关)栈道,摩崖碑云:“路泛垫,隘吞蜀。郡南阳冲蜀门之口口(空缺字),控仇池之险要。”可见,石峡关(又称龙门关)实为“祁山道”之咽喉所在。此栈道沿石峡河而修,石峡河入六巷河而同归西汉水。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往返汉中,当屡经此道。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十月,诗人杜甫离开秦州,经盐官、祁山、汉源(今西和县石堡),入石峡道而至同谷县(今徽县栗亭)。住月余后,经木皮岭、青泥岭而入嘉陵水道,直至成都。当年杜甫所经历,正是由祁山道、故道而入蜀的。

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上禄(今西和

县上六巷)修建栈道。隆兴元年(1163)正月,吴璘奉令放弃德顺军撤兵,道路为金兵切断,吴璘退归河池。朝廷采纳申浩奏议,欲尽弃陕西地,虞允文上疏:“恢复莫先于陕西,陕西五路新复,州县又系于德顺之存亡。一旦弃之,则窥蜀之路愈多,西和、阶、成,利害至重。”本道战略位置之重要,由此即见。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十二月,金将杨沃衍出秦州攻西和州祁山堡,又攻破白环堡,再败宋兵于寒山岭、龙门关、太石渡。金兵进攻宋军,走的还是祁山道。

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修西和县上六巷柱腰崖栈道。十年(1637年)二月,李自成起义军攻陷阶州。不久,起义军复由阶、成出西和、礼县。同年,李自成率部由秦州经陇南入蜀。

清圣祖康熙十五年(1676年)六月,吴三桂叛军四川总兵吴芝茂集溃兵万余屯铁叶峡、红山堡筑垒,抚远大将图海遣将军佛尼勒进攻。总兵王进宝等败吴兵于牡丹园(今天水秦州区牡丹乡),又连败于罗家堡、盐官、祁山堡,再败于西和。吴芝茂仅以二十余骑逃亡,清军追至石峡关。

祁山道是陇南地区的一条主要道路,该路有多条分支:自石峡镇西上西高山至牛儿坪,下山至灯塔村(西汉武都郡),可经洛峪镇至礼县龙林、白关、牛尾,至宕昌县南阳、临江、宕昌城关、岷县;自石峡镇东南,至纸坊、小川至搭船坝、铁笼山(关子沟)、平洛、望关,西可至甘泉、米仓山、安化、马街、阶州(今武都城关),或从甘泉、佛堂沟、汉王、阶州,或从望关、歇马店、熊池、黄坪、碾坝、豆坝、琵琶、五马、洛塘、姚渡入川;自石峡镇、纸坊、太石、龙坝(秦家河)、隆兴、牛蹄关、安化、马街、阶州。自龙坝(秦家河)、敞河坝、大桥、洛峪、何坝可至西和县。从敞河坝分路经小川至至成县。

二、西东方向古道

(一) 西倾山道

路线:西倾山(古临洮县,今岷县)—哈达铺—南河(西汉羌道)—宕昌(南北朝宕昌国)—临江—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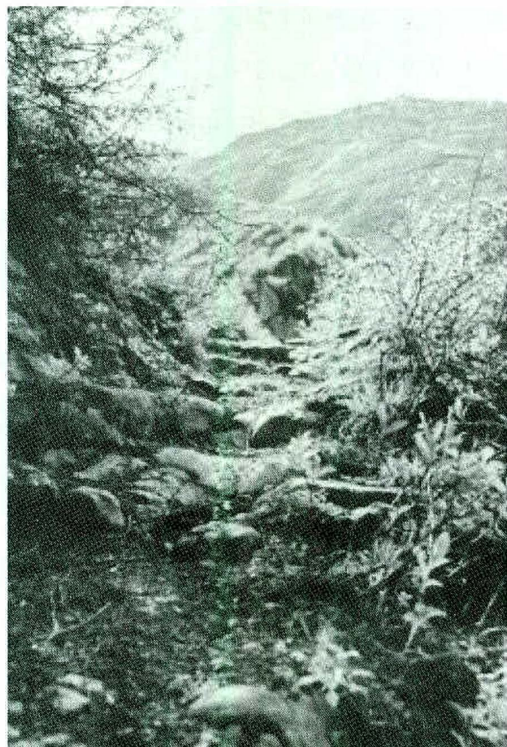
羽山—南阳(北周及隋唐宕州)—韩院—好梯—牛尾关(见《牛尾关梯崖路碑》)—白关—太塘(宋大潭县)—龙林(西汉西嘉陵道)—洛峪(西汉武都郡)—将利(西汉修城道)—谭河—西淮坝(南北朝盘头郡)—徐家坪。或谭河—白马关(云台)—大南峪—窑坪—置口。

沿干线还有数条支线:自韩院—铨水—狮子—新寨—角弓(南北朝石门县,武都郡治地),可接甘川道。或从铨水东进—滩坪—雷坝,可顺西汉水至大桥。

礼县—石桥—江口—中坝—白关—牛尾关—白河—桥头—草坪—池坝—马营—蒲池—两水—武都,是古代礼县通武都的重要通道。若自石桥—龙林—雷家坝—金厂—马街—武都为捷道,也可到达武都。

自武都起,经安化、牛蹄关、秦家河、敞河坝、大桥、洛峪、何坝至西和。从敞河坝分路经小川至成县。

自谭河往北越鸡峰山可至成县,往南经白马关(云台)—大堡—长坝—一望关可至武都、文县。



礼县沙金牛尾关古道

《尚书·禹贡》载：“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罍、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译文：华山南部到怒江之间是梁州：岷山、嶓冢山治理以后，沱水、潜水也已经疏通了。峨嵋山、蒙山治理后，和夷一带也取得了治理的功效。这里的土是疏松的黑土，这里的田是第七等，赋税是第八等，还杂出第七等和第九等。这里的贡物是美玉、铁、银、硬铁、作箭镞的石头、磬、熊、马熊、狐狸、野猫。织皮和西倾山的贡物沿着桓而来。进贡的船只行于潜水，然后离船上岸陆行，再进入沔水，进到渭水，最后横渡渭水到达黄河。）《禹贡》中的这段文字为叙梁州入贡之道，曰“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西倾即西倾山，郑玄曰：“地理志西倾山在陇西临洮。”西汉陇西郡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县），所属之临洮县治今甘肃岷县（西魏置临洮郡，北周改为洮州）。西倾山是秦岭山系西部一条支脉，亦称西强山、嶷台山，位于青海河南县与甘肃碌曲、玛曲之间，属洮河上游区域。

按西倾山及潜、沔水，诸儒尚无异论，惟“桓”之名众说歧出，莫可折中。孔安国、马融及班固《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都以“桓”为水名，而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则以为“桓”为陇坂名者。邢澍在其《桓水考》中认为是白龙江。以上诸说皆与事实不符，“桓”字本意并非水名，本义是表柱，古代立在驿站、官署等建筑物旁作标志的木柱，后称华表，也有大的意思，《诗经·商颂·长发》：“玄王桓拨。”《毛传》：“桓，大。”其《禹贡》文中并列潜、沔、渭、河，以及江、汉、漾、泾、济等水名皆为“氵（水）”旁，独“桓”为木旁，可证“桓”不是水名；另外，白龙江流向也不符合“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方向。陇坂即陇山，即今关山，在甘肃、陕西之间，属六盘山脉，孙星衍注引汉郑玄曰：“桓是陇阪名，其道盘桓旋曲而上。”也于文中记述不符。因此，“桓”应作“桓坂”解，即长满大木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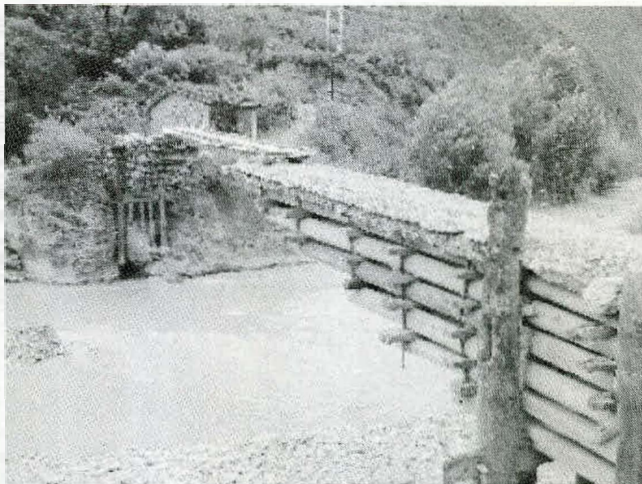
岭，《山海经》载：“秩周之山木多桓。”按其经行方向和路线，所谓“长满大木的山岭”只有今宕昌县临江与南阳之间的毛羽山与其相符。这样，西倾山的贡物从今临潭地区出发，沿洮河至岷县，再经宕昌、临江，越毛羽山，至南阳、龙林，沿犀牛江（西汉水下游）岸而下，渡嘉陵江至略阳县，沿汉水东进，可沿褒斜道北上至陈仓（今宝鸡）。或到汉中，再经子午道至长安（今西安），最后沿渭水进入黄河。由此，才可以“浮于潜（嘉陵江），逾于沔（汉水），入于渭（渭水），乱于河（黄河）。”

西倾山道在隋唐以前，是接通陇右至汉中的主要道路，过毛羽山之后东行，再无大山阻隔，道路较平坦，也无需栈道之类，汉晋南北朝时沿途设有诸多郡县。至明清时期仍是一条沟通东西地区的重要的茶马商道，直至上世纪50年代还有商旅往来，尤其是白龙江甘川道阻塞时，仍是自陇右入川的重要辅助道路。

（二）阴平道

路线：舟曲县—两河口—武都—火烧关—文县—县城—碧口—白水—昭化—剑门关—绵阳—成都。此为阴平正道。

阴平小道则为碧口—摩天岭—青川—唐家河—阴平山—马转关—靖军山—江油关（今南坝乡）—绵阳—成都。



宕昌县岷江握臂桥

自舟曲县至文县,还有一条捷道:舟曲县一两河口—武坪—越插岗梁—博峪—文县中寨—马营—石鸡坝—文县。1949年12月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军一八四师先头部队沿此路进至文县碧口镇,据守碧口镇的国民党军由碧山沟逃往四川省青川县。

从武都至四川九寨沟县(原南坪县)有4条小道:从武都黄鹿坝起,经槐树坝、木头岭、大湾沟到南坪;从槐树坝起、后燕麦、过插岗岭、纪家大地,越鸡冠梁、斜坡、刀口坝到南坪;从烟墩沟起,经铁坝、博峪河、茶坪沟、越鸡冠山到南坪;从沙湾里起经斜坡里、曾木川、驼各里、剪子寺、博峪梁、茶路到达南坪。

另有一条白马路古道也值得重视。西汉时在今文县、四川平武县一带设广汉郡北部都尉(简称广汉北部都尉,后为西部都尉,汉安帝时改为属国都尉),属广汉郡(治今四川梓潼县),治阴平道,统阴平、刚氏、甸氏三道,三国时改为阴平郡。阴平道治今文县城关镇鹤衣坝村,刚氏道治今四川平武县古城镇,甸氏道治今四川九寨沟县双河一带。三道之间有一条大路相连,即白马路,其路线为:自鹤衣坝村南下,渡白水江后沿白马河西进,经干沟坪、演武坪、铁楼乡、草河坝、跌部寨至平武县白马乡,全程130华里,再东至木座乡、木皮乡、平武县城。由白马乡向西可至川主寺,是通往川西松潘的一条捷道。至明代仍是陇南入蜀的一条大道,建有墩台,驻有戍兵,至今仍有上墩台、下墩台、演武坪等地名,墩台遗址仍存。1936年4月国民党胡宗南在摩天岭地区阻击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转战川西时,胡宗南部四十九师伍诚仁所行道路即白马路,抢在红军之前占据了松潘城。白马路地区现为白马人聚居区。

阴平正道起自沓中。沓中在今甘肃省舟曲县。《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载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年)十月,姜维攻洮阳,邓艾“破维于候和(今临潭境内),维退住沓中种麦。”《三国志·魏书·邓艾传》载景元四年(263年)五月,魏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益城刺史师纂五路伐蜀。魏军追姜



武都城东栈道湾栈道遗迹

维至强川口(今迭部县境内)大战,姜维败走阴平,又与廖化还至剑阁,拒钟会。二月,邓艾沿白龙江自阴平景谷道入蜀,行无人之地七百里,攀木缘崖,进占江油,蜀江油守将马遵等降。邓艾进至成都,蜀后主刘禅降。

阴平道是以白龙江、白水江为主干的水陆兼行道。远古时期,即为诸羌所用,后因三国时蜀汉姜维屯兵沓中,魏将邓艾由之伐蜀而使此道闻名于世。

邓艾命天水太守王颀直攻姜维营地,命令陇西太守牵弘等人邀击姜维的前部,而命令金城太守杨欣进击甘松。姜维在沓中见邓艾的军队攻来,又听说钟会进军汉中,知汉中难保,立刻引兵东撤,急摆脱邓艾,退往阴平。魏将杨欣等人追击,直到疆川口,双方大战,姜维败退,为抢先占桥头(阴平东南)的诸葛绪所阻。姜维从孔函谷佯作向北欲绕道而东,作出出兵攻击诸葛绪后部的样子,诱使诸葛绪离开桥头三十里向北堵击时,姜维乘机迅速通过桥头,与廖化、张翼等合兵,据守剑阁。诸葛绪赶去阻截,

差了一天,没有赶上。

关于邓艾伐蜀之阴平道,史书多有记载。《三国志》云:“自阴平由景谷道旁入。”《华阳国志》云:“自景谷有步道,经江油左担出涪。”二者记载一致,其具体路线是由甘肃文县沿白水江、白龙江而东至碧口,由此折而南行,溯碧峰沟而南,经青岩关,越摩天岭,至青川县,“盖邓艾为避开蜀汉白水关(今白河镇)守军,故不经景谷正道。”这一路线,直至民国时期仍为民间下四川走成都的山路捷径。

后唐庄宗同兴三年(925年)九月,庄宗李存勖,发兵六万伐蜀。十月,前蜀主王衍引兵数万自成都至汉川。后唐兵来攻,武兴节度使王承捷以凤、兴、文、成四州印节迎降。成州刺史王承朴弃城走,阶州刺史王承岳亦降。蜀天雄军节度使王承休帅一万二千人,赂羌人,买路由文州归蜀。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蒲亘为文州通判,朝廷有人提议从文州到陕西汉中修一条路。亘上疏:“洮、岷、积石至文甚远,自文出江油,邓艾取蜀故道也。异时鬼章欲从此入蜀,为其阻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为之通道乎?”因而否决了这一提议。蒲亘的上疏,其实勾画出了此道的大概。

明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以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率舟师征瞿塘;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将军,率步骑由秦、陇伐蜀。四月,傅友德抵阶州,败蜀将丁世贞,克阶州城,蜀军断白龙江桥。傅友德修桥以渡,破五里关,遂拔文州。又渡白水江,进军绵州。绵州在江油之南,其入蜀当亦从此道。

清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起义军首领苟文明合各路起义军余部至阶州,当地民众参加起义军,队伍壮大后离阶州回广元一带。起义军走的是景谷正道,亦即“沓中阴平道”之正道。

沓中阴平道是从甘南南达川北(青川、广元、平武、江油)乃至成都的战略要道。至今,该道主干路线虽为甘川公路所替代,但一些支道、山路(步道)仍旧为民间所沿用。

(三)甘川大道

路线:兰州—临洮—岷县—分水岭(麻子川)—哈达铺—宕昌—临江—官亭—花石峡—两河口—武都—临江—口头坝—碧口,顺江而下至四川白水—昭化—剑门关—绵阳—成都。此为甘川大道。

甘川大道实为西倾山道与阴平正道两条道路的融合,开发较迟,约在明代,该道主要沿岷江、白龙江而行,特点是较为便捷,沿途村镇密集,但滑坡、泥石流灾害严重,晴通雨阻,艰险难行,并有数处桥梁横跨于岷江、白龙江之上。

另外,还有几条支线:一是自临江至尖山—火烧关—文县县城—碧口—白水—昭化;一是经透防峪—马塆—坪头坝—草河坝—代乐山—玉垒—碧口—白水—昭化,这是武都至碧口的一条捷路;一是经三河—麻崖梁—洛塘—枫相—四川姚渡—白水—昭化。



白龙江畔悬崖上的古栈道

甘川大道该路多处建有栈道,在邓邓桥附近的悬崖绝壁上,还可以看到许多当年邓艾父子修建的古栈道石孔。武都城东20公里东险崖巴古栈道,西起笼幢沟,东至固水村,全长达两公里,是甘川大道上三大古栈道(邓邓桥、险崖巴、阴平)之一,今天尚存的古栈道遗址凌空架设于悬崖之上,险峻异常。最险要的一段为“天柱式”结构,有300多米的悬崖因无法立柱或斜撑,仅在崖石中凿洞插入横梁,铺设木板而成,人行其上震颤不已。抬头危崖碰额,俯首则滚滚白龙江奔腾于脚下。

光绪二十四年腊月十九日,陈斐然从阶州走文县用时四天,共250里,其行走路线为阶州、蔡家湾、象石崖、董家坝、外纳、王家坝、临江,从临江过桥至老爷庙、山根子,越八盘山至文县城。

甘川公路基本上沿甘川大道修建。至1953年甘川公路全面通车后才结束了行人走栈道、涉江河的历史。

三、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西番之间以茶叶和马匹相互交换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商贸通道。从历史文献资料来看,除了西南的滇藏道、川滇道、川藏道、岷山道外,从四川通往陕、甘地区也存在着一条极其重要的茶马古道,即秦蜀道。秦蜀道在宋、明、清时期承担了四川、汉中及湖南等地同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番地茶马交易的主要任务,是真正意义上的以茶易马的茶马古道。

这条茶马古道始自今四川省成都市(古称蜀),终止今甘肃省天水市(古称秦州),也可称简其为陇蜀道或陕甘川道。现存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和石碑、古道、古遗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徽县的《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重修庙学记》《徽州调停驿站碑记》,康县的《察院明文》等石碑对茶马交易有详细记载,在全国都是仅见的。

秦蜀茶马古道由主干线和若干条支线构成,官府在道路沿线设立有各类管理机构。巡视陕西茶马御史负责监管全国养马苑囿和茶马交易,徽县高桥乡木庐村火站为陕西巡茶御史的官署之地,也就成为全国茶马交易的管理中心。

秦蜀茶马古道南起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北至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成都为买茶地,汉中为茶叶加工地,秦州为卖茶买马地。茶叶由成都运至汉中加工后,再集中运至略阳,秦蜀茶马古道由干线、支线和捷道组成。

干线为成都—汉中—略阳—九股树—白水江镇—青泥岭—徽县县城—榆树—火钻—高桥—白音峡

—李子园—娘娘坝—皂郊—秦州(今天水市),然后运至陇右番地交易马匹。《大清一统志》载“高桥镇在(秦)州南八十里,明置巡司。旧志有稍子站茶引所,在州南五十里。又十里为白音峡。又二十里为高桥巡司。又三十里为火钻镇,接徽县界。”

除这条干线外,沿途还分出若干条支线,穿越陇南地区,进入陇右番区。主要有两条:一为散关道(或窑坪道),该道从陕西略阳出发,渡嘉陵江,经置口、窑坪、大南峪、云台大山岔(古称散关、七防关)、唐房坝、关沟门(向北可进入成县小川境内),沿西汉水西上,经河口、李山、毛坝,至武都县田河,在此继续西行,可达南阳、宕昌、哈达铺、岷县、甘南地区;或北上经西和大桥、洛峪(西汉武都郡治)、何坝,可到达岷县、漳县一带;自毛坝转行平洛,经望关、甘泉、安化、马街、武都,可接入阴平道,再进至岷、洮地区,因平坦易行,在清代以前,这条道路是陇右通往川陕地区的主要商道。二是阴平道(或称甘川道),该道起自四川绵阳,经江油、青川,翻越悬马关至碧口、沿白龙江而上,经文县、武都、宕昌、岷县进入甘南、临夏、临洮、兰州,直抵青海番地及西藏地区。相对散关道而言,阴平道是陇右入川的一条捷道,但多高山深谷,悬崖峭壁,道路十分艰险。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史书中没有记载的“捷路”,这些捷路,也就是明代文献中的“犯私茶者”走私茶叶的“通番”小道,为防止茶叶和食盐走私,官府在这些小道上常设关卡,称“盐茶关”。或者设置“告示”,近期在康县望关发现的记载有“茶马贩通番捷路”文字的石碑(即茶马古道碑),便是巡茶御史刘良卿命令察院以石碑形式发布的告喻“经商人等”严禁茶贩私售的“大字告示”。该碑立碑时间应为明嘉靖十五年巡茶御史刘良卿上奏“严禁边地茶贩私售”之后”。

两宋时期,大规模的茶马交易主要发生在陕、甘地区。据史料载,宋、番茶马交易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和汉中地区,而所易之马主要为陕、甘番区的战马,承担运送茶叶和输送马匹主要任务的秦蜀道也

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茶马商道。

明初,中央政府为了保证榷茶的顺利进行,从都察院监察御史中派遣人员代表朝廷巡视茶法马政等事务,一般称巡视陕西茶马御史,简称巡茶御史,负责监管全国养马苑囿和茶马交易。陕西巡茶御史以今徽县榆树乡火钻峪(今徽县高桥乡木庐村火钻社)为巡茶察院行台办公之地,并设有批验茶引所(嘉靖年间火钻批验茶引所移建今略阳县白水江镇)。以火钻峪附近的木庐(今徽县高桥乡木庐村)为巡茶御史公馆之地。火钻峪成为全国茶马交易的管理中心。今徽县榆树乡火站镇村地处银杏至榆树道路上,为清康熙年间茶马互市制度结束后形成的贸易集市。



在康县望关发现的明代茶马古道石碑

秦蜀茶马古道干线及支线上均设有茶马交易管理机构,如茶马司、巡检司、批验所等。在秦州设置了茶马司,并在秦州骆驼巷、稍子镇和徽州火钻镇等地设立了批验茶引所(批验所),专门负责秦蜀道茶马贸易及茶引检验等事务。除了在徽县火钻镇设有巡茶御史察院行台外,还在徽县城西街设立了批验

所;在今康县云台镇东3公里处的大岔山设七防关巡检司(明代以前称散关);在康县东接略阳处设有直口巡检司及阳平关巡检司;在今成县北设有黄渚关巡检司;在今徽县北设有高桥巡检司,南面有虞关巡检司及白水镇巡检司;在今礼县西南设有漩水镇巡检司和板桥山巡检司。另外,还设有茶马场、卖茶场、马监多处,作为茶马交易场所。

明朝初年对茶马交易管理严格,处罚十分严厉。明代中后期,茶马交易日益废弛,朝廷也曾数次大力整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茶马私贩问题一直没有杜绝,康县望关发现的《察院明文》碑就是这段历史的实物证明。

清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虽然已经没有明代那样辉煌,但就整体上看,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依然比较活跃。茶马贸易运输路线也仍然是秦蜀道为主,其中故道这条商道作用更大,成为一条主干线。

清康熙年间,清政府决定将“西宁等处所征茶菴停止易马,将茶变价银元充饷。”这样,茶马互市彻底停罢了。于是,自唐代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官茶垄断贸易宣告终结。

此后的茶马古道虽然没有了官方茶马贸易的内容,但茶叶和其它物品的交易依然存在,南方的茶叶和丝绸、布匹、白酒、日用品经此源源北上,而北方的食盐、水烟、皮毛、药材等由此南下。康县窑坪作为陕甘川交界地带的货物重要集散地,历经数百年,直到解放前夕,仍十分繁荣。上世纪50年代后,随着宝成铁路、甘川公路和略武公路的修通,往来货运改走铁路和公路,这条千年古道才逐渐废弃、萧条,失去了往日光彩。

(作者:甘肃省陇南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从石刻文献看陇南历史上的乡规乡约

赵逵夫

内容摘要:古代官府主要为朝廷办事,赋税差役之外,能防止匪盗作乱,就算是良吏。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很多事,并未明确为其职责范围中应有之事。故除一些正直、亲民、有责任感又有能力的官员之外,大部分地方官员只希望维持地位,能得到升迁;有的甚至不顾一切搜刮民财。所以,以一些乡贤和地方有见识、有影响的人物为中心,乡民自己议定、解决一些问题。这就形成一定程度上属于民众自治范围的乡约乡规。陇南石刻中不少这方面的内容,为我们留下了很多认识古代自治观念的宝贵资料。其中有保护地方经济、文化与生态环境的,有为对付恶吏支派差役款项中的胡作非为行为的,有募捐修桥修路、修建义学、筹办公共事务的,有杜绝不良行为的,都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关键词:甘肃陇南 石刻文献 乡规乡约

过去的一切“正史”,都是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无非是这个朝代灭了,另一个朝代建立;一个帝王死去,另一个帝王继位;帝王下的什么诏书,臣子上的什么疏表;哪个官升了,哪个官贬了;封些什么公侯、任命什么官职之类。州县以下社会的秩序、经济的发展等究竟怎样,人民生活是怎样维持的,城市、乡镇、农村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从“正史”中是看不出来的,最多是灾荒之中,言某地“人相食”之类聊寥寥几句。而石刻文献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古代的基层政府,主要是为朝廷办事,也为上级长官办事,对老百姓生活中各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考虑得周到,往往是有了很大的灾荒之类,上面会有济賑、抚恤之事,但也往往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皇帝为賑灾发的圣旨恩恤如春雨普降,到老百姓头上总是见不到几滴。有很多事,还要老百姓自己来做。但自己做总得有人牵头,这就只有靠当地德高望重又有组织能力的人出面。如无有仁德的乡贤为

大家拿主张,则会有恶霸地痞和流氓主幸乡民,藉以盘剥。乡村贤达也依靠自己可以同官府沟通的条件,使一些事情得到官府的认可或资助,往往是以官府名义起动,而大家募捐合力完成。这样虽作官的坐享其成,但杜绝一些胥吏刁民的敲诈或抵赖。由陇南碑刻中的一些公告、协约等,除官府公布者外,民间因公共之事刻石立碑,多属此类。从这些石刻文献可以对陇南几千年社会的另一个侧面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目前陇南所存这方面石刻文献资料,以清代与民国之时的为多。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及文化的普及状况(识字者少则立了也没有人能看),与人们政治观念的转变有关。

这方面的碑文,第一类是有关保护地方经济、文化资源及生态环境的。

这类碑文不多,但在地方上被看得很重要。武都县道光十年的《名山老殿护栽树木碑记》中说:

城北之五凤山,固州之一大胜景也。

第山形陡峻，栽树者恒培植为艰，故虽有名刹足以壮观，而树木鲜有，几与童山相等。

“童山”即秃山。因上面所说的原因，一些人士“各处寻取松柏树苗，并与冬青、杨柳等树，或花卉如牡丹，节年植栽”，“越今二十有七年，树木日渐茂盛”。其咸丰十年的《凤凰山水源碑记》表现了同样的思想观念。其中说凤凰山原“山水尝美，林壑尤盛。原泉因之混混焉；原泉混混，吾辈得以养生焉”。其后有人“烈山林而焚之，则水之有本者若无本焉。利取于一旦，祝及于万年。”道理讲得相当深刻。光绪六年又有《公议严禁山林碑》，言安化镇“旧有山林一所，居民资其材用已久矣。乃初坏于秦人之用木厂，继坏于□之□火田。然木厂开而犹望萌蕉之生，火田垦则忍观化为灰烬”。因而明确划出两处应保护山林的疆界。三篇碑文表现了同样的思想观念。可见古人已注意乱砍树木、焚烧山林的危害，采取种种措施植树种草、保护山林。陇南其他县都有类似的情形。我们今天必须继承这种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精神。

第二类是为完成官府支派种种差务款项及杜绝当中一些弊端经公众商议后立的碑。

西和县清嘉庆二年(1797年)的《差务章碑》，其末标明“闾邑士庶公立”，则显然是经过民间各方面代表人物商定后所立。其开头说：

为严除拉马支差之积弊，订立章程以苏民困事。照得西邑路通蜀汉，每遇差务，额马不敷，势不得不在民间雇觅。奈日久弊生，多有蠹役借差舞弊，不论居民行旅，有马即拉，或需少拉多，受钱卖放，骚扰欺凌，种种不法。

所定办法是：“兹据闾邑绅士议定章程稟请，凡遇差务，各里屯自行承办，永不假手胥役。”以下又列

出具体承办原则及根据差役大小和不同情况的办法五条，清清楚楚。此后附各里屯一年中承担之日期：

和政里二十三日，岐山里四十日，通远里三十二日，西和里五十九日，古岷里三十日，盐官里三十九日，木门里二十六日，保子里一十日，巩昌卫一十三日，文山所二十七日，岷州卫一十六日，西固所二十二日，阶州屯二十三日。

这对于了解当时基层如何对付恶吏凶差的巧取豪夺，及考究当时陇南的建置及各乡镇经济、人口状况都有一定意义。

嘉庆十四年的《章程碑记》是对前一章程的重申与补充。碑文中说：

兹据该县士庶徐振鹏等公[议]：“遇有差务，需[要]军马多寡，难以预定，设遇号马不敷，势难压前候。距城郭远之民，遇有差使，得以安居无事；而附近城郭者，则疲于奔命。若不稍为变通，士民等废时失业，何所底止？”

以下为防止差役利用《章程》规定不够具体细致而钻空子，又作了一些较具体的规定，对于县内远乡承担义务的事也作了补充说明。此重申之碑文中一些细节上的叙述，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当时社会思想、经济等方面的信息。

这类碑文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使我们更具体深入地认识到封建社会政治的腐朽与混乱；二是看出广大人民群众在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安定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往的历史研究只注意到人民的反抗，关注到人民在强烈不满下的起义、暴动。其实广大人民群众从自己的一方在尽一切努力维护吏治的正常运行，通过立碑、建祠等行为表彰好的，也通过与官府当局沟通后订章程、树碑碣以避免贪吏的过分

行为。直至实在无法生存之时,才会有受压迫最沉重的农民等振臂一呼、揭竿而起。腐朽透顶的王朝被推翻了,建起了新的王朝,开始会好得多,但后来也往往又走到前朝的老路上去,而且每次动乱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因此,关键是社会制度问题,是法制建设与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好的社会,每一个人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包括阻止各种影响社会发展的不良行为。

第三类是关于募捐修路修桥、修建义学、筹办公众事业的碑碣。

成县嘉庆十二年的《重修飞龙峡栈道募化布施人等并布施人等姓名碑》,全是施舍人名及钱数,最高一名十千,其次五千,三千,捐一千者人最多,所捐最少为三百、二百。徽县道光四年的《严坪募化修路碑》,光绪二十年的《徽县大河店修路捐资碑》中说:“为涂溪涧之险,跋涉艰难之岖,上下桥梁朽壤,风雨冒渎,来往客商,行步艰难”,因而“齐心募化”,“捐资相助”。其中特别提到“往来客商”,说明了地方人士对当地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视。这几个碑文是有代表性的碑文。因为因修桥修路而募化之事最多。只是很多碑只在碑文中说到修桥修路时有众人募化之事而碑题中无“募化”等词语,故只能放在《蜀道变迁与陇南交通》部分论述之。

两当县《募修城中街衢及城中水道引》说:

盖闻古者至冬乃役。农事既毕,土功其始。此言修城郭,浚沟渠之宜及其时也。况夫平治道、开通沟渎,为有司之专责乎?本县承乏斯役,下车以来,见城中街衢石块剥落居多,商贾行旅,碍难行走,皆因东门水渠壅塞所致。每逢久雨,往往浸淫为灾。

最后决定“本县首倡捐银拾两。心廛居之民,既在

兹土,咸食其息,分宜共勩厥功,量力捐资”。为了使老百姓放心,特别说明:“至于兴工购料及收资发价等事,并不假书吏之手,仅着公同保举老诚练达一二人作为董事,晨夕切实监工,幸勿草率”。虽然是官府首倡,用费还是用募捐的办法,而且公推一二人负责经费开支及施工事宜。这个县令是很精明的人。

第四类是有关公共产业的。在封建社会中公共产业不多,主要是寺院、家庙、公共坟地之类。但有些处理不当,不但会引起纠纷,还会引起家族之间、村与村之间及寺僧与周边信士之间的矛盾。

武都县清代的《清凉寺产业碑记》,是关于寺院产业的,说得具体详细,连酒食钱的数目都有规定。寺院虽信善敬佛之地,但如无产业,也难以补充修建维修的经费;有了产业而无记载及规定章程,也会给一些狡诈贪腐之徒以可乘之机。看来寺院管理中的弊端及具体管理办法问题也是自占有之,不独今日。这个碑文中所说的作法,可供当今一些寺院参考。

文县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重修养济院记》,是记有关收养鳏寡孤独机构的碑。其开头说:“邑之养济院,阅旧《志》,在县东门外,明崇祯十一年被寇焚。本朝知县李公霖重修于县西门外。旋废。知县杜公若甫改建于东郊金山寺后,又废。约百余年,至咸丰初,知县陈公继仁,重建于北郊龙王庙前。”可见文县之有养济院,至迟在明代。由于封建社会中缺乏长期维持公益事业的体制,几建几废。然而也毕竟有人在废后重建。咸丰年重建后历二十余年,又塌朽不蔽风雨,县令长赆又重修之。这种近于今日养老院的机构当时大概在全国也不会很多。对于地方上一些好的传统能够尽力地维持、弘扬,这对地方官吏来说是一种高标准的要求,但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反映着地方官员和当地乡贤的思想境界。

第五类是禁止某些不良行为的。

成县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张旗存碑》是戒“邪淫”之碑,劝人“未行者宜防失足,既行者急早回头”,是张旗存为地方风化而写,其弟子张恕“书石刊印”。此非碑碣,而属刻版,然而非刻于木而是刻于石,故收录之,以见一些地方人士在维护社会风化方面所作的努力。

两当县道光八年的《皇清严禁赌博碑》在今天仍有很大社会意义。其中说,有些地方“村墟寥落,每多游匪赌棍,往来其间。而窝赌者喜占便宜,又从而招摇勾引”。赌博行为“[坏]人心,败风俗”,因而“公同具禁,请邑侯,赏准出示”。这是民众自己提出而取县衙批准而立的严禁碑文。碑文中除对本地聚财、诱骗赌者严加查拿外,还说到:“将本境窝户以及外来赌棍按律究办,决不稍宽。再有外来游僧道并丐乞等众,不许三五成群,讹占恶讨。”这对一般人管束家庭成员远离赌徒及如何应付以修建寺院庙宇强行募化都有很大启发作用,对于今天的城乡基层组织的管理,也具有借鉴意义。

文县光绪九年的《得胜乡公议禁约》,共四条:一、“盗贼宜禁也。近有一等无耻之辈,不愿仰事寻畜,一味做贼为生,且屡诛屡犯。一经拿获,定要报众。”下面说:“如遇初犯,把他送官。”其中所说对久犯的处分在今天看来不合法规,可以不论。二、“合乡宜息讼也。”三、“国课宜有定额也。”第四条说:

自古即今,我地方盐课,忽上忽下,无一定数。嗣后,每年准于五十文盐课。无论何人经理,不许增加;即民众也不得横交,甚有免粮之事,倘后来当约头之人与公门中人弊害民下,遵上宪章程,众等把他揭告。否则拆他房屋,决不容情。以上各规勒之石碑,传与后代,倘有违者,定罚不贷。

这当中确实体现了一种民主精神,而且直接针

对地方上一些与官府有关系的保甲长之类,具有革新的思想。这是甘肃历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事。

还有一块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的碑是西和县立于民国八年(1919)的《禁烟记事碑》,写县令刘朝英亲赴仇池山与据险种大烟贩大烟以害民者斗争之事,行文生动。碑文中提出其治理方针:“除烟禁秽,惩治首恶,余皆宽宥。并拟于此兴学校,设警察,以庸愚昧。”今日烟徒不及一百来年前多,在内地种烟者已无,然而毒品之含毒量较前大为增加,戒烟难度增大,制毒者更为隐蔽,而且往往与黑社会相勾结,给公安人员造成极大的查办难度,危险也照样存在。在这方面应继承前代贤达的精神,教育子女,严禁毒品是重要的。

我以为这一部分的内容同当时老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与生活准则最为贴近,而在今日对在基层工作的同志来说也有可以思考借鉴的地方。还有些问题在有关名宦乡贤的部分也涉及到,可以参看。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研究

陈尚敏

内容摘要:清代科举家族是指那些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其中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的出现是多重因素共致的结果,诸如政局的稳定、教育机构的创建、科举政策的调适以及科举家族内部的教育环境等。科举家族往往是地方社会的望族,在地方社会的公共领域,都活跃着它们的身影。

关键词:清代 河西地区 科举家族

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基本单位。家族成员出于同一个男性祖先,在同一地域中生息劳作,世代相聚在一起,按照一定的规范和习俗生活。清代“科举家族”的概念最早由张杰先生提出,它是指那些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其中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他认为科举家族有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世代聚族而居,凭借家族组织支持族人应试,是界定科举家族的第一个条件;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而且世代应举,是界定科举家族的第二个条件,并构成科举家族和其他家族的根本区别;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的家族,是界定科举家族的第三个条件。将科举家族的最低功名界定为贡生,原因在于,清代官员铨选,除了进士、举人外,贡生也有资格进入仕途,这样拥有进士、举人、贡生功名的家族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即由功名获取权利,由权利获取金钱,再由金钱支持族人读书应试而获取功名^①。

本文以张杰先生对“科举家族”概念的界定为准,对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情况予以考述,并对其出现的原因作一分析。因本文所使用的资料除了常见的地方志、文集等之外,还有一种并不为大家所熟知的科举文献——硃卷,故此有必要对其作简要介

绍。

一、硃卷说明

清代乡、会试后,为了防止考官因认识考生字迹而作弊,遂将举子用墨笔做答的试卷弥封,交誊录生用硃笔重新抄写,然后再交考官评阅。应该说,誊录生用硃笔誊写的卷子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硃卷”。这里所说的“硃卷”,是指新科举人、进士刊刻的自己当科试卷,用来分送亲友及地方官,旨在扩大自身的知名度。虽系墨印,亦以“硃卷”称之。商衍縻说:“新科举人进士自刊其闈艺分送亲友者,谓之乡试会试硃卷。因闈中誊录用硃,卷为主考所阅取中,是即闈卷之意,虽以硃卷称之,实为墨印而非硃耳。”^②

随着举人、进士自刊其闈艺的盛行,拔贡、优贡和副贡也参与其中,因而就有了选贡硃卷。在清代科举人才结构中,除举人、进士外,还有一个重要群体——五贡。五贡包括拔贡、优贡、副贡、恩贡和岁贡,其地位高于生员而低于举人。拔贡,清初每六年选拔地方儒学中优秀生员入国子监肄业。自乾隆七年(1742年)始,改为十二年一次,每逢酉年举行。考试时间在科考之后,学政随棚录取。优贡亦从地方儒学生员中选拔,各省学政三年任满,根据府、州、县学官上报,会同总督、巡抚选取文行俱优者,最后由学政考定保送。各省乡试因名额限制,一些文理优

长的考生不能在正榜中录取,而是以副榜出之,是为副贡,即乡试副榜。上述三类贡生其名额按大、中、小省分配,数量很少。在地方儒学中,廪生食饩十年后挨次升贡,叫岁贡。府学每年一贡,州学三年二贡,县学两年一贡。如遇国家庆典,可依资历在廪生中再行升贡者为恩贡,亦即朝廷恩赏的贡生。上述可见,五贡当中,岁贡和恩贡是论资历而非考选,因此这两类贡生就不会有硃卷刊刻。

硃卷依次由履历、科份页和考生的文章三部分组成。科份页包括考生本科科份、中式名次、考官姓氏官阶以及该房原荐批语;考生的文章包括考题和答卷,文章多刊刻首场三篇《四书》文和一首五言八韵诗。本文所用即是硃卷履历部分,潘光旦就说:“硃卷必具履历;履历的一大部分是先世本支和旁支的一个题名,等于一本简略的家谱。”^①履历包括考生本人履历、家族谱系和师承关系。考生履历记录考生姓名、字号、行第、生年、籍贯、户籍、住址、功名等。家族谱系包括考生的亲属源流,分上下两格,上格登直系始祖及高、曾、祖、父以上祖妣至本人父母;下格登同族尊长直到本人兄弟子侄、孙、侄孙及妻子姓氏与子女,凡有功名、官阶、封典、著述者,均在其名下附载。母系及妻子的父祖兄弟若有功名为官者,也附注于其姓氏之下。师承关系指考生的学业源流,一般分受业师和受知师两种。“亲受指示讲读者为受业师,入学及中举、中进士、复试、殿试、朝考阅卷者为受知师。”^②

据笔者统计,今甘肃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公藏机构收藏的有关甘肃士人刊刻的硃卷共124份。其中会试硃卷30份;乡试硃卷87份;选贡硃卷7份。在这些硃卷中,河西地区士人刊印的硃卷占有相当的比例,这对了解河西地区的科举家族有很大帮助。

二、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考

从硃卷所载家族谱系来看,详于本支,旁支一般限在五服亲族,当然亦有例外。五服之说源于先秦

的丧服制度,古人认为同姓亲族,以自己为本位,上推至四世高祖,下推至四世玄孙,皆为五代;旁及亲,则横推至三从兄弟,即以族兄弟、堂兄弟、兄弟,同为高祖四世之孙,亦为五代。为避文繁,本文涉及旁支时限定在五服亲族。

1. 永昌南氏家族

永昌南氏家族的科第状况存于南棠、南有兰父子二人的乡试硃卷。南棠为嘉庆三年(1798年)戊午科举人、南有兰为道光八年(1828年)戊子科举人。南有兰的乡试硃卷记录更为详尽,故据此考释其家族源流状况。

南氏始祖贵均为直隶香河县人,明洪武年间充伍为试百户,赠武德将军,晋赠明威将军;三世祖才,承袭前职,正统七年,改调永昌卫,任指挥僉事,实始迁永。四世祖至七世祖皆“承袭前职”,自八世祖朝楷,始有文名。

太高祖:煌,康熙末太学生,敕赠文林郎,陕西凤翔府教授。

高祖:之玺,雍正朝太学生,敕赠文林郎,湖南安福县知县。

曾祖:宫鼎,乾隆庚午经元、辛未进士,任凤翔府教授,敕赠文林郎,湖南安福县知县。宣统《甘肃新通志》卷69《人物志·群材四》载:南宫鼎,字德宇,永昌人。明世袭指挥魁四世孙。读书有异慧,举乡试第四,遂登乾隆辛未进士,教授岐阳,勤于训课,士咸尊之。性耿介,与郾令某为同年友,极善某生者,郾富室也。与人讼弗直,持三百金,至乞一言,宫鼎遽怒,挥其金于门外,叱使去。生平行事类如此。

祖:济汉,乾隆己亥举人、庚子进士,任湖南安福县知县,加四级,历署慈利县知县、直隶泮州知州。壬子科湖南同考试官。著有《永昌县志》《南氏族谱》《依山堂时文杂著稿》。民国《续修永昌县志》卷6《人物》载:南济汉,乾隆庚子进士,历任湖南安福、慈利知县、直隶泮州知州。致仕归里后,主讲云川书院,诲人不倦,造就后进良多;兴起文社;秉笔纂修县

志,文体简洁;重建魁星楼,亦汉之力。

父:棠,嘉庆戊午举人,陕西榆林府葭州学正。

五服亲族:

高伯叔祖有六,其中之经,廩生;之俊,太学生。

胞叔祖:济楫,乾隆己酉副榜。

族伯叔祖有三,其中国栋,太学生;国枏,拔贡,山东临朐县知县。

亲堂伯叔、从堂伯叔、从堂兄弟、嫡堂兄弟、再堂兄弟众多,间有功名,大多业儒。

2. 镇番(治今民勤)卢氏家族

镇番卢氏家族的科第情况系见于卢宝伦乡试硃卷。卢宝伦,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己酉科举人,其乡试硃卷记录了卢氏家族的功名情况。

高祖:讳生华,字文锦,号丽滨,康熙戊寅拔贡、庚子举人。诰赠文林郎,长阳县知县。

曾祖:讳燮,字杲如,号墨峰,乾隆辛酉科举人,历任湖北宜昌府长阳县知县。诰授文林郎。

祖:讳涵甲,字能容,太学生。例赠文林郎。

父:讳进润,字双南,号浑斋,嘉庆辛酉举人,拣选知县。例赠文林郎。

胞叔高祖:生莲,字文洁,号园西,康熙甲午举人、雍正癸丑科进士,原任山西弋阳县知县;生薰,字文馥,号月湄,康熙甲午副元、雍正癸卯举人、联捷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敕授文林郎;生莛,字文历,号豹岩,雍正癸卯举人。

自堂伯叔高祖以降,至亲堂兄弟,人数近60人,除少数尚在业儒外,拥有功名者不下20人。

镇番卢氏家族在康雍时期科第达到巅峰,同时期的岷州(治今岷县)进士巩建丰就说:“近科如河西卢生薰昆弟诸墨,按之沉实,扬之高华。笔力才藻,在南人亦不可多得。”^①道光《镇番县志》卷9《人物列传上》有卢氏家族部分族人较为详尽的记录。

卢全昌,字熙,明骠骑将军矿裔,幼聪颖,工属文,而酷嗜学。平生以传经课子为切务,虽诸子文望日隆,全昌益鞭策不少懈。后以子生薰贵,赠文林

郎、翰林院庶吉士。生华,举人;生莲、生薰,进士;生莛,举人。

卢生华,字文锦,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拔贡,五十一年(1712年)举于乡,工时艺。适川陕总督某观风全秦,生华同弟生莲、生薰、生莛俱列高等,倾动河西。总督特加奖赏,会题开大学。生华平生善启后学,诸弟联翩科甲,子侄接踵入泮,皆其陶甄。郡邑之士闻风而至者,咸执经请益,以故多所造就焉。按:“会题开大学”是指镇番县学额由小学升为大学。清代,以各地文风盛衰状况为依据,为当地儒学规定一个较为固定的学额,三年一个轮回,进行岁、科二考以取录生员。据民国《续修镇番县志》卷11《补录拾遗杂记》“卢生薰”条载:“镇番学额向隶小学,岁、科各八名。雍正二年川陕制府观风全秦,卢氏生华兄弟俱列高等,主司叹赏文声彪赫,遂复奏开大学。”《清会典事例》卷377《学校·甘肃学额》亦载:“雍正二年,镇番卫向系小学,今人文最盛,改为大学,取十五名。”也就是说,总督因为卢氏兄弟才华出众,认为镇番文风兴盛,其县学学额过少,限制了当地士人的登进,需要扩大学额。总督的题请最后得到清廷的议准。

卢生莲,字文洁,天性纯笃,博学工文。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破额中式,士咸钦仰之。雍正十一年(1733年)成进士,后官江西弋阳县知县,与兄生华同辑县志。

卢生薰,字文馥,生而颖异,八岁能文,康熙五十三年,兄生莲领乡荐,生薰以“聿”额见抑,中副榜。雍正元年,与地生莛同举于乡,同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性纯淡,每值史馆公集,呐呐善下,未尝以义气自豪,若尹望山、陈榕门、帅兰皋、张晚楼、王罕皆诸钜公,胥推重之。另据民国《续修镇番县志》卷11《补录拾遗杂记》,卢生薰于雍正二年(1724年)歿于京邸,当在翰林院研修期间。并称“国朝秦陇翰苑开先,自公始”,这点并不属实。

卢生莛,字文衡,品优学富,诸昆齐名,雍正元

年,与兄生薰同登乡榜,以家学教授生徒,士无远近,皆宗之如山斗,其籍所传以达者,犹不胜数。子:荣,恩贡生。

另据《甘肃人物辞典》载:“卢毓莱,字蓬洲,号文楼。清光绪丙子举人。因其八世祖芦生薰为雍正元年翰林,故他有‘小翰林’之称。因其才华出众,在当时河西地区很有影响。”^⑥

3. 镇番谢氏家族

镇番谢氏家族科第情况系见谢葆初、谢集成、谢集梧和谢炳殊卷。谢葆初,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甲寅恩科举人、谢集成为嘉庆三年(1798年)戊午科举人、谢集梧为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举人、谢炳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科副榜。谢炳殊卷详尽的记录了谢氏家族的源流谱系和功名状况,移录如下。

始祖:天眷,岁贡生,宁夏府训导。

二世祖:奇学,万历丙子由文生中式武举,任山西大同守备。

三世祖:魁,顺治庚子武举任湖北长沙千总。

四世祖:黄中,庠生。

本生高祖:宗孔,庠生,晋赠奉政大夫。

曾祖:鳌,字文山,号云峰,岁贡生,任平凉府儒学训导,诰封文林郎,晋封奉政大夫,行宜载入邑志孝友传。按:邑志系指道光五年修成的《镇番县志》,该志卷9《人物列传上·孝友》载:谢鳌曾主讲永昌云川书院数十载,士弭弭信从,执经问难者几于舍不能容,得其指授,类能擢魏科以去。时,同里则有若李宗泌,由举人官教谕,聂子烈由恩贡官教谕,本族则有若登科,由进士官知县。子:葆澍、葆初,孙:集成、集梧,皆先后膺乡荐以振家声。生平仗义疏财,为诸生时,同社戚友供给弗少吝。有称贷者悉焚券,不责尝,士林钦之。

祖:葆澍,字雨甘,号莲湖,乾隆辛卯举人,历任山东青州府临朐、益都、安邱县知县,卓异,升己酉恩科乡试同考官,敕授文林郎,敕赠儒林郎,行宜载入

邑志事功传。按:道光《镇番县志》卷9《人物列传上·事功》载:谢葆澍未仕之前,设帐授徒,成就甚多,排纷解难,见义勇为,镇番有苏山书院,旋兴旋废,偕同志谋诸邑宰,募金营息以资膏火。

父:集成,字振之,号柳西,嘉庆戊午顺天举人,历任陕西鄜州黄龙山州同、砖坪厅通判。民国《续修镇番县志》卷9《人物列传上·事功》载:谢集成,字振之,号柳西,嘉庆戊午举人,历任陕西鄜州黄龙山州同、砖坪厅通判。曾主讲本籍苏山书院,与诸生说经论文,勤勤恳恳,若父兄之诲子弟,文风于是丕变。时学宫倾圯,倡捐修葺,亲督工作,规制重新。又偕同人捐立文社,助乡、会试川资,复以盈余主修邑志,事咳文间,镇于是始有专志。

五服亲族:

胞伯、叔曾祖:鉉,庠生;铤,庠生。

堂伯、叔祖:葆瑛,庠生;葆兰,庠生;葆初,乾隆己酉科选拔,甲寅恩科举人;葆谦,庠生。

胞叔祖:葆训,增广生;葆春,庠生。

堂叔:集庆,岁贡生;集灏,廪膳生;集址、集祐、集美、集统,皆庠生。

胞叔:集梧,嘉庆丁卯举人,原任陕西西安府渭南儒学教谕。

从堂伯叔、从堂兄弟、嫡堂兄弟、再堂兄弟众多,间有功名,大多业儒。

4. 镇番张氏家族

镇番张氏家族的家族谱系见张尔周会试硃卷和张金寿乡试硃卷。张尔周为道光三十年(1850年)庚戌科进士,张金寿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科举人。张尔周、张金寿为祖孙关系。这里以张金寿乡试硃卷为准分述其家族的谱系及科举状况。

祖:尔周,字筱庄,号竹如,道光庚戌进士,四川即用知县,历署夹江、长寿等县事,题补人寿县知县,因井研解围出力,保奏以同知升用,居忧后改官陕西,历署西乡、紫阳、甘泉三县事,实授蒲城县知县,以营缮西乡城葺事,保荐升用直隶州知州,诰授奉政

大夫，例敕赠儒林郎。张尔周传另见《甘肃新通志》卷69《人物志·群才四》。

父：从诚，字朴卿，号南麓，附贡生，候选同知，诰授奉政大夫，例敕赠文林郎。

五服亲族：

胞伯、叔曾祖：尚达，岁贡生；尚儒，庠生。

胞叔祖：尔产，太学生。

胞叔：淦济，贡生。

嫡堂伯、叔从仁，癸酉优贡，乙亥举人；从贵，太学生。民国《续修镇番县志》卷9《人物列传上·孝义》载：张从仁，字元甫，清同治癸酉优贡，光绪乙亥举人，事继母数十年，始终承顺间言，待兄弟友爱笃挚，尤善赈贫济苦，后官中卫教谕，勤于训迪，孜孜不倦。子锡寿，举人，官新疆兴平县知事。

从堂兄弟、嫡堂兄弟、再堂兄弟众多，间有功名，大多业儒。

5. 镇番马氏家族

镇番的马氏家族，见于上揭张金寿乡试硃卷，马氏为其母氏家族。“母氏马，嘉庆戊辰举人起凤公侄孙女；泾州镇原县教谕勳义公从堂侄女；同治壬戌进士、湖北即用知县明义公族侄女；庠生修义公、监生陈义公、博义公侄女。”马氏家族部分族人见于民国《续修镇番县志》卷9《人物列传上·事功》。

马起凤，字栖梧，嘉庆丁卯举人，勤学好义，凡遇整理孔庙，振兴学校诸大端，慨以巨资倡，毫无吝容，平居敬老恤贫，崇儒重道。朴茂之行，一时学士尤莫能及者。道光五年续修县志，汇集采访，不遗余力。后官陕西岐山教谕，振拔寒畯无异桑梓，岐山文教大兴，金以马公为导线云。

马勳义，字荇臣，举人起凤子。幼聪颖，豁达好施，而奋志于学，由廩贡官隆德教谕。任满回籍，适值回变，倡捐万金助饷，筑城并设局防守，勤劳卓著，地方赖之，尤热心学校，鼎力栽培，口碑啧啧，至今犹载道焉。

马明义，字境台，同治壬戌进士。官湖北知县，

署枝江县，时旱蝗交集，哀鸿遍野，明义用意抚绥，民赖以安，喜接见士民，于胥役则严加约束，不肯稍假，有铁面冰心之颂，去任时，父老攀辕而送者数百人。马明义传另见《甘肃新通志》卷69《人物志·群才四》。

6. 武威孙氏家族

武威翰林李于楷说：“吾乡衣冠闾閻之盛，首推城河沿孙氏。自元朴先生以淳德至行，崇祀乡贤；凤书方伯、仲山大令，仍世登进士第。勋绩行义文章，坊表乡里者百年”，“孙氏自方伯以降，甲乙科前后相望”，“经乙丑之乱，第宅废为瓦砾，子姓虽繁，无读书者。仁义之不修，诗礼之日捐，世远泽竭”^①。引言所及的元朴先生、凤书方伯和仲山大令，即孙文炳，孙诏和孙辅。潘挹奎《武威耆旧传》有孙氏家族成员更为详尽的传列，据此分述如下。

孙文炳，字元朴，武威人，庠生，恂谨持礼法，嗜读书，教授邑中子弟^②。

孙诏为孙文炳子，字凤书，号友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壬辰科进士，并获馆选，为清代武威第一个进士中式者，历官至湖北布政使。其子孙璘为举人^③。明清“布政使”向有表率一省府州县官之义，故尊称为“方伯”。

孙辅，字仲山，乾隆十六年（1751年）辛未科进士，曾官广东翁源知县，其子揆叙、揆泰、揆亮、揆章皆名诸生^④。

孙诏、孙辅为祖孙进士。

孙氏家族在乙丑之年经历变故，家道遂衰落。“乙丑之年”为嘉庆十年（1805年），“乙丑之乱”系指青海“番族反叛”事件，嘉庆十二年（1807年），清廷曾委派那彦成前去征讨。

7. 武威尹氏家族

武威尹氏家族的科第情况系见于尹世清其乡试硃卷。尹世清，道光五年（1825年）乙酉科举人，其乡试硃卷记录了尹氏家族的功名情况，移录如下。

曾祖：讳诰，康熙辛卯举人，原任四川渠县知县。

祖：讳思任，乾隆丁卯拔贡。赠中宪大夫。

父：讳绾，廩膳生，诰封中宪大夫。

胞兄：世阿，乾隆乙卯举人，嘉庆戊辰大挑一等，分发江西，借补藩库厅。历署广昌、宜黄县事，致仕回籍；世衡，嘉庆庚午举人，辛未进士，现任江苏分部考功司掌印郎中，翰林院庶吉士。过继胞伯。

侄辈俱业儒。

另据潘挹奎《武威耆旧传》卷1《尹氏三传》称：“武威有君子曰：‘尹铁堂先生善于为吏，其嗣思任善于为子，其孙绾善于为师。’”铁堂先生名诰，字紫来，号铁堂。康熙辛卯举人，官四川渠县知县。思任，拔贡生，从父之官渠县。绾，诸生，教授乡里。子三人：世阿，乾隆乙卯举人，官江西库大使；世衡，嘉庆辛未进士，官吏部考功郎中；世清，官蒲城训导，今年乙酉中式举人。

8. 张掖曹氏族家族

民国《新修张掖县志·选举志·文学》“曹毓瑞”条。曹毓瑞，博学能文，嗜古不倦，乾隆丁卯发贤书，由陕西高陵县教谕升巩昌府教授，为一时师表，执经闻业者幸多显。侄：德元，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戊戌科进士；子：德恒，举人；孙：柏龄，十五入泮。足证家学渊源。德元通籍后，不乐仕进，主南华书院讲席近二十年，文雄健，人多颂之。

三、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养成

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多重因素共致的结果。从河西进士的时间分布看，康熙中后期为萌芽之始，镇番孙克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庚辰科进士。“为国朝河西甲第之首”^①。孙诏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壬辰科进士，为清代武威第一个进士中式者。雍正朝时间短暂，只进行过五科会试，镇番就产生4位进士，其中卢生莲、卢生薰为兄弟进士。清代甘肃进士的地理分布，皋兰独占鳌头，因其为省会兰州府郭，乃全省首善之区，自然拥有着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优越条件。次则武威，李于锴就说，武威“自乾嘉以降，彬彬多文学士矣”^②。嘉庆十三年（1808年）戊辰科乡试，姚元之典试陕西，他

认为：“甘省文风，初为宁夏最盛，今则莫盛于凉州之武威。”^③

河西地区科第兴盛，首先在于政局的稳定。明代河西为边疆地区，明沿长城一线设置九边以抵御蒙古骑兵南下，河西当属甘肃镇，行政建制上实行带有军事性质的卫所制。顺治、康熙两朝，基于蒙古和西藏问题的解决，甘肃南北两翼民族冲突得以缓和，军事性质的卫所建置已无存在的现实基础，雍正三年（1725年），卫所应时改制，与腹地行政建置划一。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准噶尔部叛乱被平定，新疆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甘肃的边疆地位。加之自康熙朝始，清廷在西北实行了一系列防范与扶助相结合的民族政策，使甘肃迎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政局稳定。“盖自乾隆以来，重熙累洽，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④陇右“乾嘉数十年较太平”^⑤。永昌南氏、镇番卢氏两家族皆由军功起家，入清后文名鹊起。两个家族的转型是与清代西北边疆态势的变化分不开的。因此，政局的稳定是河西地区出现科第兴盛局面的现实背景。

清代九位皇帝大都有自己的科举政策。康熙、乾隆是有清一代进士平均取额最少的两朝，窥其原委有二：其一顺治、雍正两朝进士取额较高，其二康熙、乾隆向称盛世，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两个因素对仕途造成挤压。进士取额自然要考虑体制的承受能力。在进士取额收紧的背景下，武威的孙氏家族、永昌的南氏家族成员获取进士功名尤应注意。

其次，教育机构的创建。张澍曾说：“我朝文教覃覆，玉关以西，黉序莘莘，凉州甲科鳞次不断，人文蒸上。”^⑥“玉关以西”自然是指新疆地区，满清王朝自恢复对新疆的统治之后，在北疆地区实施府县制，同时建学校、设学额，重视这一地区的文教。张澍所言自然是在歌颂盛世王朝对文教的重视，就是向称荒蛮之地的新疆尚且如此，那么靠近腹地的河西就毋庸辞费了。

清代地方教育场所主要包括府州县官学、书院

和蒙养教育机构。清代读书人七、八岁始入蒙学,约需五、六年时间,识字两千左右,然后就开始学写八股文,准备应童试。童试为最初级的科举考试,其中式叫进学,也就是进入到地方官学,获得的功名叫生员,俗称“秀才”。“官学制度中一般不包括蒙养教学,此项教育任务多由民间私学承担。”^①传统蒙养教育机构名目繁多,但统称私塾,由民间承办。生员意味着完成了蒙养阶段的教育,在名义上是地方官学的学生,但因科举的导向作用,地方官学重考试而轻教学,后来基本演化成地方科举考试的中心,其育才功能式微。民国教育史家陈青之就直言:“学校教育之在清朝可说完全是一个具文。”^②缘此,清代“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③。书院在清代士人的教育养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疆收复,意味着西北边防大大向西推进,这对甘肃来讲,安全压力减轻。作为地方官施政,文治也会很自然地提上其议事日程。肃州(治今酒泉)酒泉书院,乾隆间知州黄文炜创建,其记曰:“今天人和同,西戎款服,一时敌忾同仇之辈,皆相与安土绩业。余用是慨然曰:‘是真可以洗兵戎之气,而谋弦诵之乐矣’”^④;甘州府甘泉书院,在府郭张掖县城南,乾隆间知府冯祖悦创建,其碑记曰:“甘镇地处极边,代为用武地。我皇上德化覃敷,四夷宾服,自嘉峪关外拓新疆二万余里,皆得偃武修文。”^⑤云川书院在永昌城西,清乾隆间知县郭昌泰建,黄时《创建云川书院记》:“永地处边陲,近百余年来,登科第者仅三人,士气抑塞,风教颇未光,其需书院最急。”^⑥有清一代,河西地区共建书院24所,遍及每个府州县。

乾隆朝武威的刘作垣和王化南,二人先后主讲本籍书院,奠定了该地区的教育基础,武威“自乾嘉以降,彬彬多文学士矣”^⑦。刘作垣,字星五,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科进士。性耿介,不合于上官,辞职归里后,被延聘为书院山长。“山长教尚严,从之学者,作止语默,罔不绳以礼法,偶逾其闲,诃责立至”,“一时从学之士,文章皆有程式可观”,“以实心

启迪后生,吾乡所以文教日上,不乏绩学之士者,由山长诱掖之力实多”^⑧。王化南,字荫棠,乾隆四十年(1775年)乙未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知县,后辞官归里,当道“延主书院讲席,教法即淳且备”,“矻矻孜孜,俾不得斯须嬉,士风为之一变”^⑨。刘开第,字梦惺,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科进士,曾官陕西知县。既归,主讲雍凉书院,成就后进不少^⑩。李铭汉,同治副榜,“盖晚清西北一醇儒也”^⑪,也曾长期主讲本籍书院,培植人才甚众。武威“人文之盛,向为河西之冠”^⑫。当是渊源有自。

镇番的谢氏家族、永昌的南氏家族成员中,多人曾任当地书院的山长,势必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发展,两地进士中式人数较多,与此密不可分。

再次,科举政策的调适。清代科举制度设计非常重视区域平衡原则,像乡、会试,实行分省取士政策,其实是将这两级的科举竞争限定在省区范围,自然保护了文教落后地区考生的利益。除此之外,为了保证边隅士子中式,清代科举在乡试一级有另编字号政策。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将凉州、西宁五学编为聿左号,甘州、肃州五学编成聿右号,各中一名;乾隆七年(1742年)对入场卷数的统计,聿右仅是聿左的三分之一,此后一科同编聿字凭文取中,一科分编左、右各中一名;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凉州归通省卷内,甘州、西宁编聿左,肃州、安西、乌鲁木齐等处编聿右,各取中一名。这一政策在光绪元年(1875)陕甘分闹后废止^⑬。

最后,科举家族的内部教育。科举家族中,幼承庭训、兄弟切磋,其教育环境有助于其子弟学业增进是显然的。如南有兰,字泮生,进士济汉孙,举人棠子,道光戊子登贤书,树品端洁。承受家学,博览群书^⑭。镇番卢氏家族,卢生华四兄弟,其中二人举人、一人进士、一人翰林。卢生华为长兄,“平生善启后学,诸弟联翩科甲,子侄接踵入泮,皆其陶甄。”

传统婚姻并不反映当事人的意愿,而是表达家族利益,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门当户对是其基本

模式。因此,科第家族之间的联姻在士人养成中也会产生一定影响,诸如提供经济支持、学业指导以及激励他们的向学热情等,婚姻缔结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人社会交往面的扩大。清代镇番的谢氏家族、卢氏家族,永昌的南氏家族,在硃卷中就能见到这三个家族之间的通婚情况。谢树森,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丙午科举人,其硃卷载:“母氏卢,康熙庚子科举人生华公曾孙女;雍正癸丑科进士、江西弋阳县知县生莲公,雍正癸卯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生薰公、雍正癸卯科举人生英公侄曾孙女;乾隆辛酉科举人、湖北长阳县知县隄公孙女;例赠文林郎、太学生涵申公次女;嘉庆辛酉科举人金润公胞妹;优廩生宝伦公胞姑。”谢炳的乡试硃卷记录了谢氏和南氏两个家族的婚姻关系。“妻原配南氏,乾隆辛未进士,原任陕西凤翔府教授宫鼎公曾孙女;乾隆庚子进士,原任湖南府衡山县知县汉公三孙女;庠生乐公长女;嘉庆戊午举人,原任陕西葭州学正棠公胞侄女;道光戊子举人有兰公堂妹;庠生有山公胞姊;廩膳生有光公堂妹。”永昌的南有兰为道光八年(1828)戊子科举人,其乡试硃卷记录了南氏家族和谢氏两个家族婚姻关系。“母氏谢,乾隆辛卯举人,山东安邱县知县,讳葆霖公孙女;嘉庆戊午科举人,陕西鄜州黄龙山州同,现署砖坪厅通判,名集成公女;丁卯科举人,名集梧公胞侄女。”

四、余论

本文在对科举家族进行考述时,涉及到这些家族在地方社会的事功情况,表现在诸如教化、捍患、赈济、修志等方面。它们之所以活跃于地方社会,实与其在科举上的成功密不可分。中国传统政治权力,囿于制度设计及其运行成本的缘故,国家政权很少落实到县以下的乡村社会,乡里社会实是一个自治色彩很浓的有机体,为此,有学者将此表述为“小政府、大社会”。自汉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聚落中的主导力量是父老阶层,他们的身份和权威系基于社会敬老的传统”,“王道的根本在于孝悌,举凡同里

邑之年轻人都视同子或弟,于是有孝悌,于是有敬老,这是古代聚落一体感和认同意识促成的”。但是,伴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完善,父老阶层在乡里社会的权力空间不断受到来自士绅群体的挤压,并逐渐被取代,科举最终成为建构地方社会望族的基本途径。基于此,对科举家族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传统地方政治的认识,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内在联系。

注释

①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第31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②商衍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87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

③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第142页,上海书店1991年版。

④商衍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87页。

⑤巩建丰:《朱圉山人集》卷3《答胡静菴贡生书》,乾隆刊本。

⑥罗康泰:《甘肃人物辞典》,第155页,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⑦《孙揆章》,李鼎文校点:《李于锴遗稿辑存》,第22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⑧潘挹奎:《武威耆旧传》卷1《孙文学文炳周明经子兰王孝廉曰慎合传》,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99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

⑨潘挹奎:《武威耆旧传》卷1《孙方伯传》。

⑩潘挹奎:《武威耆旧传》卷3《孙韦西先生传》。

⑪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卷65《人物志,乡贤下》。

⑫《潘挹奎传》,李鼎文校点:《李于锴遗稿辑存》,第18页。

⑬姚元之:《竹叶亭杂记》,第4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⑭白寿彝:《回民起义(三)》,第2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⑬《陇右经学传授》，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第413页，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

⑭张澍：《养素堂文集》卷4《五凉旧闻序》，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67册。

⑮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第55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⑯陈青之：《中国教育史》，第375页，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⑰赵尔巽：《清史稿》，第3119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⑱黄文炜：《酒泉书院记》，宣统《甘肃新通志》卷35《学校志·书院》。

⑲冯祖悦：《甘泉书院碑记》，宣统《甘肃新通志》卷35《学校志·书院》。

⑳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卷35《学校志·书院》。

㉑《潘挹奎传》，见李鼎文校点：《李于锴遗稿辑存》。

㉒潘挹奎：《武威耆旧传》卷3《刘山长传》。

㉓潘挹奎：《武威耆旧传》卷2《王荫棠传》。

㉔宣统《甘肃新通志》卷69《人物志·群才四》。

㉕汪辟疆：《李云章父子学术》，李鼎文校点：《李于锴遗稿辑存·附录》。

㉖民国《甘肃省乡土志稿》第22章《重要都市》。

㉗参见商衍鏊：《清代考试述录》，第78-79页。

㉘民国《续修永昌县志》卷6《人物》。

（作者：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教授）

陇南市地方志办公室督查

全市史志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2017年8月28日至9月2日，陇南市地方志办公室组成两个督查组，对全市九县区史志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督查。

此次督查旨在深入贯彻《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和《陇南市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督查组以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等方式，在系统调查了解各县区二轮县志编纂、综合年鉴编辑出版、史志信息化建设以及“一纳入、八到位”贯彻落实情况的同时，全方位、多角度地查摆突出问题，并就存在的问题作了现场指导。

督查组指出，全市史志工作整体向好，后效可期，但个别县区的工作进度与中指组和省地方志办公室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仍须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政府和分管领导应高度重视，确保2020年全面实现“两全”目标。督查组强调，各县区要以此次督查为契机，查找问题，直面困难，树立“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和危机感，秉持群策群力、合力攻坚的优良传统，以饱满的热情、扎实的作风，全力以赴做好各项重点工作。

（甘肃省陇南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巩昌府新志》撰著者杨恩 的史才与史识

王长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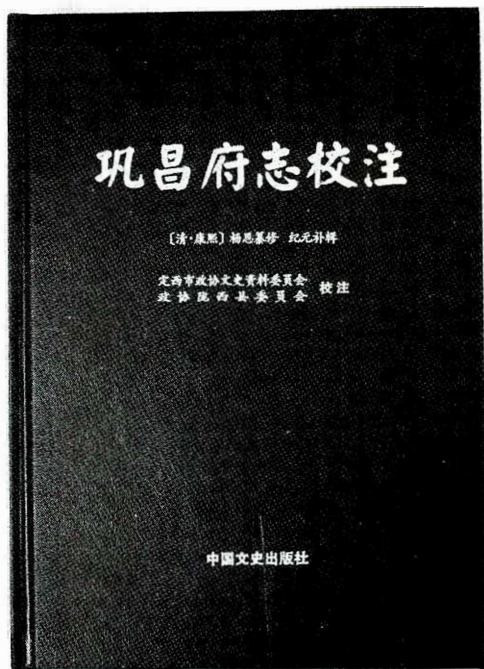
明清之际的巩昌府，隶属于陕西行中书省或陕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司，“绵亘南北千余里，东西称是，固宇内半壁疆土，关以西一重镇也。”（明天启年间巩昌知府刘文琦《重修巩郡志引》）

历史上的巩昌府辖地广袤，多民族杂处，风物迥异，历史厚重，人文昌盛。

陕右全书 一代良史

“巩昌”一名本自“巩州”。从宋徽宗崇宁三年（1053年）升巩州，是为以“巩”为名之始，寄托了期冀边陲巩固之意愿。金哀宗正大六年（1104年），改巩州为巩昌府，并置陕西西路巩昌总帅府。元初，先于巩昌置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府，旋又设巩昌路府。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后为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巩昌府属之。清初因明制。圣祖康熙三年（1664年）始，陕甘分治，分陕西为左右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司驻巩昌，六年改称巩昌布政使司，巩昌成为省会。康熙七年（1668年），复改称甘肃布政使司，移治兰州，巩昌府属焉。民国二年（1913年）裁府，“巩昌”一名为陇西县所代替，现陇西县附廓首镇即名“巩昌”。巩昌一名本自巩州，算来不间断使用了910年。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巩昌府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宋设巩州起，州、府驻地再未更移，元初巩昌府路辖区最大，初有5府27州，后统4府15州，辖境相当于甘肃黄河以东即今



兰州、白银、定西、天水、平凉、庆阳及陇南大部和陕西、四川各一部分。同时，元王朝在巩昌还设有“陇右诸州提刑按察使司”、“巩昌等处行工部”、“巩昌肃政廉访使司”、“巩昌宣慰使司”、“巩昌团练安抚劝农使司”，足见其作为陇右军政中心的地位。明时，陇右地区设4府，巩昌府最大，管秦、徽、阶三州、14县以及岷州卫、洮州卫、靖远卫、西固所，辖区相当于今天水、定西、陇南、白银和甘南的大部。清朝因之。

据考,巩昌府修志始于明。迨至民国,官修私撰,见于记载当有8次之多。其中明修5部,清修3部,可惜大部分或佚或残:《巩昌府旧志》(1卷本,明《文渊阁书目》著录);《巩昌府并属县志》(1卷,明《文渊阁书目》存目);《巩郡志》(2卷,明成化间周信撰),以上均佚无存。《巩郡记》(20卷),明嘉靖胡纘宗撰,残存6卷;《巩昌府新志》(28卷),明天启杨恩撰,已佚,仅存序;《巩昌府志》(28卷),清康熙中修撰《大清一统志》,遍搜巩昌旧志遗稿而不得,重金购于市,只得万历进士、邑人杨恩《巩昌府新志》残本10卷。知府纪元细心核阅,补阙纠讹,删冗除繁,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冬补撰而成《巩昌府志》28卷,存刻本、抄本。《巩昌府新志稿》,清光绪二十一年(1885年),由巩昌知府颜士璋聘请原泆(仲恩)续府志而成稿,后佚无存(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会长张克复《〈巩昌府志校注〉序》)。

由此便知,由清康熙年间的知府纪元补撰而成的《巩昌府志》,为巩昌府旧志中仅存的一部,对于了解元、明及清初定西、天水、陇南、甘南、白银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提供了比较真实、客观的史料。

而纪元补撰而成的《巩昌府志》,本自明天启年间杨恩所修的《巩昌府新志》残本10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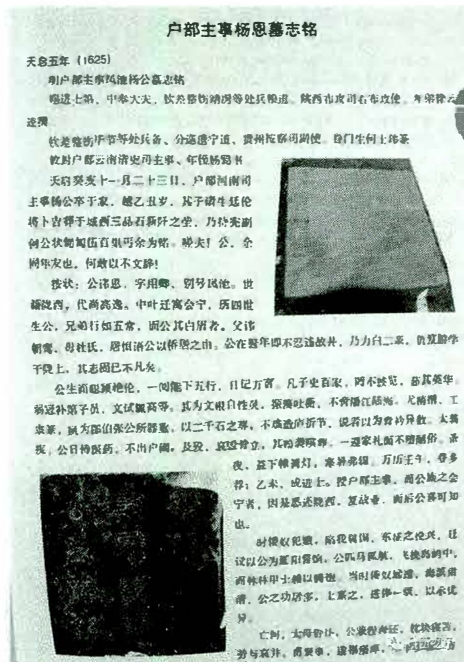
追根溯源,杨恩在撰修和保存巩昌府志的历史上,实在是功不可没。

明天启年间,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前工部营缮司员外郎、西蜀充国人巩昌知府刘文琦在《重修巩郡志引》中称赞道:“世宙沿革之故,载籍得失之林,犁然备具,洒洒乎陕右全书,一代良史哉。”

督饷辽阳 监督通仓

杨恩,字用卿,别号凤池,世籍陇西。

关于杨恩的生平,在《明户部主事凤池杨公墓志铭》中,记载得颇为详尽。该墓志方形,青石质地,现存一盒。志盖边长74厘米,厚12厘米;志底边长75厘米,厚13厘米,四周饰缠枝荷花。额题“明户部主事凤池杨公墓志铭”(篆书),志底首题与此相同。内容记载了陇西进士杨恩的先祖世系及历官详



情、诗文著述、子女婚嫁等情况,共29行,行40至42字不等。志石制于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保存完好,现存陇西仁寿山游廊,陇西县博物馆藏有拓本。

《墓志铭》由赐进士第、中奉大夫、钦差整饬靖虏等处兵粮道、陕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徐云逵所撰,从中可以大略窥见杨恩一生的基本事迹。

杨氏家族世居陇西,中途迁居于会宁,历经四代人之后生下杨恩。杨恩在兄弟辈中属于佼佼者。杨恩之父名杨朝鸾,母亲杜氏,日常生活中经常给他说起寄居异乡的原因,这在幼年的杨恩心灵里烙下了深深的印痕。他立下誓愿,并多次向双亲表白,今后一定要回到故乡!为此而更加勤奋地负笈求学,在少年时就已经志向不凡。

杨恩的天赋极高,生来就聪颖绝伦,读书时一目五行,每天能记下万言。大凡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无不披览,含英咀华。年方弱冠时,即成为县学生员。每次考试,其文章都被老师评为优等。杨恩的文章,发自性

灵，文采斐然，时人把他和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陆机和潘岳相提并论。杨恩的书法也功力精到，尤其精于楷书，还工于隶书和篆书。时任巩昌知府姓张，非常器重杨恩，不惜屈尊降贵，拜访杨恩。当时人都认为杨恩是读书人当中的超群拔俗者。

曾祖父临终时，杨恩每天都在身旁伺候，端汤煎药，不出家门。去世后，杨恩因为过度悲伤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在办理丧事的过程中，但凡殓袭殡葬，一遵家礼而不堕陋俗。

杨恩读书极为用功，不管早晚，都秉烛读书，即使是三伏天和三九天，也坚持如此。万历壬午年，被州县荐举；乙未年，考中进士，被授予户部主事。杨恩的族人中，寄居在会宁的，在这时全部回到陇西，这等于了却了杨恩多年来重返家乡的夙愿，他心中的欣喜，可想而知。

1592年（壬辰年），日本太阁（卸任关白）丰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鲜。朝鲜节节溃败，并向宗主国明朝求救。随即明朝派兵支援朝鲜。这场战争波及到了朝鲜全境，其间曾于1593年议和并休战；但于1597年（丁酉年）战事再度爆发。最后由于丰臣秀吉的病逝，日本军队于1598年全部从朝鲜撤退。日本占领朝鲜并以之为跳板进攻明朝的行动最终失败。

明朝廷答应了朝鲜的求救并决议派兵支援，委任杨恩为辽阳督饷。接到任命后，杨恩单枪匹马，孤帆渡海，迅速运送粮草至朝鲜半岛战场。前线将士由于得到了充足的粮草保障，士气大振。不久，日军退却，海疆重归安宁，杨恩在战争中因为后勤保障有力，得到了皇上的嘉勉，并进俸一级，以表彰他的卓越功绩。

不久，杨恩的祖母去世，他兼程回家奔丧，头枕着土块，睡在草席上，辛劳与哀痛交杂，摧残着他的身心。

丧事办完后，杨恩正准备回朝，为朝廷出力，不料却患上了痿痺症，肢体萎缩麻痹，不能动作，步履艰难。当此之时，杨恩对于弃官养病倒还想得开，但

遗憾的是父母双亲在他多年来的宦官生涯中，不仅没有沾上他的一点光，反而为他提心吊胆，操心费力。病情稍微有点好转后，他又官复原职，继续为朝廷效力。

不久，杨恩又接到朝廷任命，命令他监督通州仓。通州仓主要用来存储由大运河运来的漕粮，以供京师食粮之用，有“京仓（北京仓）为天子之内仓，通（通州）仓为天子之外仓”之说。通州仓位于南北咽喉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多年来，由于管理不善，贪贿横行，弊端丛生。杨恩上任后，每天坚持在现场办公，手持筹码亲自计算，弄清楚每一笔漕粮的出库与入库情况，掌握了盈余和耗损的实情，然后革除不合理的旧制，堵塞漏洞。自此，耗损之弊得到彻底清理，军队的储粮得到了保障。杨恩的廉明之声，誉满中外。

蔚然著作 云汉天章

正当杨恩在事业上蒸蒸日上，被朝廷信任而掌握大权，欲报效国家之时，他的旧病又发作了。他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悲伤地说：“我平生的志愿是在当世建功立业，但时运却和疾病碰到了一起，这是命运啊！我怎么能以疾病之身与各位青年才俊共事呢！我的决心定了！”于是，他再三向当朝皇上奏明，乞求回家养病。感念杨恩多年来为朝廷勤勉任事，且功勋卓著，皇上特此恩准他在官休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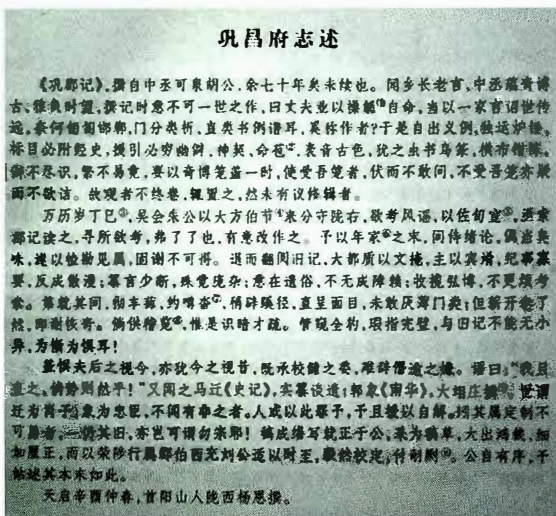
回到家乡陇西后，杨恩每天优游于渭水之滨，面对绿水碧山检阅图书和史籍，以怡性情。在此期间，他重新编修了《巩昌府新志》。

巩昌知府刘文琦在《重修巩郡志引》中称赞杨恩编修府志的功劳时认为：“公慨然而兼作，即旧志讹者证之，缺者补之，舛者削之，剩者删之，遗者增之，紊者詮次（指选择和编次）之，简者润色之。粗仍其皮肤，精厘其体格，大而山川，细而土毛，上之星辰，下之疆域、地理，墩堡修废，豪杰芳徽，良吏姓名，

以至公宇桥梁,灵境古刹,远溯古初,近及末季。”并盛赞《巩昌府新志》“洒洒乎陕右全书”,还称誉杨恩为“一代良史”!这是对杨恩编修府志的充分肯定。

刘文琦还赞誉杨恩的勋名列官署,其高风亮节经得起时人和后人的评论,并高度评价杨恩修志之事为“盛举”:

(杨公)“不朽大业在著述,最注心在郡志。志大



凡有十纪,迹纪事、纪名物、纪岁月,则千万言,夫言梗概耳。维是睹山河壮丽,思保障;抚圣贤遗迹,思计安;核军伍虚耗,思训练;念闾左萧条,思抚字(对百姓的安抚体恤)。俾今日之陇,依然春秋战国时富强之陇,则志耶、卦耶、鼎耶、蕨耶,兴天壤俱蔽可也。余叨守巩,于地方无尺寸效,值杨公修志盛举,用效忠告于后之守巩者。”

除此之外,杨恩还著有《渭滨集》《玄亭稿》,以及《农谈》《乐府》等著作,都是凿凿名言,足以传世的不朽之作。

携琴西归 杜门高卧

回到家乡之后,每逢佳节良辰,杨恩就和两三个意气相投的朋友,把酒赋诗,终日不倦,且把他们的这种雅会命名为“忘机”。这是效仿明代名士宋登春的天然机趣的做派[按:宋登春(约1515—1586),字

应元,号海翁、鹅池,明代诗人、画家,在世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真定府冀州新河县六户村(今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新河镇六户村)人。少年失父母,依靠兄嫂生活,聪慧好学,能诗善画,且“诗祖少陵,画宗吴伟”。30岁间,妻子儿女五人俱丧,宋鹅池须发皆白,自号海翁。此后带义子(侄子)宋鲸弃家远游。他以书画为资,行程5万余里,北出居庸,南涉扬子,西越关陕,东泊沧海,广泛结交诗画文人。晚年定居江陵天鹅池(今湖北省石首市天鹅洲经济开发区),更号鹅池,后投钱塘江而死!]

杨恩为人性格直爽坦诚,不设城府,即使是农夫孺子,也乐于和他交流。与人交谈时,倾肝吐胆,直剖是非,毫不保留。而且,杨恩还仗义疏财,恤贫济乏,尤其是对有姻亲关系的各个家族成员厚加抚恤。因此,时人都称赞他是大德之人。在家闲居休假十八年,足迹从没有到过官府衙门。自太守、县令以至监察官员,甚至朝廷使者,无不对他敬仰有加,亲自登门咨询时政。每有问询,杨恩都是以礼相待,言辞必称大义!其清风峻节如此!

杨恩生于明嘉靖丙午十二月十七日,卒天启癸亥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寿七十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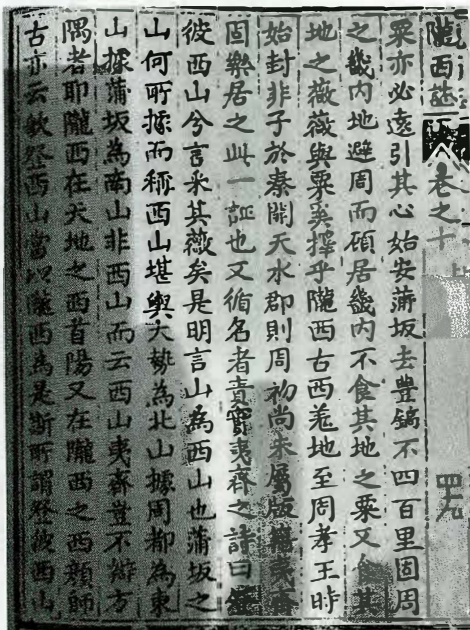
陕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徐云逵所撰的《明户部主事风池杨公墓志铭》在文末赞曰:

阳山苍苍,渭水洋洋;笃生哲人,玉质金相。厚积而发,暂试辄藏;隐见不测,螭屈龙翔。蔚然著作,云汉天章;为士林范,为邦家光。西凉臙臙,水绕山环;棲神于斯,百世其昌。可谓是对杨恩一生的总结。

首阳一辩 勘破千古

最能体现杨恩的史才和史识的,当属对于首阳山的考辨。

历史上,对于伯夷、叔齐的归隐地首阳山,来说法不一。



巩昌知府刘文琦认为，杨恩的著述廓清了这一段历史迷雾，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如果伯夷、叔齐两位贤人地下有灵，则应当称杨恩为“知己”：

其最著则首阳一辩，勘破千古，盖河东首山、陇西首阳山，位次甚明。读公辩缘古券今，五证斩斩，内原心一议最得，夷齐不食周粟，意二贤有灵，当称杨君知己（刘文琦《重修巩郡志引》）。

杨恩在《首阳山辩》一文中，先列举了历史典籍中关于“首阳山”的五处说法：

《说文》以为在辽西，刘延之以为在偃师，马融以为在蒲坂，《方輿胜览》以为在陇西；曹大家注《通幽赋》，亦云在陇西。《庄子》云：“北至岐山，西至首阳”，故索隐以为在岐山之西，囊中遂有五首阳。

在列出了关于“首阳”的五种说法后，杨恩亮出了他的观点，认为有五个证据，可以证明“首阳”应该以“陇西者为是”。

首先，“考古者准经”，即考古的首要证据，来自于历史典籍的记载，而河东的“首阳”在历史典籍中不见记载。杨恩指出，历史典籍中，比如“黄帝采首山之铜”的记载不见“首阳”二字；《禹贡》的记载也是“止名雷首，不名首阳”；《春秋传》也是“止名首山，不名首阳”。反之，《诗经·唐风》有云“首阳之巅”；而毛

氏《通考》则曰：“《采苓》乃《秦风》之首，误收《唐风》之末，篇次相连而错简耳。”亦以首阳在秦不在唐为断，此可据明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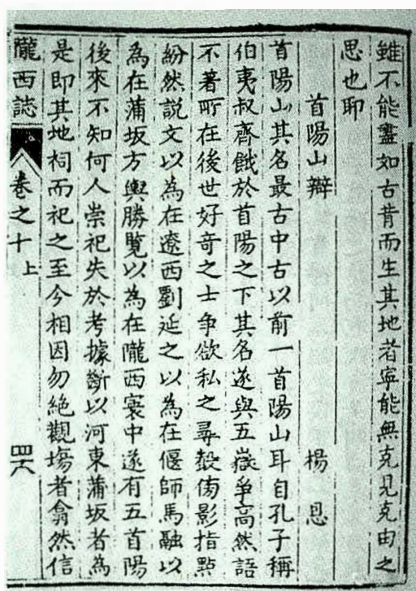
杨恩还批评了后世学者不核实证据，随意揣测的的浅陋学风：

安成刘氏注《唐风》，求首阳不得，以意度之，曰：即古之雷首。夫雷首可以为首阳耶？不核实以证误，而反曲解以就舛，此宋儒之陋，何可据也。

然后，杨恩又引用两种古籍的说法：《书》曰：“导渭自鸟鼠。”《传》曰：“渭水出陇西首阳县，县以山得名。”并反问道：“今鸟鼠与首阳并峙，昭昭若此。经书，孔子手删，计必不诬；《传》为汉儒所作，去古未远。今舍经传明书首阳不信，而猥以首山、雷首当之，奈何不信孔子而信刘氏耶？”

其次，“论世者原心”，即知人论世，必须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推测他的心理。伯夷、叔齐不是曾经躲避过殷纣王的暴政吗？他们二人不在殷商的国土上居住，而是远避在北海之滨，其意是在远远地离开。现在，他们二人以耻食周粟而离去，那么，在周朝的国土上，哪儿没有周粟？因此，他们也必须远远地离开，其心才会安宁。蒲坂距离周朝的国都丰镐不过四百里，还处于周王朝的地域。既然要躲避周王朝的统治者，却仍然居住在周王朝的地域内，不食周王朝地域内的粟，却又食其地之薇，那么，薇与粟，究竟选择哪一种好呢？这个道理显然讲不通。陇西是古代西羌人居住的地方。到了周孝王时，始封非子于秦，开天水郡，则周初尚未被纳入周王朝的版图，这样的话，倒是伯夷、叔齐最乐于居住的地方。这是第二个证据。

其三，“循名者责实”，即要根据事物的名称而弄清楚它的实际。伯夷、叔齐在诗中说：“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矣。”这就非常清楚明白地告诉人们，山为西山。而蒲坂之地的山，有什么根据而称西山？根据风水地势的原理推断，这个地方的大略位置应为北山；以周王朝的都城为标准推断，应为东山；再从



蒲坂本地来看，应为南山。不是西山而说西山，伯夷、叔齐难道不分辨方向吗？陇西在天地之西，首阳又在陇西之西。颜师古亦云：“歌登西山”，当以陇西为是，这就是所谓“登彼西山”的本义。这是第三个证据。

第四，“论名者稽义”，要弄清事物的名称，必须考证它的原本意义。山的名称为首阳，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因为它位居群山之首，先得到阳光照射的缘故。蒲坂之地当属于胸腹的位置，不能说首；另外，其地还背负高岗而立，怎么能说是在阳面呢？即使称山南为阳，也是蒲坂之阳，怎么能说是首阳呢？就算因为雷泽发源于雷首，以中条山起处为首山，但这与首阳没关系。天下之山，自昆仑山脉绵延而来，到达这里，应该是以陇上的各个山脉为头颈，终南山、太白山、太行山、中条山正好位于胸腹的位置，医无间山为尾。陇西地高山峻，与东海对立相望，太阳出海，阳光首照，这就是命名之意。这是第四个证据。

第五，“援古者证今”，即引述古事来证明今事。伯夷、叔齐采薇而食，是因为山上有薇。今天的蒲坂首阳，每次祭祀二位贤者，所用的薇都是从外地采来。后来有好事者，也想把薇移植到河东地区，但很

不成功，这是因为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决定了物产的缘故。陇西之地，蕨薇遍满山谷，当地人以之代替食物，甚至还储存起来以备荒年充饥。商人们辗转贩运到江南、京都地区的，都属于陇西物产。另外，其地原来就有“二贤祠”，现在虽然颓废了，而两座墓冢屹然现存。这是第五个证据。

杨恩还认为，这五条证据中，只要有一条，就足以辨明“首阳山”的位置。只是因为近代以来，陇右地区人文湮郁，著述鲜少，以至于千百年来无人指出，太令人惋惜了！

官仓有粟 仓中鼠肥

杨恩的诗歌，在纪元补撰的《巩昌府志·卷之二十七·艺文下》中存录三首，从中可以约略窥见杨恩诗歌的风貌。如《纳粮户》：

纳粮户，来何难，进城杂差非一端。
铁绳麻锁争托锁，差人分去手中钱。
钱尽脱身犹无路，借债典衣无所措。
甫能身脱衣尽剥，视城犹如鬼门路！
催头收头任意收，卖男卖女谁能顾？
公私耗尽名色多，几曾毫厘登官簿？
年年分数不及额，欠粮不是纳粮户。

全诗形象地刻画了苛捐杂税和繁重的徭役赋税对农民生活造成的极度苦难，这首诗完全可以和唐代白居易的《卖炭翁》相媲美。

另如《蕨根行》：

饥民满眼无从乞，争采蕨根缓须臾。
人多蕨少争砍劂(zhu用砍刀、斧等工具砍削)，
身瘦土坚筋力疲。

昨日劂蕨犹蒲斗，今日劂蕨不盈手。
等是饥人莫厮争，此山既尽他山有。
山灵山灵尔勿嫌，明日未死还腰镰。

这首诗极像一幅《饥民图》。诗人用白描的手法，描绘了饥荒期间，饥民们争相采挖蕨菜以充饥的

悲惨生活。没有对当地农民生活的深切观察，是写不出这样深刻痛切的诗篇的。联系上文所提到的杨恩对于“首阳山”的考辨，就更加清楚地知道，杨恩对于生活体察的深入。

再如《拾菜》：

朝携一筐出，暮携一筐归。

十指欲滴血，且泪眼前急。

官仓岂无粟，粒粒藏珠玑。

一粒不出仓，仓中群鼠肥！

这首诗描绘了当地农民挖野菜充饥的困苦状况，读来十分沉痛悲戚！联系到杨恩当年曾经监督通州仓库的经历，他对官仓的腐败应该了解得十分

难能可贵的！

纵上所述，作为“一代良史”（明天启年间巩昌知府刘文琦），杨恩继承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史家风骨，历经数载，终成煌煌大著，不仅饮誉于当时，还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了解当时巩昌府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难得史料；作为诗人，杨恩继承了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诗风，敢于揭露现实生活的矛盾，讽刺当时统治者的苛政，直面人民生活的困苦，其诗风完全可以和白居易相媲美。

（作者：甘肃省定西市定西日报社记者）



深入，所以才能够写出这种力透纸背的讽喻之诗！也只有抱着对农民苦难的深切同情，他才能够写出这种字字血、声声泪的现实主义诗篇！

从这三首诗中，可以看到，杨恩的诗歌，继承了从《诗经》开始流传下来的批判现实的传统，他从以前的诗人手里接过了讽刺的武器，猛烈地抨击那些剥削者、压迫者以及借以实行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他还继承了自唐代以来由白居易等人发扬光大的现实主义诗风，秉承“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优良传统，使其诗作富有一定的人民性，这是

明嘉靖《秦州志》辑录记

潘守正

——国魏文帝曹丕即位后，重定关
——陇建置，以陇右为秦州，从此
始有秦州之设。在最初60多年间，
虽两度废止，但时间不长，及西晋武
帝司马炎太康七年(286年)重置后，
直至清末，历代沿袭不断。

关于记述秦州的史籍，据说三
国魏人作过《秦记》、晋人作过《秦
地记》，然均已早失。即使南朝宋
人郭仲产所撰《秦州记》，仅后来史
籍中存有个别引录的辞条。故至
明嘉靖年间，秦州虽已有1300多年的建置史，但没
有一部完整记述其史事的志书。

一、第一部《秦州志》的编纂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春，秦州知州字质庵
者(姓名已无从考证)前往秦安县拜访胡纘宗，邀其
编纂《秦州志》。胡纘宗，秦安人，正德三年(1508年)
进士，官至山东、河南巡抚加右副都御史。此前在任
安庆知府时，胡纘宗就主持编纂过《安庆府志》；嘉靖
前期从政之余，又编纂了《秦安志》；嘉靖中期致仕
后，再编《巩郡记》。可谓地方志专家，人称“小司马
氏”，故而知州往邀编纂《秦州志》。时胡已79岁高
龄，初曾推却，然经不住知州一再敦请，只好应允。
之后，仅用3个多月时间，于同年七月编成。对此，
《明史·艺文志》中有著录。

胡氏所编《秦州志》，《明史·艺文志》中称30卷，
但据清顺治年间在胡氏州志基础上新编的《秦州
志》，应为13卷。志书内容，据详读过其志的明万历

中分巡陇右道李国士称，“有述，有
表，有志，有考，有列传。其事则自
羲、轩以暨挽近，其文则自经传以至
诸史，无所不载，而又分门析类，条列
班班”。可见胡氏所编志书，是一部
门类齐全、记事完整的志书。至于志
书是称《秦州志》，还是称《秦记》，尚
难确定。胡纘宗自序中称《秦记》，李
国士亦称为“记”，只是《明史》中直称
《秦州志》，清顺治年重编时也称《秦
州志》，本文姑且以志相称。

二、《秦州志》散佚经过

《秦州志》编成后，作为第一部州志，据李国士序
文称《重刻秦州记序》推断，当时即刻版印行。但仅
过去40年，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李国士在分巡
陇右道任上征询地方古籍时，已因“岁远残缺”(李国
士序文语)，无完整刻印本。于是，李国士命秦安知
县从胡氏后裔手中征得遗稿，重新刻印，始有万历二
十六年重刻本。又过了近60年，已是清顺治十四年
(1657年)，分巡陇右道(或曰陇西道)宋琬因州志“百
有余年而阙焉未备”(宋琬序文语)，命人重新修成秦
州志，亦即顺治《秦州志》。其志是在胡本基础上补
充资料而成，表明当时万历年间刻本尚存。再历百
余年，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知州费廷珍主持重
修州志时，胡氏《秦州志》的“原刻已不可复覩”(费
廷珍为《直隶秦州新志》序文语)。此后，再无人提及明
修州志，均认为已佚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区、县各级新修志书时，

遍询古籍,亦未发现明嘉靖《秦州志》的任何痕迹,故而新出《天水市志》(2004年出版)述及其志时称:“可惜的是,这部志书命运不佳,至明末清初彻底散佚。”称明末清初散佚或有些早,但乾隆年间已无原本则为费廷珍序文所征。

三、从清顺治《秦州志》中窥得明嘉靖《秦州志》原本

2001年,天水市地方志办公室从日本内阁文库藏书中引回清顺治年间编成的《秦州志》全本。而此前,其志国内仅甘肃省图书馆藏有第10~13卷,即人物传记部分。其本的引回,使得早已残缺不全的顺治《秦州志》有了完整本。

2009年,余应邀参与编纂《天水大辞典》,承担其中战事等内容的供稿,为查阅史事,从天水市档案馆借得顺治《秦州志》,得以窥知其志全貌。在其后的多次研读中,发现其志是在明嘉靖《秦州志》原本基础上增入嘉靖以后至清初一些资料成书的,志中绝大部分(90%以上)内容即抄自嘉靖《秦州志》。其依据是:

(1)卷目两志一致。前文已述李国士称明嘉靖志有述,有表,有志,有考,有列传,而顺治《秦州志》各卷的次序亦为述、表、志、考、列传。

(2)顺治志中大部分卷目内容,下限在明嘉靖三十七年以前。卷一州郡述、郡县述,卷二疆域表、沿革表、职官表,卷三地理志,卷七食货志、兵戎志,卷十皇纪考及卷十三人物传等,均无明嘉靖以后纪事。连向来为修志者所重视的《官师志》《选举志》所入名录中,也对嘉靖以后事补充很少。明秦州知州、同知、判官、吏目、学正、训导均截止嘉靖年间,秦安县知县、典史等亦止于嘉靖年间。说明相当部分篇目在移入明嘉靖志原文后,再未补充。

(3)行文中不时出现唯明人才会使用的称谓。志中记述明代史事时,有时称“国朝”,有时不用朝代

名而直书纪年年号。如卷六《仪制志》中述及秦安三皇庙兴建过程时,称“国初建,今废”。此“国初”当为明初而不可能是清初,倘是清初所建,历10年左右不至于“今废”。人物传中记述明初人物时,也屡出现“国初”一词,如称门克新“国初以儒士任州学训导”,称张锦“国初谪戍居岷”。须知“国朝”、“国初”称谓,只有当代人才会使用。王一经作为清代知县,倘重新撰稿,绝不敢把已被推翻的旧王朝称作“国朝”。还有仪制志中,在述及参加祭仪的官员时,皆称“知州与卫指挥”,而卫属明代秦州军事建置,在清顺治初已改设为秦州营。

(4)有些词句只能出自胡纘宗之手。卷十二列贤门克新传中,有“子被于国初事迹中阅出,而知门公之遇不偶也”句,被即胡纘宗子胡被,嘉靖年间举人。称胡被为子者只能是胡纘宗。卷十三节妇中记述秦安李继妻郑氏时,称“郑氏七十有三矣”,并说“县尹杨纶奖之”。据《官师志》,杨纶是嘉靖壬寅年即二十一年(1542年)始任秦安知县的,胡氏修志在其16年后,故“郑氏七十有三矣”是指胡氏修志时郑氏当时年龄。

(5)志中为古地名加注今名时,使用的是明代建置称名。卷二《疆域表》记述秦代祖厉河时,今名注为“靖虏”。靖虏即靖虏卫,为明置,清初已改称靖远。

(6)卷三《地理志》中秦安县内容,全是胡纘宗先前所编《秦安志》中记述的内容,只是略有删减而已。且记述方式与秦州直属地和清水、礼县迥然不同,是以山脉、河谷走向系列式记述,而其它州、县则以山峰、河流的点式记述。若为重新编纂,这种行文不统一的记述方式会被改正过来。

由上可以断定,顺治《秦州志》的绝大部分内容就是嘉靖《秦州志》的原文。有鉴于此,顺治《秦州志》的志前纂修姓氏中,首栏明载其志为“明资尹大

夫、都察院副都御史胡纘宗纂修”，接下来才是宋琬、姜光胤（秦州知州）署为重修，再下为王一经署为重纂。

四、辑录经过

既然顺治志中引入了嘉靖志的原文，只需将明嘉靖三十七年以后纪事删去，即为嘉靖《秦州志》的内容。由此，经逐条逐句辨析，在全志20多万字中，发现王一经补入内容总计不到6000字。主要是四部分：一是宋琬序文，约900字；二是宋琬撰《重修秦州城垣记》，约1100字；三是嘉靖四十五年立《博平令坚公墓碑》，约1000字；四是人物中所增胡纘宗、胡忻、宋箴3人传记，约1500字。其余为官师、选举、仪制、边防、灾异、名宦中零星增入内容，总计千余字。王一经的重纂，或因于时间仓促（仅三个月编成），或因于资料有限，远没有把明嘉靖三十七年后至清顺治年间百余年史事补充完整。

辑录中最难的，是考证所入嘉靖志内容的准确性。顺治《秦州志》，制版极为草率，错别字、脱漏字以及衍文大量存在，有些地方不能成句。好在古人修志，行文时注重移录古籍原文，不轻易更改。从阅读中发现，胡氏所撰边防、兵戎、食货、灾祥、艺文、名宦、人物等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从当时印行的正史——“二十一史”中引述而来，这为考证史实的准确性找到了依据。有些史籍中找不到的，如艺文中碑碣，便找现存碑碣校对；碑碣已失的，与后来所修州志中录入内容校对。如艺文中所入宋祁的《权皋、甄济列传赞》，文为“节谊天下大闲，观皋、济不汗贼，自完，而乱臣沮计，天下知大分所在”。但据《新唐书》（宋祁修），原文为“节谊为天下大闲，士不可不勉。观皋、济不污贼，据忠自完，而乱臣为沮计，天下士知大分所在”。短短30多字的一段议论，漏、误字达11个。又如乡贤张就传中的“恭遣就诣太守”句，《三国志·魏志·张恭传》中为“恭遣就东诣太祖，请太守”。

诸如此类，猜想胡氏原稿中不会有此类失误，故均据相关文籍加以改正，以使辑录出的内容史实准确，不悖古籍。除外，还有一些史事，如卷一州郡述中蜀汉、晋、宋、齐、梁和五代等朝隶属关系的记述，多有违背史实之处，但由于行文完整，显为原志失误。为忠于原志，仍依其文辑录，其失误望读者自辨。

另外，顺治《秦州志》的每卷或每志开始，均有一段“论曰”，类似现今小序，述及本卷（志）概旨。撰其“论曰”者，或曰出自胡纘宗之手。但其中有些内容，显然非胡氏所撰。如卷二《疆域表》前“论曰”中，有“兹今沸腾卒崩，沧桑告变，曾日月之几何，而山川不可复识”句（指顺治十一年秦州大地震），《古今人表》前“论曰”中有“胡可泉先生严之是已”句（胡可泉为胡纘宗字），卷六《仪制志》“论曰”中有“州西、州南二坛，委之草莽者百余岁，兹者筑度，翼然周旋”句（二坛指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为清顺治十三年姜光胤督建），显为王一经撰文，故将“论曰”均视为顺治《秦州志》增入之文，未予辑录。

现辑录出的明嘉靖《秦州志》，计13卷，依次为：述，表，地理，建置，官师，选举、仪制、边防，食货、兵戎，灾祥，艺文，考，列传一（名宦），列传二（列贤），列传三（隐逸、流寓、文苑、群雄、孝行、列女、节妇），总计约20万字。

余所以辑录明嘉靖《秦州志》，目的在于让散佚的秦州第一部志书能够重现于世，同时为地方志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资料，并为天水地方史料的挖掘贡献微薄之力。

（作者：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地方志办公室干部）

轩辕故里考

李清凌

石莉萍

内容摘要:本文用史书记载、考古资料、近人研究结果和民间传说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了轩辕故里在清水的观点,并对轩辕黄帝出生于山东曲阜和河南新郑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轩辕黄帝 轩辕氏出生地 甘肃清水县

一、文献记载的黄帝出生地

关于黄帝轩辕氏出生地的古书记载很多,现存可考的古书以《国语》的记载最早,《史记》只说他是“少典之子”,鉴于文献资料的不足,其余的话都没有说。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北魏酈道元撰的《水经注》说得比较确切,对于他们的说法需要进一步考察辨析。《国语》云:

昔少典取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①。

从出生地的角度看,历代学者的意见,少典是一个部落名,或部落首领的称号。有蟠氏也是部族的名字。姬、姜为两条水的名字,后又转化成姓氏。成,指成长,成功。少典生黄帝的“生”,古代学者早就将它解释为“本所生出”,即指是其后裔,而非像今人理解的父子关系。这一解释是准确的。《史记》卷1《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生”的。

那么,少典氏生活在哪里?有蟠氏又在何地?

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三国魏譙周的话说:黄帝是“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有熊国”,今天理解,就是指原始时代的有熊部族,称作国,意即古方国,即雏形的国家。裴骃又引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话说:“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晋代的河南新郑县,治所在今河南新郑县。

关于黄帝的出生地,最早给出具体地名的正是晋人皇甫谧(215~283),他的《帝王世纪》已佚,据《太平御览》卷79所引该书遗文云:

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蟠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及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以上承火,位在中央,故曰黄帝。龙颜,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②。

《帝王世纪》的另一处遗文有寿丘“在鲁东门外六里”的具体地名。此外,《太平御览》卷135的引文,

也只说黄帝生于寿丘,没有说寿丘在哪里。南朝梁人刘昭《后汉书补志·郡国志二》说得也比较具体。其文云:

黄帝生于寿丘,在鲁城东门之北。^①

此后,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沿袭了刘昭的说法:

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②

张守节说寿丘在唐兖州曲阜县。即今日的山东曲阜市。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11也沿用此说。把上面几本书的说法排列出来,可以看到,梁人和唐人的引文中有寿丘“在鲁东门之北”的话,而宋人的引文并非都有这句话。其可能,一是此话在《帝王世纪》原本中本来就没有,二是即使有,宋人对它并不认可,因此不予引用。宋人之所以不认可,是因为受到其他说法的影响。

与此不同的说法,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该书卷17“渭水”下有一段话说:

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皇甫谧云生寿丘,丘在鲁东门北。未知孰是也。

这段话提出,天水上邽县城东70里的轩辕谷是黄帝的出生地。北魏天水郡属秦州,上邽是天水郡的一个县。上邽城东北清水县有“轩辕谷”,又见于一些地方志。如乾隆《清水县志》卷2谓“轩辕峪(谷),(在清水县)东南七十里”,乾隆《大清一统志》卷210《秦州》云:“清水县,在州东一百二十里。”“轩辕谷,在州东。”并认为“《通志》谓谷在今清水县东南

六十里,误。”此所谓“误”,可能是指《通志》将轩辕谷在清水县东南七十里记载成了六十里。其实,轩辕谷距天水州治70里,距清水县治70里,其间有北魏、清朝里制的差异,也同该谷不在天水到清水的直线上以及人们计算的不精确有关。但几种记载大致指出了轩辕谷(峪)的所在位置。该谷至今遗迹犹存,历历可指,而像这样的地名在天水附近没有第二个。说明清水“轩辕谷”是黄帝出生地的传说,北魏时代就很流行;为慎重起见,郦道元的记载也提到了“丘在鲁东门北”的观点。

宋人罗泌《路史》卷14《黄帝纪上》只认同郦道元的“上邽说”。他说:黄帝“母吴枢曰符葆,秘电绕斗轩而震,二十有四月而生帝于寿丘”,注云:“寿丘,在上邽。或云济南,《(帝王)世纪》又以为兖,俱非”。元人梁益《诗传旁通》卷10也说:“寿丘在上邽,或云济南”,将寿丘在上邽作为主要的传说和看法。

二、对黄帝生于“寿丘”或“新郑”说的质疑

确定历史事实需要依据史料。古代史料的来源,一是传说,二是新文献的发现。没有证据说明魏晋时代发现了有关黄帝出生地的新文献,司马迁年轻的时候,曾到过汉朝的很多地方,西至崆峒,北到涿鹿,东极海边,南临长江、淮河。所到之处,老人们都说他们那里是黄帝或舜的故乡。然而,黄帝到底出生在哪里?司马迁都不敢确定,皇甫谧何以就说他出生在寿丘?而且同样是引用皇甫谧的著作,对于寿丘在哪里这样关键的问题,何以梁人刘昭《后汉书补志》等有寿丘在“鲁东门之北”的指点,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同之;而到了宋代,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罗密编《路史》时,反倒不引或不引此句?

我们无意因此就怀疑皇甫谧是一位知识广博的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合理的解释,只能说他依据

的史料是得之于民间传说,对于其所包含的历史成分,今人需要通过仔细鉴别才能决定取舍。何况皇甫谧的记载既没有指出文献证据,也没有必要的论证分析。更让人纳闷的是像黄帝这样伟大的中华文明的代表,儒家心目中的圣人,若他与大圣人孔子同里,与亚圣孟子也相距不远,何以关于这件事,孔孟及其弟子们绝口未提、只言不记?这决不是偶然的。只能说孔孟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或者黄帝出生于寿丘或曲阜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著名上古史专家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

鲁国本为“少皞之墟”(《左传》定公四年),是东夷集团的大本营,华夏集团的黄帝绝不能生那里。在周成王“残奄”(《史记·周本纪》,鲁本奄地)以前姬姓的势力没有达到山东的痕迹。有蟠从来无解释。所以少典和有蟠二氏族原来居住何地,我们无法知道,未便妄说。^⑤

看来黄帝出生于曲阜说是靠不住的。

那么,黄帝是否就出生于河南新郑呢?这个问题是近人才提出来的。皇甫谧《帝王世纪》在叙述历代建都地点的时候,提到一种说法:“或曰: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⑥那是说“有熊”国的国都,在今(晋朝)河南郡新郑县,而不是讲黄帝的出生地。其他古籍记载大致沿袭此说。即将新郑只看作有熊国的建都地。

今人以河南新郑及其附近有许多黄帝活动过的遗迹,就说新郑是黄帝的出生地,这个推论是有漏洞的。众所周知,有遗迹和出生地不是等同的概念。传说新政是黄帝建都或活动过的地方,因此那里有许多黄帝的遗迹或后人纪念黄帝而建立的标志物,不是很正常的吗?它同出生地是两码事。即便黄帝是有熊国君的后裔,有熊国就在今河南新郑,也不能

表明黄帝自然应该出生在那里,因为原始时代的氏族部落是经常迁徙流走,寻找食物和更好生活环境的,而不太定居生活。司马迁说过,黄帝族也是“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未尝宁居”^⑦,哪怕他已经建立了首都。因此,远古传说人物的出生地,活动地,建都地,死后的埋葬地,理应各有其处,而不能以后世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拟之。关于黄帝出生于新郑的事,中国古代主要史籍上找不到证据,民间口头流传也未尝听闻,今人不必牵强附会。徐旭生先生精辟地分析并指出:“古书中只谈到少典,没有谈过有熊,有熊一名同黄帝、少典二名发生关系大约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不足为信据。”^⑧据此,黄帝生于有熊即河南新郑的观点也是靠不住的。

三、轩辕故里在清水

轩辕故里在清水,看似一个不起眼的命题,但它有坚实可靠的理论、史书记载和传说的依据。

上个世纪开头几十年,史学界掀起了一个不小的疑古和否定中国上古史的思潮,他们被称为“疑古派”。与此同时,也有一批学者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后、科研条件极困难的条件下致力于古史整理,他们下决心要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个明确、可靠的说法。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徐旭生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徐旭生将中国原始社会后期的先民划分为炎黄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三个大的群体,并认为炎黄集团最早就生活在甘肃和陕西交界的黄土高原一带。他说:

我们的祖先有一部分,此后叫作华夏族,内中有一个氏族叫作少典。它与有蟠氏族为互通婚姻的氏族。它的生活区域大约在今甘肃、陕西两省交界的黄土原上或它的附近。从这个氏族分出来两个重要的氏族:一个住在姬水旁边,此后得了姬姓,

就叫作黄帝氏族；另外一个住在姜水旁边，此后得了姜姓，就叫作炎帝氏族。^⑩

即是说，陕甘交界的陇山东西广大地区，是炎黄氏族早期生活活动过的地盘。这段话为我们寻找黄帝的出生地画出了一个大致范围，排除了黄帝出生“曲阜说”以及“新郑说”的干扰，从理论上为本课题的研究指出了正确方向。

徐旭生先生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更加具体地说：

炎、黄公(共)同渊源的少典氏族大约在西方渭水的上游。^⑪

陕甘交界及其附近的地方，的确有许多关于炎黄先民的遗迹和记载，然而就黄帝的出生地而言，记载明确、地点可考、口碑感人的却只有甘肃清水的轩辕谷。《水经注》等较早的文献记载已如前引。许多地理书如《大清一统志》那样由国家主持编纂的大型权威性地理著作也认可酈道元的记载。其他各种地方志的叙述则是对《水经注》的转述，这里不再重复。总之，各种记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黄帝出生于清水轩辕谷的事实。而类似的地址在陕甘交界及其附近其他地方包括渭水上游再没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黄帝出生于清水轩辕谷说的唯一性。

传说是史学的源头。中国战国以前的历史大都是通过传说流传下来的。可贵的是关于黄帝出生于清水轩辕谷的传说，千百年来代代相沿，至今琅琅不绝。挂在人们口头的，如轩辕谷、轩辕溪、三皇庙(即轩辕庙)、轩辕鼓，等等。可以佐证徐旭生炎黄在陕甘交界处及其附近或渭河上游出生、活动观点的事例，还有：

——姜氏城，姜水。《水经注》卷18《渭水注》中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据《明一统志》记载：“姜氏城在宝鸡县南七里，城南有姜水。《帝王

世纪》‘炎帝神农氏母有乔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即此。”^⑫姜水为渭河的一条支流，在陕西宝鸡市境内，今叫清姜河。姜氏城今名姜城堡。一般认为，它就是炎帝神农氏早期成长活动过的地方。

——姬水。在陕西岐山县。

四、对于黄帝祖上迁来清水的推测

徐旭生先生对华夏族的发祥地和迁徙方向有一个猜测。他说：

我们华夏集团在文献还留一点微弱痕迹的远古是住在昆仑丘的脚下，这就是说他们住在洮河、黄河、湟河、大夏河诸河谷中可能住人的地方。近几十年来考古学者在那一带所得的彩陶大约就是当日华夏集团居住时的留遗。我们的古人总好说昆仑，可是他们所说的昆仑总有点惆怅迷离，不象泰山、华山的清楚，这是因为他们离开昆仑日久，只听说它，并没有谁真看见它。因为原来发祥在那里，所以虽离开日久，总还一辈接一辈地传说下来……他们逐渐东迁，少典氏和有蟠氏就是他们达到甘肃和陕西交界地区时的两个氏族。黄帝与炎帝的氏族又从他们分出来。”^⑬

在这里，徐旭生明确地指出，昆仑丘即青海高原。他解释说：

唐兰先生曾告余。昆仑实指祁连。今细核之，其说甚近，然尚有小误。盖昆仑乃青海高原……丘或训“土高”，或训“四方而高”，均指高原。昆仑不曰山而曰丘，明非山也。^⑭

这是说，唐兰先生认为昆仑就是祁连山，而徐旭生则认为《山海经》里说的是昆仑丘，而不是昆仑山，

所以它当指青海高原而不是祁连山或其他什么山脉。

这是一个非常有见地、有价值的猜测。其实，司马迁在《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引《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同卷“索隐”引《山海经》说“河出昆仑东北隅”。《史记》卷2《夏本纪》“索隐”引《尔雅》云“河出昆仑墟，其色白。”（“墟”又作虚，指山下之地或山基地）都是将青海高原看做昆仑丘或昆仑墟。需要说明的是，传说中的昆仑山或昆仑丘（墟）很多，然而《尔雅》云：“三成者为昆仑丘”。疏云：“丘形三重者名昆仑丘”^⑨。“成”，是层、重的意思。这是说，凡地高而平者，都能叫做昆仑丘（墟）。可仔细分析，尽管古代叫做昆仑山（丘、墟）的地方很多，但它们有的是泛指高山；有的是从青海带过去的地名（如古人将甘肃酒泉市南的祁连山称作昆仑山等），作为神地的昆仑丘（墟），只有《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的这个地方。它是“天帝下都”，“万物尽有”，西王母所居，产不死药之地。是“河出昆仑”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发源地。也是众帝、神人、仙人、巫师们上下天的“天梯”，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山丘或山脉。

我们的先祖最早就形成并活动在这样一个神秘、神圣的地方。后来，他们向东迁徙，首先来到了渭河上游，因此，徐旭生在同书中说：“炎、黄公（共）同渊源的少典氏族大约在西方渭水的上游。”^⑩这些观点提出来以后，可以佐证它的考古学成果接踵而出，愈来愈多。例如，青海上孙家寨遗址，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等等，都发现了距今五千年或更早的原始人活动遗迹，发现了极为精美的彩陶，还有青铜器。说明从青海高原到甘肃渭河流域，的确是原始先民生活的地方。这些地区同

古书记载的少典、黄帝的时代、地域一样，文明进步程度相同，因此除了部族名称无法直接证明外，用以证明少典氏、有蟠氏、轩辕氏生活的时代，证明这里是中华民族形成期文明发展程度最为璀璨的地区之一，当可以肯定。

考古学成果不能直接证明的遗憾，可以由传说来补充。如前所述，传说是文字发明以前人类历史最早、也是最主要的流传形式。即使在今天，关于黄帝氏族发祥于渭水上游、清水一带的民间传说，仍然能够为弥补考古学成果在这方面的不足起不可替代的作用。前引徐旭生的猜测证明了轩辕黄帝出生于清水的传说，反过来，轩辕黄帝出生于清水的传说也从一个角度佐证了徐旭生的部分观点。甘肃、青海一带五千年前彩陶文化的大量发现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徐先生的观点以及清水是轩辕故里的传说。

原始时代“生”的观念与今天大不相同。对此学者们已经反复论证过了。所谓少典生黄帝，是说从少典氏族中分离出了黄帝氏族，而不一定是指少典其人作为父亲，生出了黄帝。还应注意，少典、黄帝，所代表的是一个氏族的名称，它是该氏族所有成员的公用名，也是这一氏族首领的职称名，还是一个时代、地域的名称。依此而论，我们所谓轩辕黄帝出生于清水，是指清水是轩辕氏族的发祥地，是它从少典氏族最早分离出来并活动过的地方。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南方考察的时候，所到之处，老人们都说他们那里是黄帝、尧、舜的故地，都愿意拉黄帝等作老乡。所以，徐旭生慨叹两千年后的今日要证明黄帝出生在哪里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我们知难而进，将古书记载、考古材料、近人研究成果和民间传说四者结合起来，证明清水是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应是有一定理论和事实依据的。承认这一点，就会脉

络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的雏形华夏族是从昆仑丘,即青海高原最早起源,然后东迁,经过渭水上游包括清水一带,进入今陕西西部的。在渭水上中游的甘肃东部清水一带,黄帝氏族从少典氏族分出,而在陕西宝鸡一带炎帝氏族又从少典氏族分出。很多古籍将少典氏生黄帝放在少典氏生炎帝之前。然而黄帝氏族从少典氏分出或在炎帝氏族之前,但传说中炎帝氏族的发皇焯赫却先于黄帝氏族,所以又称“炎黄”,将炎帝排在黄帝前,这是不难理解的。华夏族先民在陕西宝鸡壮大以后,按照徐旭生先生的观点,就兵分两路,黄帝一支沿渭水、黄河向偏北方向发展,过中条山、太行山一直进到燕山北部;炎帝一支沿渭水、黄河进至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处,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炎黄两支在同东夷、苗蛮接触、摩擦和融合的长过程中,谱写了华夏文明最初的辉煌篇章。

注 释

①三国吴·韦昭注:《国语》卷10《晋语四》。

②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卷1。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110《郡国志二》注。

④汉·司马迁:《史记》卷1《五帝本纪》。

⑤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二章,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下同),第41页。

⑥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卷1。《太平御览》卷155。

⑦汉·司马迁:《史记》卷1《五帝本纪》。

⑧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二章,第41页。

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叙言》。

⑩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三章,第

141页。

⑪《明一统志》卷34。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二章,第43页注1。

⑫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附录三《读山海经札记》。

⑬晋·郭璞注唐·陆德明音义,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6《释地》。

⑭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三章,第141页。

(作者:①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②兰州城市学院城市经济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

临潭的古代书院

张俊立

书院是古代讲学藏书之所。始于唐代，原为修书、校书、藏书之所，后用于讲学。规模有大有小，性质有公立私立，在中国古代教育中，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讲习内容以儒家经籍为主，一般在蒙学之上，有的是当地最高学府。清末废科举，书院改为学校。在今甘南地区，临潭县是古代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临潭先后有三所书院：凤山书院、凤麓书院、莲峰书院。

凤山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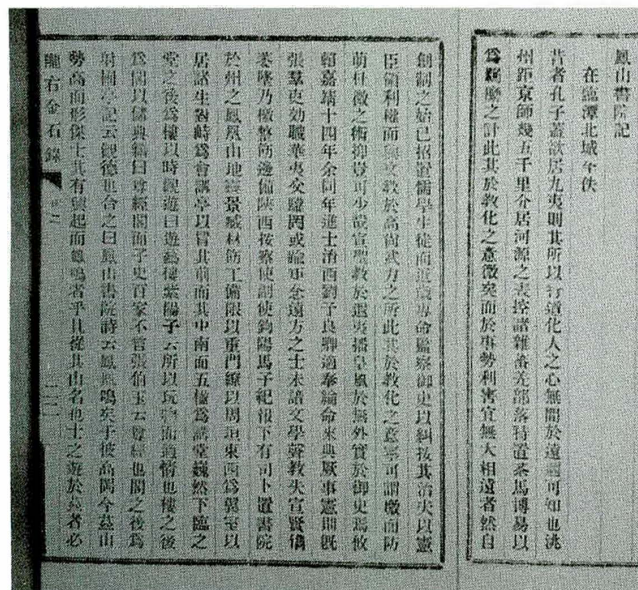
始建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陕西按察副使马纪等创建。原址在今临潭县新城镇城内凤凰山麓。

明代洮州(临潭)隶属陕西布政使司。嘉靖时期平凉进士赵时春晚年编定的自著文集《浚谷集》中，有《凤山书院记》一文，记载了洮州凤山书院始建的缘起及书院规模。

《凤山书院记》：“洮州距京师几五千里，介居河源之表……嘉靖十四年，余同年进士清西刘子良卿，适奉纶命来典厥事……陕西按察使副使、钧阳马子纪报，下有司卜置书院于州之凤凰山，地灵景臧。”

文中接着对书院建筑规制也做了扼要交代：“限以重门，缭以周垣。东西为翼室，以居诸生。对峙为会讲亭，以冒其前。而其中南面五楹为讲堂，巍然下临之。堂之后为楼，以时观游，曰‘游艺楼’。紫阳子云，所以玩物而适情也。楼之后为阁，以储典籍，曰‘尊经阁’，而子史百家，不言张伯玉，云尊经也。阁之后为射圃亭，记云观德也。合之曰‘凤山书院’”。览读这段简练的文字，一座环境幽雅、庭堂楼阁齐整的书院概貌，宛然在目。

该记随后也说明了书院命名之所由：“诗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冈。’今兹山势高而形杰，士其有兴起而凤鸣者乎！且从其山名也。”明、清两代之洮州卫、厅，以及民国时期的临潭县，其治所详址一直在今临潭县新城镇凤凰山下。山在城北，半在城内，半在城外。庞大的洮州卫城墙垣随山势蜿蜒起伏，至今犹在。而凤凰山因其整个山势酷似举首伸颈、展翼飞升的凤凰。书院建于城内凤凰山麓，故名为凤山书院，而引经据典，亦寓期盼当地贤才继起之意。当时



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七《凤山书院记》部分

凤山书院的建筑规制如此,至于学田膏火及山长、职员等具体情形,均未见史料记载。

赵时春(1508—1567年),字景仁,号浚谷,平凉人,嘉靖五年(1526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官至兵部主事、翰林编修、山西巡抚等。晚年编定自己诗文,取名《浚谷集》。此外还撰有《平凉府志》十三卷。是明代“嘉靖八才子”之一,与李梦阳、胡缙宗同为当时陇右文人的典型。其诗文风格以慷慨壮气为主,被认为是“秦人而为秦风”的代表。因刚直敢言先后三次被嘉靖皇帝罢官。考赵时春一生,足迹并未到过洮州,从《凤山书院记》可知,应是其同年进士刘良卿转告赵时春,或许并请撰记的。

刘良卿,河南南阳(今河南新野县)人,明巡按陕西监察御史。

文中提到的马纪,据《岷州志》第14卷《宦迹·明·洮岷道》载:马纪,字直卿,以江西九江府知府升任,嘉靖十五年驻岷。治尚俭朴,修书院,勤课多士,听讼曲尽隐微,州人有神明之颂。祀名宦。

洮州凤山书院始建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次年赵时春为撰碑记。此文刻碑今已不存。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七:“《凤山书院记》,在临潭北城,今遗。按此碑嘉靖十三年立,平凉赵中丞时春撰文,见《浚谷集》”。“十三”显系“十五”之笔误。书院止于何年,不得而知。据考,明代整个三陇地区(包括今甘、宁、青),共有书院19所,大部分始建于嘉靖朝之后,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是非常落后的。就甘肃古代书院而论,洮州凤山书院算是较早的了。

凤麓书院

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具体时间及创建者不详。原址在今临潭一中北侧。

纂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洮州厅志》在其卷八《学校下》对临潭古代书院记载如下:“凤麓书院,在厅治北,薛家崖凤山之右。国朝乾隆间设,今废。”对凤麓书院,各种今见史料的记载,仅此而已,

此外别无片纸只字。《洮州厅志》中所言薛家崖凤山之右,即今临潭县新城镇临潭一中北侧一带。

莲峰书院

始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洮州抚番同知庆龄创建。原址在今临潭县新城镇西街,现为私宅。

与凤山书院和凤麓书院史料极少相比,现存与莲峰书院相关的史料则详实多了。《洮州厅志》卷八《学校下》:“莲峰书院,在厅治西。曩为七圣会馆旧址。光绪十年,同知李日乾建学院,今改设学堂。”《洮州厅志》卷十五《艺文》还收录了两篇碑文:《莲峰书院经费序》《重修莲峰书院记》。《洮州厅志》卷十四《金石》:“莲峰书院碑二,在今学堂门左右。一咸丰元年同知严长宦立,一光绪十二年同知李日乾立。”厅志所载两碑即《莲峰书院经费序》《重修莲峰书院记》。前碑已佚,后碑今存。两篇碑文分别记述了书院经费筹措和重建情由。根据这些史料可知,莲峰书院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洮州抚番同知庆龄创建,后毁于同治之乱。光绪十二年(1886年)洮州抚番同知李日乾重建,规模有所扩增。

《莲峰书院经费序》:“洮自国初设厅至嘉庆二年,梦斋庆公始捐创莲峰书院。”序文为洮州同知严长宦所撰。严长宦,字澹庐,进士,江西鄱都县人。《洮州厅志》有传。据传,其前后三次来洮署理洮务。第一次始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在任十余年。第二次在咸丰八年(1858年),咸丰十年(1860年)升任广西潯州府知府。第三次为同治二年(1863年),以兵备道衔来洮办军务,卒于任所,年七十五岁。

碑文中提到了数位有功于书院者。始建者庆龄,字梦斋,长白山人。嘉庆二年(1797年)任洮州抚番同知,《洮州厅志》列其名。周濂,字又溪,道光五年(1825年)任洮州抚番同知。升兰州府知府,崇祀名宦。

《重修莲峰书院记》:“洮州旧有书院,毁于兵

燹。地亦湫隘。余莅任之明年，劝谕城乡集资复修。择地于城南，鸠工庀材，经始于乙酉四月，阅十有八月而落成。仍颜之曰：‘莲峰’。堂室之制较昔增高。”此文为洮州同知李日乾撰。李日乾，字惕如，增监生，云南易门人。光绪十年（1884年）任洮州同知。在任九年，《洮州厅志》有传。碑文中提到教授李源泉、杜升瀛，绅士廩生雍居敬、赵学健、赵学明、宋之佐、党士杰，武生丁永泰等曾经营襄助。

编撰于1940年前后、未及刊印的《临潭县志》载：

“莲峰书院，在城西街，曩为七圣会馆，同治年间被焚，光绪十年洮州厅同知李日乾就旧址建学院瓦楼三楹，上屋为尊。经阁下层为山长居室，东西斋室各五间，为肄业士子住宿之所。前讲堂三楹，堂之东西各三间，西为院夫室，东为马厩。又楼之两侧各有房两间，为厨室。讲堂两侧各有室二间，为储藏室。马厩之下有房两间为厕所。南街建一高两低牌房大门三间。光绪二十八年，改书院为高等小学，至民国十六年改为教育局，民国二十二年县长金伯韬改为临潭县政府。”

清光绪年间重修后的莲峰书院其建制规模由此可见一斑。而在此期间及其之前的经费膏火之筹措，亦多赖时任厅守及士人因地制宜，多方凑集，或劝捐，或义仓霉变者出粟之制钱发商取息，俱费周张。其中道光年间同知周濂、严长宦，士绅姜丛桂等，多有助力。清末致仕返里的临潭进士包永昌，亦捐银甚多。由于洮地硗瘠，明、清两代，岷州均捐置郭外沃壤，作为洮州学田。

莲峰书院的教职人员信息，也可从《洮州厅志·名宦》及《临潭县志稿·人物志》等处散存的零星史料中略窥一二。

杨师震，字少西，靖远县城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道光间洮州同知严长宦聘为山长。亦曾主讲平凉柳湖书院。

高振震，举人，光绪十年，洮州同知李日乾聘任，主讲。

张涣瀛，举人，光绪十年后，洮州同知李日乾聘任，院长。

魏立，字礼亭，伏羌（今甘谷）人，进士，光绪十二年（1886年）后，洮州同知李日乾聘任，院长。

李盛生，临潭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人，山长。

杨茂春，字子林，临潭人，光绪十三年（1887年）举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前后，洮州抚番同知熊振槃聘任，讲习。

宋之佐，临潭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举人，洮州抚番同知曾麟绶聘任，主讲。

莲峰书院，因其朝廷官守尽职、名师尽力，遂成为一时洮州士子讲学著述、就读修习的重要场所。临潭清末私塾名师范绳武“肄业莲峰书院，又为邑宰严澹庐先生所重”（《范绳武先生德教碑》）。伏羌（今甘谷）进士、莲峰书院山长魏立在给洮州诗人赵维仁诗集《继园诗钞》作序署名：“伏羌后学魏立志于莲峰书院之北斋，时在光绪十三年季春之望”。我们可以想象，在莲峰书院几经兴废的沧桑岁月中，不知有多少昔日贤达曾经在那里礼敬先圣，捧典静读，观花悟道，度过了安静而深思的春秋晨昏，然后带着经世之志，走向社会！

由以上史料可知，临潭古代书院，多为官方性质，地方士绅皆鼎力襄助，参与了筹建管理。而书院这一昔日的教育形式，无疑也为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据《洮州厅志》记载，明、清两代，临潭产生进士4名（明清各2名），清代举人12名（明代无考，武举亦不在此数），贡生272名（明63名，清209名）。这应该也与书院有很大的关系吧。

考稽地方古代书院屡毁屡建的过程，既可了解地域文化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可从中深深体会到历史上人民群众对于文化教育的渴望和不懈追求，我们应深深铭记那些曾在历史上为地方文化教育进步作出贡献的人们。

（作者：甘肃省临潭县档案局原局长）

GAN SUSHI ZHI

甘肃史志

2017年第3期（季刊）（总第31期）

编辑出版：《甘肃史志》编辑部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51号
省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7821931 7821927

电子邮箱：3498763120@qq.com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甘）LK000080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